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建構論戰略賽局：

以 20 世紀初沙俄戰略能力為例（1904—1918）

Constructivist Strategic Games:

Strategic Ability of Tsarist Russia in Early 20th Century

as an Example (1904 – 1918)

何冠威

Kuan-Wei Ho

指導教授：袁易博士

Advisor: YI Yuan,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July 2017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建構論戰略賽局：

以 20 世紀初沙俄戰略能力為例（1904-1918）

Constructivist Strategic Game:

Strategic Ability of Tsarist Russia in Early 20th

Century as an Example

本論文係何冠威君（R03322025）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106年7月05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袁 易

（簽名）

（指導教授）

莫大華

張登及

袁 易

謝辭



大學期間在張登及老師講授國際關係理論的課堂上，初次拜讀袁易老師介紹社會建構理論的文章，並從中粗略認識亞歷山大·溫特所提出的建構主義論述。本身不擅長記誦各家學者、各派理論細節，但在首次接觸溫特理論的當下，內心便產生一種稍顯幼稚但格外強烈的念頭：我覺得他講的是對的。或許折衷、或許多方涵納，但溫特所講述的確實是我所認識的那個世界，溫特所描繪的確實是我所相信的世界原貌。

基此緣由，進入研究所時選到袁老師所開的國際關係社會建構理論課程，盼能親聞其詳。雖然能力不足以盡得老師講述精華，但也隨著老師的侃侃講談在思維中徜徉了一個學期。

感覺上，社會建構理論是一套對未來抱持著一份樂觀憧憬的理論，這套理論就像是在對人類相互理解的務實期許下而誕生。現時有關社會建構理論的名家著作，多聚焦在國家間的合作面，少著墨於國家間的衝突面，但對衝突的解釋確實存在於溫特理論設計時的考量中。或許因為大學入學之初受到明居正老師講課影響，加之本身除本科系課目以外幾乎都選修歷史系課程，自己還是嚮往那種以國族為軀體，向地海捭闔、邀巨靈對弈的曠闊；也憧憬如細膩的匠人般，將縈帶全城作為一技之長的戰略家浪漫。如果相信名字新穎、時髦的社會建構論是「對的」，那麼自己理應也該相信社會建構論或能被得心應手地運用在戰略這種悠遠的古典浪漫上。循此念頭，當時在跌撞與摸索中，試圖拙作成一份袁老師課堂的期末報告，而這篇天馬行空的報告即是本研究的原始雛形。

前年 3 月，國防部宣佈將於該年年底結束我國最後一批義務役常備兵徵召，尚未服役的役男自隔年起將全數改服替代役。自許以戰略為術業，卻無緣親歷軍旅，認知上誠難接受；有幸能無野無礙長年求學，眾多境遇不如自己同輩的役男業已完成兵役，自身卻因仍保學生身分而得躲過兵役，情感上亦無法接受。



幾經考慮，在親人諒解下，斷然在升碩二的暑假取消緩徵、休學入伍，任官後分發至嘉義中坑新訓旅擔任連隊輔導長。雖然全募兵制最終因故延緩施行、義務役徵兵至今未止，但仍深幸當初能憑此抉擇換取今日之庶幾無愧。在任期間，經徵詢後幸獲袁老師首肯，得以接受袁老師指導。


任職中坑期間，得知轉服志願軍官或有機會循徵才管道進入心戰大隊第二中隊服務。兀自忖度，全國除心戰大隊第二中隊以外，幾無它處能讓我有機會於三十歲以前將所學付諸實踐。自小受家父教誨影響，始終冀盼此生至少能學有所用一次，是而決定續簽留營，並獲袁老師諒解。

幸獲大隊錄取後，由於人事作業所需耗時較久，不及於 105 學年度開學前調返北部。在陸軍二五七旅政戰主任王石朋上校竭力協助與調整下，方得每週通勤南北，復學無慮；後在袁老師與莫大華老師關心下，調職相關程序亦順遂完成。就任現職後，蒙大隊長盧守謙上校與隊長顏瑞宏中校准許與支持，終得於公務之餘接受三位老師不吝指教、逐步完成學業。

一直以來，自己因不諳學術細節，或為師長造成不少困擾，卻屢屢受惠袁老師多方包容。在論文撰寫上，袁老師提供了很大的自由空間，也給予了許許多多的鼓勵與鞭策，自己因而能維持信心與動力，在屢次的反思中繼續試圖構思創見。袁老師在課堂上授業、解惑，私下對學生的關懷卻遠甚於對學問的嚴苛。袁老師就生涯方面頻予關切，與其說是師長，老師更像是自己的親長。

張老師作為自己學校系上的師長，備感熟悉與親切。雖然自己在課堂上總是比較低調寡言，與系上師長互動不多，但對於張老師言談的溫文、謙和與條理分明，至今仍實感驚訝與難忘。求學過程中，張老師每每不厭其煩惠予協助。研究大綱初擬定時，內容多有混沌、浮誇之處，張老師卻仍耐心詳閱拙陋草作，每能道中自身表述不善的撰寫原意，並依次給予寶貴指點。

在袁老師熱心介紹下，方有幸能接受莫老師教誨。莫老師的風格是自己求學以來所未見，難以言喻。自動筆以來，每逢窒礙或猶疑處，在冒昧登門向莫



老師求教時，往往能得到莫老師當頭棒喝，隨之又在莫老師幾分玩笑、幾分肅穆的講授中，輕巧、悠然卻刀刀入裏地將心中疑問逐一破除。此外，更屢受莫老師就近關照。如非莫老師厚助，本文研究框架與論理主軸實難順利底定。

一路砥礪，所獲援助豐厚至此，誠為至幸。自己也深切明白，凡學歷往往是建立在出身、地域、家境與重視教育的親輩之上。在無數因先天出身環境而與高等教育無緣的同輩面前，自身努力忝堪掛齒。在完成此本論文的同時，於一要感謝以上諸多貴人，於二更要叩謝父母，謝謝他們將艱苦停留在自己那一代，謝謝他們將回報社會的義務留給生來衣食無慮的我輩。祈願日後能擴充這篇必然尚且有失縝密的拙作，並將研究付諸技術、付諸實踐，見用於斯土斯民。

另，謹以本文向 1905 年隻身縱橫歐亞大陸上的英雄——明石元二郎大佐致上敬意。

何冠威

民國 106 年 8 月 17 日

謹誌於復興崗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於戰略賽局中藉由溫特提出的三種集體身分形塑機制改變行為者間集體身分，而此種集體身分轉變是否足以影響系統內各行為者戰略能力。於此過程中，本文尤重此過程間的賽局演變情形。

為檢視三種外因機制對戰略能力的影響，筆者以 20 世紀初沙俄戰略能力為觀察對象，時間起自日俄戰爭、迄於蘇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並選用 1905 年三起衝擊沙俄戰略能力的集體身分變遷經典範例，依次演示三種外因機制改變戰略能力之過程。

於結構系絡機制部分，本研究以血腥星期日事件為例，藉由東正教工人運動將新知識注入結構的過程，瞭解共享知識改變行為者對結構系絡內化程度的方式，以臻滿足無政府文化轉移的臨界條件，造成對手間戰略能力消長。

於系統過程機制部分，本研究以葛拉夫頓號蒸汽船事件為例，藉由沙俄治下芬蘭人與日本政府間互賴關係的發生，探究互賴關係如何開啟戰略賽局，而行為者又如何藉由新合作關係的建立與權力的移轉來達成戰略目標。

於策略實務機制部分，本研究以坡坦金號軍艦叛變事件為例，試解釋戰略賽局下邊陲層級如何依據環境變化來進行理性決策；在首次與他者合作反抗中心層級後，何以促成其它邊陲層級的仿效，使邊陲層級對期望值的預期被扭曲。本文試以賽局中的未知數解釋此種心理。

藉此三項案例，本研究冀能呈現集體身分對於達成戰略目標的工具性，並提供一種容易運用於政治、軍事實務的建構論戰略觀。

關鍵字：集體身分、戰略賽局、結構系絡、系統過程、策略實務、無政府文化、中心與邊陲層級、日俄戰爭、俄國革命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explore how to transform collective identities between the actors in a strategic game through three typ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ing mechanisms put forward by Alexander E. Wendt, and whether this kind of transformation is sufficient to change the strategic abilities of the actors inside the game system. It especially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games in this kind of process.

For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hree exogenous mechanisms upon strategic abilities, it takes the strategic ability of Russian Monarchist Faction, including Tsarist Russian Government and the White Army later, as a case observed. The timeline of the case discussed in the thesis starts from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end at the withdrawal of the Soviet Russia from World War I. There are three classical examples occur in 1905, which had damaged the strategic ability of Tsarist Russia, and each of them related to a type of exogenous mechanisms Wendt said.

In the part of structural contexts, the study takes the incident of Bloody Sunday as an example, showing how Orthodox workers' movement as a new knowledge changed internalized degree of structural context for actors, and how it make the degree meet the critical point shifting cultures of anarchy, resulting in the change of relative strategical ability between the rivals.

In the part of systemic processes, the study takes the arms smuggling of steamship SS John Grafton as an example, showing how interdependence begin between Finnish people under Russian ruling and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start a strategic game, and how these actors achieve their strategic goal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ooperative relation and transfer of power.

In the part of strategic practice, the study takes the case of the mutiny of warship Potemkin as an example, explaining how a peripheral actor inside a strategic game make rational decision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ow other peripheral actors imitate their cooperation with outsider revolting their centric actor, changing their expectations toward a successful rebellion. The study would like to explain this kind of psychological conversion by the unknown numbers in the ga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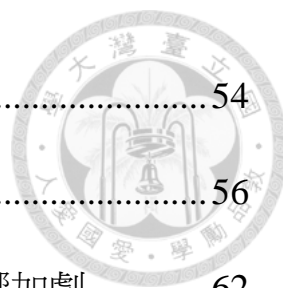
The study expect to present the instrumental value of collective identity on achieving strategic goals, for offering a constructivist strategic view able to be easily used i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actices.

Keywords: collective identity, strategic game, structural contexts, systemic processes, strategic practices, cultures of anarchy, center and periphery, Russo-Japanese War, Russian Revolution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v
英文摘要.....	v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研究途徑與方法.....	4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7
第四節、文獻回顧.....	12
第五節、研究設計.....	18
第二章、無政府文化轉移、行為者拆合與戰略賽局.....	19
第一節、以集體身分界定行為者.....	19
第二節、無政府文化與國內秩序的相互轉換.....	24
第三節、各類型無政府文化轉移的臨界點.....	32
第四節、將外因機制納入考量的不對稱賽局模型.....	46
第三章、三種外因機制與 20 世紀初沙俄所處戰略賽局.....	49
第一節、結構系絡機制.....	49



第二節、系統過程機制.....	54
第三節、策略實務機制.....	56
第四節、1904 年的沙俄：集體身分對戰略能力影響加劇.....	62
第四章、加邦案例：以結構系絡重塑身分.....	70
第一節、共享知識作為賽局中的被操作物.....	70
第二節、集體身分衰退的典型.....	74
第三節、結構系絡轉變的影響.....	77
第四節、結構系絡變遷伴隨戰略賽局變換.....	79
第五章、芬蘭與波坦金案例：系統過程與策略實務的賽局應用.....	83
第一節、先於戰略賽局而存在的集體身分分裂.....	84
第二節、共同他者的存在與互賴形成.....	85
第三節、攸關權力轉讓的戰略賽局.....	86
第四節、中心層級權力耗弱與賽局變化.....	89
第五節、邊陲與邊陲間的學習與教導.....	93
第六節、我群的瓦解.....	97
第六章、結語：身分作為戰略重心.....	98
第一節、身分形塑與戰略賽局的關聯.....	98
第二節、集體身分與戰略能力的掛鉤.....	99

第三節、身分作為戰略的核心考量.....	101
參考文獻.....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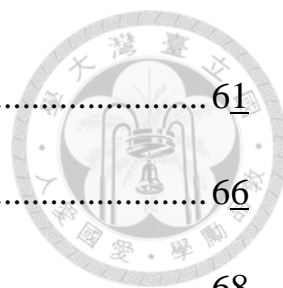


表圖目次



圖 1-1 研究架構圖.....	18
圖 2-1 巴里·布山的國家模型	23
圖 2-2 約翰·加爾通的中心—邊陲模型	23
表 2-1 以集體身分設定行為者作為國家的標準	21
表 2-2 兩國進入國內秩序前後的無政府文化變遷：以波蘭立陶宛、大 不列顛與西班牙為例.....	28
表 2-3 溫特的三種無政府文化與不同內化等級	32
表 2-4 從霍布斯文化進入洛克文化的內化程度演進時間表（以日韓、 法德、日俄為例）	366
表 2-5 從洛克文化進入康德文化的內化程度演進時間表（以法德、美 加、義大利與聖馬力諾為例）	42
表 2-6 三種無政府文化轉換與內化程度演進彼此關係	44
表 2-7 各善意等級與其內涵示意	455
表 2-8 囚徒賽局示意.....	466
表 2-9 實力不對等下的囚徒賽局	47
表 2-10 其它邊陲層級率先反抗後的囚徒賽局	48

表 3-1 塞爾維亞起義與希臘起義與俄國歷次合作結果	61
表 3-2 克里米亞戰爭與日俄戰爭對沙俄造成壓力比較	66
表 3-3 1863 至 1905 年間沙俄國內年均罷工次數	68
表 4-1 1904 年到 1918 年沙俄與俄國工人階級間賽局	80
表 4-2 血腥星期日前夕俄國工人階級想像中的賽局	80
表 4-3 環境惡化後的沙俄與俄國工人階級間賽局	81
表 5-1 日俄戰爭期間與日本援助芬蘭起義與否的賽局	88
表 5-2 中心層級與邊陲層級間賽局	90
表 5-3 中心層級實力被削弱後的賽局	91
表 5-4 沙俄 1905 年上半葉國內騷亂事件發生時間	94
表 5-5 沙皇政權與國內各群體間的囚徒賽局	95
表 5-6 俄國 1905 年革命爆發後囚徒賽局	96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本研究旨在探究於戰略賽局 (strategic games) 下，如何藉由溫特 (Alexander E. Wendt) 所提出的三種外因 (exogenous) 機制：結構系絡 (structural contexts)、系統過程 (systemic progresses) 與策略實務 (strategic practices) (1994:388-391) 影響行為者集體身分形塑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進而運用集體身分的變化來改變行為者戰略能力 (strategic abilities)。簡言之，本研究欲瞭解：改變行為者的集體身分，是否有助於連帶改變行為者的戰略能力。本文所謂戰略能力，僅簡略指涉到行為者於戰略賽局中可使用的權力 (power) 總量。

本研究以可用於改變集體身分的外因因素 (如：共享知識、互賴、利益算計) 作為自變項，以藉內化而生的集體身分作為中介變項，以行為者所持有且可投入戰略互動過程的權力作為依變項，釐清三層變項之間關聯性，並借助賽局理論檢視此種關聯性。

為於案例中妥適詮釋與檢驗論述，本研究在案例遴選上基於適用性、重要性與起始性考量，選用 1904 年至 1918 年間的俄羅斯 (以沙俄末年為主)¹ 作為驗證論述的時空跨度。筆者認為，自 1648 年歐洲西發利亞體系奠定以來截至 19 世紀末，集體身分對於戰略賽局的影響未稱顯著；然在 20 世紀初，伴隨 1770

¹ 本文將此一時期的俄羅斯帝國 (Russian Empire) 依清末民初中文習慣略稱為「沙俄」；惟本文所言沙俄並非特指彼得大帝更改國號前存在於 1547 至 1721 年間的俄羅斯沙皇國 (Tsardom of Russia)，本文討論不觸及沙皇國與帝國之辨。筆者於行文中統一不使用「帝俄」一詞，以免產生定義混淆。另，文中出現「俄國」與「俄羅斯」處，則泛稱 1547 年至今所有以俄羅斯民族為主體的政權。



年代以來工業革命與浪漫主義人文思維的發展成熟，人本意識的昂揚、社經結構的兩極化、兵役制度的改變與戰爭殺傷力的提升，使戰爭備需仰賴平民意願支撐，人類集體身分由是趨於重要。惟上揭情形在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以前，筆者以為歐洲主要國家尚未受此變革大幅衝擊。自日俄戰爭爆發至俄國 1917 年革命與 1918 年紅白內戰衝擊歐洲局勢為止，集體身分對行為者戰略能力的影響於地域、於頻率、於幅度均深切影響國際體系變遷，該現象為 19 世紀以前所未見。據此觀之，本研究選用案例應可稱具備歷史上的起始意義。

筆者認為溫特所提三種影響集體身分形塑的外因機制：結構系絡、系統過程與策略實務，於本研究所欲檢視時空跨度中均產生顯著影響，此間對應如：結構系絡機制之於 1905 年東正教神父喬治·加邦 (Georgiy Apollonovich Gapon) 所領導的聖彼得堡工人集會請願事件；系統過程機制之於 1905 年日本對芬蘭武裝起義的促成；策略實務機制之於 1905 年黑海艦隊波坦金號軍艦 (Battleship Potemkin) 叛變事件。三起事件分別反映出三種外因機制特性，且均對當時沙俄與國際主要競爭對手間戰略賽局產生一定程度影響。貫穿 1904 年至 1918 年，三種機制繼續對俄國發生影響，且依時序 (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 為不同競爭對手所利用，最終導致作為集體身分的沙俄在 1917 年徹底崩潰，並於 1918 年通盤重塑。

本研究以沙俄為典型對本研究論述之機制進行檢視與驗證，盼能整理出藉集體身分重塑戰略能力的影響條件、影響途徑與影響層面，進而確認本研究論述對跨時空案例的普遍解釋力。

貳、研究目的

非物質層面對戰略的影響已在若干論述中被提及，惟既有論述多著重在國家間的合作與安全問題的去安全化，強調集體身分形塑，而較少著眼於集體身



分的裂解與國家間的衝突面。本研究希望運用既有的論述，將國際關係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y）觀點深植進對戰略的討論中，並將賽局概念具體導入建構論戰略觀，為國家間的戰略互動過程提供另一種觀察視角。

透過理論回顧與案例檢視，本研究期望解決二項問題：

其一，集體身分的改變是否可以連帶改變結構中權力分配；若然，集體身分係藉何種途徑、於何種層面、以何種程度對權力造成影響。在實務上，行為者如何將集體身分作為戰略工具運用，所產生影響力強弱如何。

其二，在溫特「國家中心論（state-centric approach）」脈絡下，如何以集體身分為基準，將兼具權力、身分與制度三者的非主權國家（如：殖民地、民族、人群等）納入國家範疇進行討論，以利瞭解此類行為者在集體身分形塑與戰略賽局互動中所扮演角色與所發揮影響。

本研究冀能發掘觀念（idea）層面因素對國際戰略而言之重要性，證明觀念於國際戰略領域中重要性不亞於權力，二者在戰略賽局之策略運用上屬相輔相成。本研究盼呈現出一事實：無論基於物質基礎而生的軍事作為，抑或基於觀念基礎而生的集體身分操作，均能有效改變國際體系當中權力結構，惟前者係藉權力間的相互抵銷與耗損為之，後者則是運用身分與權力的連動性來改變結構內權力分布狀況。

社會建構主義於戰略層面的運用，已有戰略文化研究與安全研究等嘗試（莫大華，2003）。本研究希望跳脫「形成彼此集體身分」以及「探討區域戰略文化差異」的安全問題觀點，將建構主義論述直接導入國家間衝突面，建立可跨地域普遍適用的一套戰略觀，以呈現戰略本質的另一樣貌，證明集體身分的轉變不僅只是可達成戰略、戰爭目標的可用工具，更可能是戰略與戰爭的根本目的之一。

第二節、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本研究以溫特對集體身分形塑的論述作為主要研究途徑，依據「結構系絡」、「系統過程」與「策略實務」等三種影響集體身分形塑的外因機制，檢視行為者如何藉由操作集體身分來改變自身與對手間的相對戰略能力。

在結構系絡機制分析框架下，本研究循溫特論述探究共享知識對集體身分所造成的影響，瞭解共享知識如何被嵌入互為主體性系統性結構中，進而改變集體身分；並藉由溫特對三種無政府文化的論述，推論霍布斯、洛克、康德等三種無政府文化間基於內化程度而轉換的關係，釐清集體身分與國內秩序凝聚與瓦解的漸次過程，探知結構系絡機制在戰略賽局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系統過程機制分析框架下，本研究循溫特論述探究互賴關係如何作為戰略賽局開啟的先決條件，瞭解行為者如何藉由新合作關係的建立與權力的移轉來破壞既存於敵對方內部的集體身分，進而達成戰略目標。又須瞭解，此種循系統過程而生的集體身分，對戰略賽局的互動過程而言何以不可或缺，在集體身分作用下又為何能使賽局運作合乎理性選擇。

在策略實務機制分析框架下，本研究循溫特論述探究戰略賽局下利害變化與行為者預期心理如何共同影響集體身分的形成，進而促使行為者做成決斷。於此欲瞭解，戰略衝突中的一方陣營如何利用賽局中的利害算計心理誘使潛在合作對象發生身分認同轉變，進而創造出權力結構上有利於我方的戰略形勢。

在掌握此三種外因機制對集體身分影響後，本研究將進一步探析集體身分對行為者戰略能力的影響情形，以證明本研究對諸變項關聯性之假設。



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法

本研究依據國際關係社會建構理論及相關著述來發展本文論述。透過對有關文獻的回顧，根據理論原著敘述進行脈絡歸結，確保本文一切基於理論的推導、比較與案例適用不致違反文本根本假定。本文針對引用既有理論工具所進行的各項論述，將併以實例論證，以證理論工具在各項案例適用上的解釋力以及諸理論相互結合運用的可行性。倘出現筆者觀點與原著歧異處，將明示分歧所在並闡明理由，進而提出可受觀察與理解之實務案例，以呈現筆者推論邏輯嚴密性，展示本研究試就既有理論做成補充之正當性。在引用文獻上，本研究以溫特對集體身分形塑之論述作為主軸，試圖掌握溫特原文重要意旨，裨利進行無悖原著論述基礎的引用與推論。

本研究以戰略賽局為選用視角，以策略互動為論述縱軸。在策略推擬的過程中，為還原行為者進行決策當下之環境條件，並對其決策行為模式進行推擬。在國際政治系統環境還原的工作上甚須仰賴對史料的回溯，以求於合理基礎上進行邏輯辯證，以減少系統環境推擬上的不合理性。至於模擬行為者決策模式的工作上，歸納上須蒐整文本對行為者經驗之描述，演繹上則可依據行為產出與行為者利益之關聯性，反推行為者可能之利益排序與決策依據。

二、歷史研究法

本研究欲以時間長度有限但涵蓋案例代表性充沛的時間跨度作為理論驗證背景，運用集體身分與戰略賽局概念對跨時空的人類經驗進行具普遍性與且主軸明確的歸結。惟時間回溯愈遠，當世國際政治結構、法律環境等條件便會與當代國際關係主流假定相距愈遠。本研究期能在不損及適用理論核心假定的情

形下，釐清當世物質、思想、規範上的基本情形，盡可能擇取跨時空皆準的理論模型慎用之。機此，本研究勢須借助歷史領域的研究方法，以維論述鋪陳上之嚴謹。



以歷史角度觀之，筆者認為在 1770 年代浪漫主義與工業革命並肩興起以前 (Drabble, 2009:1)，國家中心層級所享有的社會知識，並未與國家疆域內處於邊陲層級的的大部分人類所共享。1770 年代以後，歐洲國家逐漸轉變為具有現代國族主義特徵的新型態國家，但居住在亞、非等地舊形態國家的人類亦仍處於此種不受國家集體身分所繫縻的狀態。故理論上，在浪漫主義興起以前，結構系絡機制得以發揮作用的空間有限，身分對戰略的影響程度也不比今日。筆者欲循此歷史脈絡，藉國際關係理論對本研究選定時間跨度內諸項歷史條件進行耙梳。

透過對國際政治實踐經驗的檢視，本研究試以理論為工具，梳理出個案間關聯性，並依時間、空間等環境條件進行系統性歸納，提取其間規律。如出現偏離假設之個案經驗，將審視該個案是否存在理論模型未能涵蓋的變項，檢討原始假設之正確性，進而對假設進行修正。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以時間、空間跨度與主要行為者而言，本研究以 1904 年至 1917 年之間的俄羅斯帝國作為觀察對象，以日俄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對戰略賽局的觀察場域。

一、空間：俄羅斯帝國滅亡前 13 年的疆域以內

自拿破崙戰爭以降至 20 世紀初期，在當時主導世界秩序的歐洲強權：英、法、俄、德、奧、義、土之中，俄羅斯是歐洲本土民族身分最先遭到敵國利用的國家，也是唯一因工業革命後階級問題而遭徹底顛覆的國家。沙俄作為君主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單是在烏拉山脈以西、高加索山脈以北的歐俄地區，卻有大量的人口與經濟資源被涵蓋在非俄羅斯民族居住區：於 1905 年，全俄羅斯帝國的工人就有逾半數居住在由沙俄治下的波蘭會議王國境內（Blobaum, 1984:123）；在亞洲，俄羅斯的疆域更是涵蓋了俄羅斯人口尚未成功滲入的下高加索（今日喬治亞、亞塞拜然）與突厥斯坦（今日中亞五國）等地。沙俄民族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誠非其它列強所能相比擬。

單就歐洲本土而論，與民族組成相對單純的法、德、義相較，英、俄、奧、土均為民族身分較為多元的國家；然有別於作為聯合王國的大不列顛、採取二元國家制度的奧匈帝國、或者宗教身分較民族身分更占優勢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沙俄末年採取的民族治理政策，不是構築一個可含納多元民族身分的集體身分，而是強硬推行民族同化（O'Connor, 2003:58）。此種做法造成沙俄內部身分嚴重分歧，致使集體身分形塑格外艱鉅。

就經濟層面觀之，筆者認為基於俄羅斯經濟推展的後進性，使得俄羅斯民

族內部各階級間身分統合困難。除卻鄂圖曼土耳其不論，俄羅斯是歐洲六強之中工業化最緩慢、農奴制（serfdom）廢除時間最晚的國家²。在國內各階級社、經地位差距相對懸殊的情形下，可能使沙俄內部跨階級集體身分構築薄弱。


基於以上理由，本研究選擇以俄羅斯帝國疆界作為空間上的觀察範疇，以檢視此範疇內集體身分的特性與變化情形。

二、時間：1904 年 2 月 8 日至 1918 年 3 月 3 日

就時間起迄的選擇上，本研究以 1904 年 2 月 8 日日俄戰爭的開始（Kim, 2006:121）作為起點，以 1918 年 3 月 3 日蘇俄與同盟國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Tucker, 2005:225）作為終點。筆者認為，日俄戰爭於內涵上相當程度具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特性——不單只是武器與戰術層面，交戰國對集體身分的操作上也相當類似——或可稱其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預演；同樣地，1905 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也可視為 1917 年革命在各方面動員上的總預演。「預演」一詞同時意味類似型態事件在更早以前的時空未曾出現，於此可見俄國在 1904 年至 1918 年此段時間所遭遇的各項戰略競逐，實具備新時代——亦或稱之為「現代」——的諸多標誌性特徵。

1904 年 2 月 8 日的日俄戰爭爆發與 1878 年結束的第十次俄土戰爭相距 26 年，意味沙俄在日俄戰爭前已長達 26 年未與實力較為接近的列強正面交戰。此中，第十次俄土戰爭對沙俄而言亦僅只是一場實力懸殊且形勢一面倒的全面勝仗，回溯此前真正讓沙俄棋逢敵手的上一場戰爭，當屬 1856 年結束的克里米亞

² 大不列顛的英格蘭與威爾斯於 15 世紀下半結束農奴制（Cannon, 2002）；統一義大利前的薩丁尼亞於 1771 年 12 月 19 日（Blum, 1978）；法蘭西於 1789 年 8 月 4 日（Gasper & Geggus, 1997）；統一德意志前的普魯士於 1807 年 10 月 9 日（Kantowicz, 1975）；奧地利於 1848 年 9 月 1 日（Bedeleux, 1998）；俄羅斯於 1861 年 3 月 3 日（Corrin,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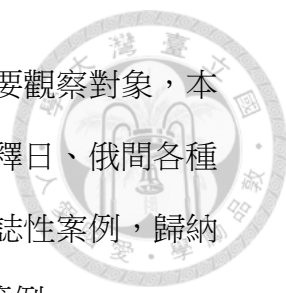
戰爭。從 1856 年到 1904 年，沙俄形同將近 50 年未參與勢均力敵的大規模戰事。以克里米亞戰爭與日俄戰爭相比，前者為沙俄國內帶來的負擔遠比後者承重，但與日俄戰爭相比，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與戰後，沙俄境內均未因不堪重負而掀起規模較大的民族起義或農奴起義；反之，日俄戰爭為沙俄國內造成的負擔相對較小，卻引發了一連串的民族起義、農工暴動與海軍譁變，此列動亂甚至足以被何稱為「俄羅斯社會主義革命勢力的第一次總演練」乃至於「第一次俄羅斯革命（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Trotsky, 1930)。筆者據此可假設，自 1856 年至 1904 年間，沙俄內部經濟條件與集體身分或已發生相當程度變化，致使身分問題為戰略賽局中的沙俄帶來過往所未有之巨大衝擊。

俄羅斯在 1917 年先後遭逢兩次革命，直接導致沙俄滅亡與蘇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 1918 年 3 月 3 日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為觀察點，成因上，該條約係因俄羅斯內部集體身分變化所導致；結果上，條約導致群眾身分認同上歧異於俄羅斯集體身分的大量地區、資源與人口自俄羅斯國內秩序中脫離、獨立，而在條約簽訂以前，更已有大量未遭同盟國占領區域自行宣佈獨立 (Thompson, 1996:159)。《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標誌著俄羅斯在長期戰略賽局中徹底失敗，縱而逐步邁入長達三年的國內混戰。鑒此，或可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視為集體身分問題重創此階段俄羅斯戰略能力的最終結果。

三、互動對象：日本、同盟國

本研究案例分析部分所選定的時間跨度，涉及兩組牽涉複雜當時國際政治主要行為者的戰略賽局模型：

第一組戰略賽局是 1904 年至 1905 年的日俄戰爭，以俄羅斯帝國與大日本帝國擔任賽局中的兩造，並涉及日本與沙俄國內次級集體身分的直接互動，關



係到互賴、權力移轉與利得計算等問題。以此賽局模型作為主要觀察對象，本研究將依據溫特提出的三種集體身分形塑外因機制，描述並解釋日、俄間各種涉及沙俄集體身分的互動關係，擇足以作為各項機制濫觴的標誌性案例，歸納案例內部戰略現象及賽局原理，做成足與後續事件比較的經典範例。

第二組戰略賽局是 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東線戰場，以俄羅斯帝國（與後繼者蘇維埃俄羅斯）與同盟國（以德意志帝國為主導者）作為戰略賽局的兩造，依據此段時期雙方賽局互動特點，與基於對前一賽局（日俄戰爭）檢視所得推論進行比較、佐證與補充。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理論背景為溫特〈集體身分的形成（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一文與《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行文中尤以溫特承繼自英國學派的三種無政府文化論述作為本文立論重要基石。然而，溫特雖曾依據三種無政府文化與三種內化程度（被迫遵守、因利遵守與主動遵守）畫出一套九宮格形式的集體身分分類圖（Wendt, 1999:254），卻未說明無政府文化的內化程度高低與無政府文化類形的轉變有何關聯性。是故本研究須先釐清此種關聯性，方能掌握集體身分建構與深化之過程，裨益檢視歷史案例中行為者對集體身分操作上的具體原理。

其次，溫特雖然抱持國家中心論，卻又明言其理論中之國家（state）定義可與現實主義有所不同（Wendt, 1992:424）。溫特在摒除國際組織此類非國家行為者在其理論中討論空間的同時，卻又為國家提供了較為寬鬆的定義範疇。同時，若於國際政治的討論上將集體身分納入考慮，便難以忽視許多既非國際組織、亦非主權國家，卻具有相當程度國家特質的行為者，諸如：處於割據狀態的交戰團體、受國家主權所覆蓋的單一民族或地域性群體、身分與利益乃至行為均

與國家中心層級相異的全國性群體。本研究為發展出適用性較高的論證過程，當基於溫特文本的脈絡予此番論證一套較為嚴謹且合宜的行為者定義。基此，本研究試圖做成一套可將上述群體涵括理論適用範圍內、卻又不違背溫特國家中心論精神的行為者界定方式。



第四節、文獻回顧



溫特在 1994 年〈集體身分形塑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一文中，針對身分對行為者利益與行為的影響做出論述，指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討論行為者間合作行為時，僅討論議價問題，卻忽視內因的偏好 (tastes) 等問題，導致分析上頗受侷限。溫特於此篇文章中對身分的討論，強調利益與行為的重要性：無論是著眼於單一國家構成上所談及外因 (exogenous) 之「整體身分 (corporate identity)」，抑或是溫特所欲討論、存在於多國系統 (states system) 間的內因 (endogenous) 之「社會身分」(social identity)，身分均具有替行為者設定利益 (defining interests) 與促使行為者採取行為 (taking actions) 的重要功能，二者均在「社會集體身分」(social collective identity) 形成過程中發揮作用 (Wendt, 1994:365)。鑒此，以「國家身分」作為行為者的界定標準，或不失為一種合理的定義方式。

「利益」與「行為」此二要項，已然是實證主義理論討論國家時的兩大主旋律，主流理論大致同意國家能依據其利益排序來產出行為。而依照溫特 (1994:365) 先有「社會結構」、再有「社會集體身分」、最終界定「利益」與產出「行為」的因果鏈來看，群體行為的缺乏與共同利益的模糊，或可以反映出該群體在社會集體身分上的薄弱。若國家確為社會集體身分所構成，則倘作為國家之群體其社會集體身分薄弱，或正意味該群體作為單一行為者的特性實亦薄弱。故筆者認為，在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戰略賽局命題內，以社會集體身分強弱程度界定群體是否有於賽局內擔任行為者之資格，應尚稱合適。此種定義量尺是具相對性的光譜式量尺，如何判定特定群體落於光譜上何點，宜以其利益與行為的「集體性」與「獨立性」來判定。

在此基礎上，溫特以例舉而非窮盡的方式提出的三種可形塑行為者集體身

分的外因機制：結構系絡、系統過程與策略實務（1994:388-391），本研究即循此設計分析框架。



溫特繼而在 1999 年《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中，於國家中心論的前提下，依循「結構系絡」機制當中互為主體性的概念，提出了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可能存在的三種無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三者雖均為無政府文化，但行為者間互動模式存在巨大差異。溫特又對三種無政府文化的內化程度進行細分，依據行為者對無政府文化的內化程度，由淺至深將行為者遵守無政府文化的原因分類為「強迫」、「利益」與「威脅」等三個等級 (Wendt, 1999:254)。

然而，針對此套論述，仍存在著尚未填補的空白處：

其一，依然抱持國家中心論的溫特，卻對國家的定義保留了彈性空間，言明其理論對國家的定義為必要與現實主義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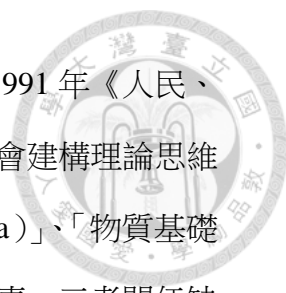
其二，溫特的論述並未說明行為者如何在不同無政府文化間移轉，亦未解釋無政府文化的內化程度會對無政府文化的轉移造成何種影響。

其三，溫特的論述著重在合作關係的產生，較少論及反向的合作瓦解問題。

其四，溫特僅將集體身分代表的觀念層面重要性上升至與權力所屬的物質層面對等的地位，卻未提及集體身分與權力之間是否存在關聯。

壹、國家中心主義與傳統國家界定

筆者就實證主義理論對國家的定義進行回顧。根據馬丁·蕭 (Martin Shaw) 所言，國際關係理論主流學派中對國家的定義存在一固定論點，即國家係整合為一之主體 (one-integrated subject)，為國際體系中相互競爭之單一行為者 (Shaw, 1994:1-9)。此種定義雖明確但簡略，且將國家的行為模式固定在「競爭」的關




係上，有其侷限性。筆者因此借用巴里·布山（Barry Buzan）1991年《人民、國家與恐懼（People, States and Fear）》一書中所提出同樣基於社會建構理論思維的「國家模型（state-model）」理論，指出國家存在「觀念（idea）」、「物質基礎（physical base）」與「機構（institutional expression）」等三種要素，三者間任缺一項，國家就不復存在（Buzan, 1991:60, 70, 82）。

溫特主張國家中心論，強調其社會建構理論以「國家」作為主要行為者，一切討論聚焦於國家層級上。溫特認為，國際社會的能動者即國家，非政府組織雖然在國際社會中活動能力漸強，但其並非國際社會之主體成員，充其量僅為國際結構當中的填充物，故不將渠等列入討論（Wendt, 1992:424）。

然而，溫特對其所謂的「國家」定義為何，並沒有給予一個明確的界定。惟溫特在主張國家中心論的同時，強調其所謂的「國家」未必等同於現實主義所言的國家，依據對國家本質的不同定義，亦可建構出不同樣貌的國際結構與運作思維（Wendt, 1992:424）。因此，筆者試採取一套以「國家集體身分」為主軸的行為者判定門檻，以適用於本研究所指涉的戰略賽局中。

檢視實證主義理論關於國家之基本理解，大致如是：國家涉及四個要素，分別是異化、集中化、對於領土範圍之權力行使以及對特定領域具行使權威的獨占權力。長久以來，國家已被化約為國家領土集體（national territory），國家係「基於法律及外交目的所形成之人民所組成領土組織，作為國際體系合法對等成員」，另「其為組織人民參與國際體系之工具」，構成國家中心論之理論典範及國際實踐型態（Shaw, 1994:1-9）。

惟在國際戰略賽局的場域中，某幾種行為者是否可將其視為國家（或具有類似國家性質的行為者），便值得討論，諸如：交戰團體、受統治民族、反政府人群。這些群體多半不具所謂「領土組織」的特性，即使偶然有之，並且滿足「異化、集中化、對於領土範圍之權力行使以及對特定領域具行使權威的獨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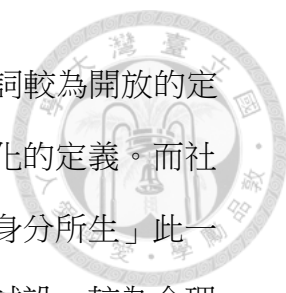


權力」這四項要素，也顯然難以被國際體系接納為「國際體系合法對等成員」。在此門檻下，領域跨越多國、具有獨立武裝與治理組織的庫德族（Kurd）未必足以跨過實證主義對國家的定義門檻；征戰西亞多年、影響力遍及全球的 DAESH（又稱 IS 或伊斯蘭國）可能無法被「完整地」納入討論；對國家身分、國家利益之認知與政府截然不同，同時具有廣大群眾支持的特定國內團體與主張（諸如共產主義、女性主義、環保團體、反戰團體等），也必須與其所在國共同被視為單一行為者。

貳、藉由以集體身分為中心的視角觀察行為者

如果站在以人類「身分」為核心的觀點，上述群體在國際關係中被忽視的情形，顯然是有悖於現實經驗的。尤其在戰略賽局系統中，不將此類群體視為行為者來討論，更將直接致使觀察者無法掌握問題根本。依據加爾通的《戰爭系統》一書，地位處於國家中心（center）之外的國內邊陲（periphery）地區與人群等，反而是各類型戰爭發生的熱點所在（Galtung, 1980:179-186）。若是在現實主義基於物質基礎的討論框架下，前述群體均不會被視為國際結構中的重要行為者，現實主義者大可將此類群體掃出國際政治的討論框架。

而溫特的理論作為一種以身分（identity）為討論核心的論述，若將此類群體置之不理，或者囫圇吞棗地視其為單一國家的構成部分，此種以「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國際社會進行討論，在溫特以「身分」為出發點的立論底下，不免略顯尷尬，並將造成理論對現實世界解釋力降低。譬如：對於南蘇丹、索馬利亞此種國內整合度低落的國家，應如何適當地討論其與它國所共處的無政府文化與內化程度為何？或許可以只討論該國執政當局、優勢族群與它國間之互為主體關係，但一旦觸及必須審慎估量「權力（power）」分佈的戰略格局問題，此種理論上的簡化便將使其對個別案例的解釋能力與預測能力大幅降低。



溫特並未對國家定義給出明確界定，反倒給予「國家」一詞較為開放的定義空間，此套理論工具的使用者可依問題意識需要賦予更多元化的定義。而社會建構理論所思考的問題之一，即包含「國家是否可能由集體身分所生」此一問句。基此，本研究得以在合乎溫特理論核心價值的前提下，試設一較為合理的行為者定義。


筆者兼採加爾通所提出的「中心」與「邊陲」概念，使用在對社會建構理論的闡述上，裨利將兼具布山所提國家三要素的非主權國家行為者依情況涵納入理論適用範疇。而布山對於「觀念」、「物質基礎」與「機構」三者連動關係的陳述，亦同時有利於處理前述溫特論述空白處的第四項。

參、集體身分的戰略意義

前述溫特論述空白處的第二點與第三點，筆者擬借助前述溫特於 1994 年發表的〈集體身分形塑與國際國家〉一文作為理論工具，透過對歷史案例的經驗歸納得出解答，並佐以簡單的賽局理論作為析論工具，歸結各情境下的行為者決策原因。

除上述文獻外，查其它國內外既有研究，亦無針對溫特三種無政府文化的轉移關係以及集體身分的逆向解構問題進行討論者。蓋溫特社會建構理論被提出的原始本意，即是探討國家間合作以及世界國家形成的可能性，自然較少於戰略與衝突層面的是用與討論。而其他建構主義學者如江憶恩 (Iain Johnston) 與卡贊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等針對戰略領域的著述，但多聚焦於戰略文化上，強調不同文化建構所造成的戰略思維差異，少見通論性的戰略論述。基此，本研究所針對領域，應尚存有開拓空間與開拓價值。

在布山的國家模型當中，布山提出以國家內部整合程度 (integration/disintegration) 來作為「強國 (strong state) / 弱國 (weak state)」



的一種判別標準，並以一種三角形模型來呈現其對整合程度的定義，該模型即是由前述的概念、機構與物質基礎等三項因素所共組。布山指出，三項要素之中只要有其中一項貧弱或缺，國家就不復存在；其中，布山（1991:65, 70, 82）明言其所談論的「國家概念」一項，所指涉者就是身分（identity），並稱國家概念即為「國家政治身分的心臟（heart of state's political identity）的建構，並決定了國家的組織方式、涵蓋對象與存在理由。布山所謂的「國家概念」，諸如意識形態與民族（nationality）等。由此可見，集體身分確實或可作為構成國家的基本條件來討論。

肆、身分形塑過程中的合作與非合作賽局

賽局在本研究中的運用場域，存在於各種集體身分形塑機制之間，筆者並試圖將身分的概念帶入賽局運用上。溫特在其有關策略實務的論述中，本已將帶有賽局色彩的行為者間策略問題帶入討論，但並未正式談及賽局理論（Wendt, 1992:424）。筆者希望將賽局概念具體導入該命題，試圖用賽局解釋集體身分發展過程中各情境間轉變的諸項環節；其中，以非零和的合作賽局兼以解釋系統過程機制與策略實務機制。在賽局理論的運用上，以最簡單的典型囚徒賽局模型數值作為原型，並加上重複賽局、能力不對稱等概念，使本研究的賽局論述豐富化，增強論述解釋力。

第五節、研究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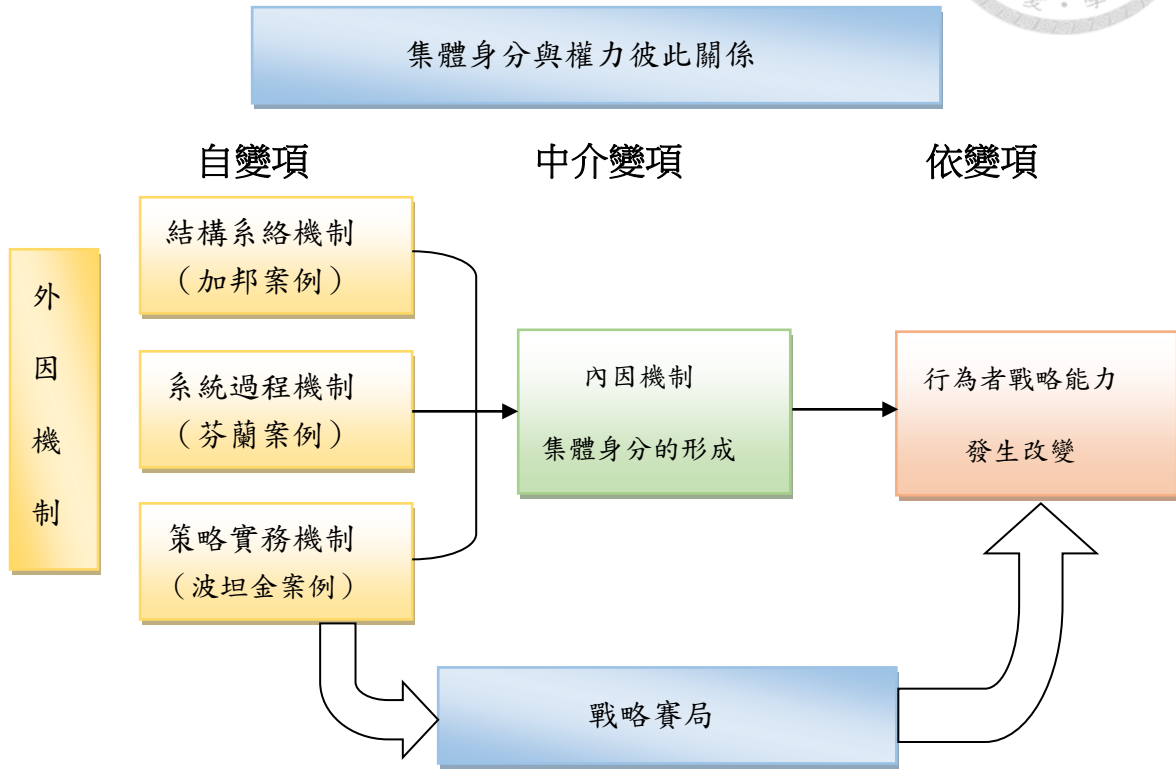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二章、無政府文化轉移、行為者拆合與 戰略賽局



本研究採用溫特的論述作為研究途徑，以涉及集體身分的戰略賽局作為觀察對象。筆者所欲觀察的賽局，發生在參與戰略互動的各行為者之間，以溫特所提出影響集體身分形塑的三種外因機制作為行為者的選項，檢視行為者各選項在賽局中對應到的損益關係。因此，本章首先需要釐清：孰為參與戰略賽局之「行為者」，又其本質為何、如何發生轉變；而集體身分與單一行為者之間的關聯性又為何。筆者欲自此過程中，以賽局解釋各種變化的環節與各階段間的臨界點。

第一節、以集體身分界定行為者

溫特舉出「整體身分」與「社會身分」等兩種身分的存在，指兩種身分可共組為「社會集體身分」，並將帶來行為者間的集體利益與集體行為。溫特並舉出「結構系絡」、「系統過程」與「策略實務」等三種集體身分建構的外因機制，說明集體身分何以外因產生並內化（Wendt, 1994:365）。

在國際關係的場域上，除社會集體身分以外，仍須以該群體持有權力強弱來判定其作為行為者的重要性高低，筆者以為此即溫特將國際組織排除於理論討論核心之外的關鍵。該群體所持有權力多寡，以及其運用權力所產出的行為在國家層級的觀察下是否具有意義，亦當作為國家定義的判別標準之一。

而作為討論國際社會的理論，群體必須要有與它群進行有意義互動的能力，方具被列入討論的價值。故在對外的社會關係上，群體對外行為是否足以在個別議題中對整體結構產生影響的能力與意願，是一大判定標準。



壹、本研究界定行為者的判準

續前所述，筆者認為凡群體身為兼具社會集體身分、互構能力與權力的獨立行為者，即大抵具備於國際政治層級中作為行為者被討論的價值。故於本研究定義下，只要群體滿足於上三條件，筆者便姑且將其視為在身分（identity）與權力（power）上均具備國家能力（ability as a state）的單一行為者討論。在此標準下，國際政府間組織（IGO）顯然不能被視為國家，因其不具有獨立於它國而自存的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非政府組織（NGO）雖然可能存有獨立於它國的利益設定，但其所持權力通常十分有限，無法產出在國家層級下有意義的獨立行為，多半只能透過號召與呼籲來施展影響力，顯不能視其為國家。惟大型企業與大型跨國企業確實可能在單一議題中完全滿足上述條件，因此循本研究定義，在極端情況下的特定案例當中，企業或可允許被視為合理行為者看待之；但此種情形不容易達成，因為企業所能握有的群眾基礎通常較為有限，且在國際政治場域上難以形成一致性的身分立場。

筆者將上述條件與對應案例整理於下表：




表 2-1 以集體身分設定行為者作為國家的標準

國家門檻		合乎標準的主權國家	合乎標準的非主權國家	略低於標準的主權國家
社會集體身分	群體是否能有獨立於他者的群體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	瑞士	歐盟	依附於瑞士的列支敦斯登
		1991 年前尚未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索馬利亞	索馬利亞海盜與當地民眾構成互利共同體	處於軍閥割據狀態的主權國家索馬利亞
互構能力	群體行為是否足以與外部社會進行互構	尼泊爾	1996 至 2006 年的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與其控制區	通常與鄰國無爭、將外交權利讓渡與印度且處於半隔絕狀態的不丹
權力	群體所持有的權力與運用權力所產出之行為，在國家層級的觀察下是否具有意義	西班牙	加泰隆尼亞	安道爾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所謂「獨立於他者的群體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是加爾通所提出的「中心—邊陲」論述或不失為一種對其理解的良好途徑。加爾通以美國為例，五角大廈屬於國家中心，而美國的藍領階級相對而言就屬於邊陲（Galtung, 1980:179-186）。邊陲往往會具備有別於國家中心的利益排序與身分認知，但通常欠缺採取獨力行為的意願或能力，或者在國際議題上仍服膺於國家中心的意志，故不應視其具備社會國家之地位；反之，則應於個案中以國家看待之。

在此判斷標準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與法國各自的國內工運團體，因其未能做出有別於國家中心參戰行為的獨立行為（如：拒絕參與戰爭、串聯跨國無產階級革命等）。渠等身分上仍視敵國為對手，利益上認為敵國對自身威



脅更甚於階級剝削，行為上配合國家作戰，因此不能視為具備立社會國家身分的群體；但俄羅斯帝國底下的社會革命黨（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³及其支持者與武裝組織便有別於此，其於身分上不視敵國為主要敵人，利益上認為對自身安全的威脅來自剝削階級而非外國，行為上反對作戰且發動武裝革命（Hildermeier, 1978），因此可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為有別於沙俄的獨立行為者。

貳、行為者的可重組與可分裂特性

從表 2-1 的標準來看，意識彼此矛盾、行為實質對抗但未必走向暴力衝突的複數國內群體（參戰政府與反戰示威者、資本主義政府與共產黨控制區、殖民政府與受號召參與非暴力反抗的群眾），與被國際普遍承認的分裂國家（如南北越、南北韓、東西德）相較，實際上存在許多共通性，只是程度強弱差別而已，前者與後者並沒有一個非常明確臨界線，主要區別僅在於外國人如何看待此類群體（同樣分治，兩韓被普遍視為兩個國家，南、北賽普勒斯被普遍視為同一個國家；菲律賓共產黨的控制區不被視為一個政權，不合作運動時期英政府無法有效控制的印度群眾仍被視為英國臣民）。由此可見，在集體身分論述中對國家的定義上，誠有需要採取一套靈活且具鑑別度與案例適用性的定義標準。

鑒於以上可發現，單一國家國內秩序與複數國家／分裂國家之間的轉換，是一個涉及身分、利益與行為等多重變項的過程，而非一線判然。布山的國家模型理論指出，國家存在觀念、物質基礎與機構等三種要素，三者間任缺一項，國家就不復存在，如圖 2-1 所示。其中，觀念即指涉到溫特所述的身分。如果作為觀念的身分強弱可以影響國家存在的表現強弱，則身分的裂合與行為者的裂合便存在

³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自 1903 年起分裂為所謂「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與「孟什維克（Mensheviks）」兩大派別。



邏輯上的關聯性。而群體在脫離與其它行為者共組的國內秩序以前，其作為行為者的存在表現，則借用加爾通《戰爭系統》所描繪的中心(center)與邊陲(periphery)關係描述之，如表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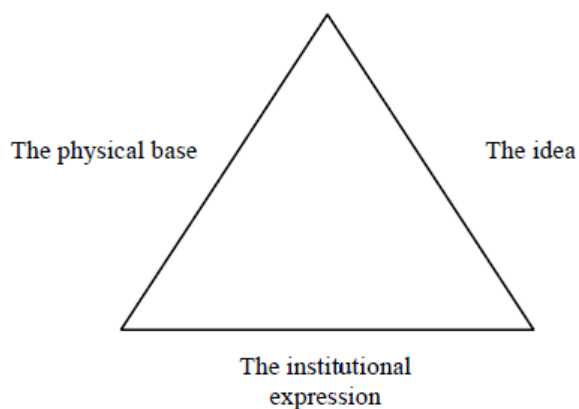


圖 2-1 巴里·布山的國家模型

引用來源：Buzan, Barry, 1991.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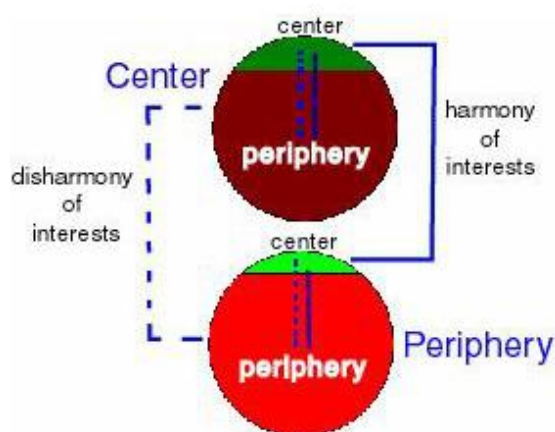


圖 2-2 約翰·加爾通的中心—邊陲模型

引用來源：Galtung, John, 1980. "The War System." *The True World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79-186.

實證主義所談的國家，是一種類似古典化學當中「原子」的概念，係不可拆解的最小單元體，在國家以下的事物一概無討論必要；惟若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國



家本身是被建構出來的集體身分，而國家又可以建構出更大的集體身分，那就必須假設國家底下的次級群體集體身分與國家以上的跨國集體身分，具有某些相同的本質，一如類似於「分子」的概念。

第二節、無政府文化與國內秩序的相互轉換


溫特在《國際關係的社會理論》一文中，將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區分為三種文化：服膺於所謂「自然狀態」叢林法則的霍布斯文化、建構出彼此合作可能的洛克文化及放棄以武力解決彼此爭端的康德文化。對此三種無政府文化所構成的國際社會，溫特又給予三種界定其內化程度的量尺：被迫遵守、因利遵守與主動遵守。藉此劃分，溫特將國際社會不同類型無政府文化以九宮格的方式呈現（Wendt, 1999:254）。

溫特將國際社會上的各種無政府文化與內化程度，區分為九大類，各類都有相對應的國家實例。而在此需要探討的問題是：行為者邁入或脫離國內秩序的情形，會發生在九大類型中的何種類型底下。

壹、複數行為者如何進出國內秩序

直觀而言，國家的合併自然可以粗略劃分為兩種方式，即「被迫合併」與「自願合併」，筆者為此二類合併方式各舉數例如下：

被迫合併的案例，大致因遭受權力壓迫（以武力為主）而發生，如 1871 年普魯士迫使巴伐利亞加入德意志、1910 年日本併吞大韓帝國、1979 年印度併吞錫金王國等。這些案例中，很顯然前者均不承認後者生存權，而併吞的行為也顯示前者並沒有保持後者存在以作為對手的需要，因此大多屬於霍布斯無政府文化中「因利遵守」的內化程度；少數為避免已遭擊敗的宿敵復甦而試圖併吞宿敵的案例，則可能屬於「被迫遵守」的類型。



這種脅迫所產生的集體身分關係，確為溫特論述所考慮。溫特曾提及，強國可以脅迫弱國接納與前者相同的身分（Wendt, 1994:388-391）。普魯士迫使巴伐利亞接受德意志身分，再推行德國統一；日本在迫使大韓帝國接受日本身分的同時，推動日韓合併；此種過程正符合溫特所述，也證明武力併吞不光是權力上的宰制，也必須伴隨對被合併者身分的轉化。作為強國的一方在徹底壓制弱國後，亦仍須著手重塑社會集體身分，可見國家明白塑造集體身分的重要性與忽略集體身分形塑恐引發的負面影響。

惟於此暫且不提被迫合併的國家案例，而先觀察國際政治行為者自願走入國內秩序的三種典型：

一、波蘭與立陶宛：形成波蘭立陶宛聯邦集體身分

1569 年，波蘭與立陶宛為面對俄羅斯與瑞典等國的威脅，在盧布林聯合（Union of Lublin）中自願結為共主邦聯，日後合併為波蘭立陶宛聯邦（Dybaś, 2006:75）。兩國的關係在合併前夕屬於「被迫遵守」的康德文化。

波蘭立陶宛於 1795 年滅亡後，兩國均在 1814 年法皇拿破崙一世征俄時爭取到自治，立陶宛人欲與已經存在的法屬波蘭人附庸國「華沙大公國」進行聯合，惟此期望未為拿破崙所接受（Rembowski, 1896:81-83）。此種基於歷史感情的直覺，顯示波蘭與立陶宛在長期共處國內秩序以後，彼此關係已從的康德文化中的「被迫遵守」上升到「主動遵守」的內化程度。

二、英格蘭與蘇格蘭：形成大不列顛集體身分

1707 年，曾為爭取獨立而與英格蘭鏖戰數百年的蘇格蘭，為殖民巴拿馬失敗導致的巨額債務所迫，同時商人又期盼能在英格蘭的廣大殖民地經商，因此主動同意與英格蘭合併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Whatley, 2001:57）。兩國的關係在




合併前夕屬於「因利遵守」的康德文化。

蘇格蘭經歷與英格蘭長達 200 年的國內秩序以後，獨立意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出現起色 (Marr, 2013:82)，並在 2014 年走向獨立公投的道路，但終以些微票數差距失敗 (BBC News, 2014)。2016 年，聯合王國在公投決定脫離歐盟後，多數民眾支持留歐的蘇格蘭，在民調中支持獨立的一方一度明顯取得優勢，支持比例高達 59% (Sunday Post, 2016)。另外界意外的是，依據 2012 年一份由《星期日電訊報》委託 ICM 所做民調指出，英格蘭人實際上也並不執意希望蘇格蘭續留在聯合王國，在受訪的英格蘭民眾中有 43% 支持蘇格蘭獨立，卻僅有 32% 反對 (The Sunday Telegraph, 2012)。惟若以「是否考慮以武力解決爭端」來作為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的分界，英、蘇彼此間的社會關係確實還停留在康德文化 (雙方始終沒有發生類似愛爾蘭獨立戰爭的暴力行動與武裝鎮壓)，且已經上升到「主動遵守」的康德文化；但雙方彼此合併為單一國家的意願已顯然不比 310 年前兩國合併的當下。基此，顯見社會關係內化程度與是否願意保持國內秩序並無絕對關聯。

三、卡斯提爾與亞拉岡：形成西班牙集體身分

1479 年，卡斯提爾與亞拉岡在收復失地運動後，自願結合為共主邦聯，日後合併為西班牙 (Ruiz, 2007:78)。兩國是在掃除伊比利亞半島穆斯林威脅後才合併，當時西面的葡萄牙國力不及卡斯提爾，北方作為潛在威脅的法國尚深陷英法百年戰爭泥淖，亦未成氣候，可見雙方的合併動機主要並非基於對抗共同威脅；彼此基於王室聯姻的結合，反倒具備帶有基督教神聖性的規範性質，確實有點溫特所言「合法性」的意味。因此，兩國在合併前夕所共處的無政府文化較接近於「主動遵守」層級的康德文化。

今日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是 12 世紀至 15 世紀亞拉岡王國底下的構成部



分之一，加泰隆尼亞區旗與獨立運動所用旗幟，亦與當年的亞拉岡王國旗幟同源。加泰隆尼亞地區於西班牙統一後，不斷在地方衝突中喪失自治權；19 世紀下半葉，加泰隆尼亞發展為西班牙最重要的重工業區，加之語言與文化上的獨特性，20 世紀以來數次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權（Mar-Molinero & Smith, 1996:194），但也幾度被馬德里當局剝奪自治，1938 至 1953 年甚有逾 4000 名加泰隆尼亞人於佛朗哥執政期間遭到處決（Guibernau, 2004,30）；21 世紀以降，占地僅西班牙全境二十分之一的加泰隆尼亞，經濟產值高達全國十分之一（Datosmacro.com, 2017），成為西班牙最富裕的地區。2010 年以後，加泰隆尼亞民眾支持獨立比例逐漸上升，甚於 2014 年自行舉辦獨立公投並獲得壓倒性的同意票，惟投票率僅 41.6%，整體民眾對獨立的支持度仍具爭議（Field, 2015:117）。

加泰隆尼亞至今仍在和西班牙當局進行法律戰。雖然加泰隆尼亞民眾對獨立問題的態度正反參半，但西班牙本土從根本上否定加泰隆尼亞的自決權且未排除動武可能，過往也曾發生過打壓自治權的流血事件，雙方民眾彼此多有齟齬，可見彼此關係已從 1479 年「主動遵守」層級的康德關係降至「因利遵守」層級的霍布斯關係。



表 2-2 兩國進入國內秩序前後的無政府文化變遷：以波蘭立陶宛、大不列顛與西班牙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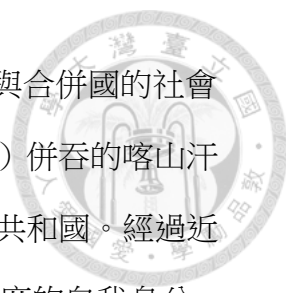
	進入國內秩序當下	較晚時間點
波蘭 與立陶宛	1569 年 盧布林聯合	1814 年 拿破崙征俄
	被迫遵守層級康德文化	主動遵守層級康德文化 希望回到國內秩序
英格蘭 與蘇格蘭	1707 年 聯合法案	2016 年 蘇格蘭獨立公投
	因利遵守層級康德文化	主動遵守層級康德文化 續留國內秩序意願低
卡斯提爾 與亞拉岡／ 加泰隆尼亞	1479 年 成為共主聯邦	2010 年 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
	主動遵守層級康德文化	因利遵守層級霍布斯文化 續留國內秩序意願低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由此可知，國家從無政府狀態下的同盟關係主動走向國內秩序，基本上一定要先步入康德文化，且在任何內化程度的康德文化下均可能發生。實際上，這種非暴力的自然融合過程，與人類歷史早期複數部族融合為部落聯盟乃至於國家的進程，於社會集體身分建構的過程上道理可通。如此一來，國家間集體身分的建構過程，便可用於參照並解釋國家內部複數行為者間結構系絡的存在與演變。

由以上案例可見，複數國家在走入國內秩序後，彼此社會關係上的無政府文化特質特性似乎不會瞬即消失。檢視上述各類型案例後可得兩點論證：

首先，統一國家裂解後所產生的無政府文化，並非在國內秩序瓦解時才一夕間產生，而是繼承自合併前的無政府文化，並在共享國內秩序期間發生一定程度質變後循此脈絡而產生。由此可見，當兩國之間無政府狀態轉變為國內秩序以後，除非作為故國構成部分的民族、語言、價值遭到徹底同化，否則彼此間共處之結構系絡仍會持續存在，並會潛伏於國內秩序底下持續發生演變。



即使是在霍布斯無政府文化的情境下被迫合併的國家，其與合併國的社會關係也有可能發生轉變。1552 年被莫斯科大公國（俄羅斯前身）併吞的喀山汗國，其繼承者即今日俄羅斯聯邦的加盟自治共和國——韃靼斯坦共和國。經過近 450 年的國內秩序，雖然作為穆斯林的喀山韃靼人依然保持著高度的自我身分，但在 19 世紀以來俄羅斯多次的劇變中，卻鮮少展現出脫俄獨立的意願（即使是蘇聯解體之際）。從 2014 年英國 BBC 記者在當地的訪問看來，喀山韃靼人滿足於當前的自治與經濟發展，甚至與斯拉夫人發展出相當程度的共享情感與價值，彼此沒有太多壓迫關係（BBC News, 2011），雙方關係接近於「主動遵守」的康德文化。

其次，複數國家合併與否、單一國家分裂與否，均與彼此所處的無政府文化與內化程度無必然關係，但其中確存一定規律，筆者於以下提出若干假定：

第一，不受權力逼迫而自願合併為單一國家的國際社會，必須先走入康德文化，才可能發生合併；但合併可能發生在任何一種內化程度中。這一點已經在前面的論述中說明過。

第二，在一套國內秩序當中，社會集體身分的發展程度越低，作為主權國家構成部分的行為者脫離國家獨立而出的動機就可能越強。這一點可以從前一點反證得知：特定國際社會關係必須進入到康德文化之中，才有可能自願共同進入國內秩序；換言之，已經走入國內秩序的兩個構成者，如果彼此關係未能達到康德文化的水準，處於較邊陲地位的一方自然不會甘願永遠受控於與此一關係之中。

倘若特定國內秩序底下潛伏的無政府文化屬於亦敵亦友的洛克文化，就表示處於邊陲地位的行為者不放棄以武力對付處在中心地位的行為者（即使其所運用的武力只有相對弱小的非正規武力），同時也意味著該行為者存在叛亂獨




立的可能。而處在霍布斯文化當中的邊陲行為者，更是隨時伺機叛亂，完全不將中心行為者視為可能的合作對象。

欲理解筆者上述觀點，同樣可透過加爾通的論述來理解。國內秩序底下的各構成部分，彼此關係大致可藉「中心—邊陲」觀念檢視：筆者以為，即使是以對等名義合併的兩國，合併後仍然會存在政治重心偏倚以及資源分配不均所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如：大不列顛的中心是倫敦而非愛丁堡、瑞典—挪威聯合的中心是斯德哥爾摩而非奧斯陸、奧匈帝國的中心是維也納而非布達佩斯、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心是布拉格而非布拉迪斯拉發）。如果中心和邊陲之間在國內秩序底下仍會存有類似於無政府文化的互為主體性社會關係，便能理解為何在特定情勢下可以把國內秩序當中結構相對獨立的邊陲部分——利益排序與行為產出均有別於中心者——暫時視為一具備國家特質之行為者來看待。

第三，社會集體身分的發展程度高，並不代表行為者就一定願意與他者共處同一套國內秩序當中，這是因為自願進入國內秩序所需要的共享知識與建構康德文化所需要的共享知識並不相同。

舉例來說，瑞士與列支敦斯登處於主動遵守式的康德文化，列支敦斯登基於對瑞士的感謝與友好，使其自願讓渡國防、外交等重要主權部分予瑞士，但瑞士並無謀求兩國合併之意願；可見即使彼此社會集體身分已臻康德文化的最高境界，但雙方均無「應當尋求合併」的共享知識，合併未必會發生。

反之，具備「應當尋求合併」此一共享知識，也不代表兩國就處在康德式的無政府文化底下。例如：大韓民國（南韓）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同時享有聯合國席次，且被許多國家承認各自擁有主權國家地位，而南、北韓政府也一致認為應該尋求兩韓統一，意即雙方在此問題上享有若干共享知識；但兩韓並未因此處於康德式的無政府文化，反而是處在霍布斯文化中最險



惡的被迫遵守層級。此種情形肇因於雙方在國家統一上所共享知識實際上非常薄弱：南韓與北韓所希望成立的統一國家，本質上完全不一樣，雙方想像中的統一國家或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版本。東德的政治菁英接受與西德民眾共享西德現有的國家體制，但北韓的政治菁英並不期盼委身於南韓體制之內。兩韓彼此間共享「兩國應該合併」此一邁向合併所必須共享知識，卻欠缺邁向康德文化所必須的關鍵知識，可見此二種知識的存在情形並非正相關。

以上三點是對於集體身分與國內秩序兩者臨界點與相關變化的假設。之所以需要掌握集體身分與國內秩序之間的轉換規律，首先是為進一步釐清由集體身分所構成的國家的本質為何、構成方式為何，並映證前述國家特性近於可組構與拆解「分子」而非「原子」之概念。倘若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國家本身是被建構出來的集體身分，而國家又可以建構出更大的集體身分，那就必須假設：國家底下的某些次級群、國家本身、複數國家形成的跨國集體身分，以身分為何新的觀點來看，三者在本質上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共通性，並且都可能基於實務分析需要而作為行為者看待之。

第三節、各類型無政府文化轉移的臨界點

表 2-3 溫特的三種無政府文化與不同內化等級

合法性 主動遵守	③	⑥	⑨
利益 因利遵守	②	⑤	⑧
強迫 被迫遵守	①	④	⑦
內化程度 無政府文化	霍布斯文化 不承認對方生存權	洛克文化 承認對方生存權 有可能合作	康德文化 朋友關係 放棄動武

資料來源：Wendt, Alexander E.,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4.

若將溫特的三種文化與三種內化程度相結合，可得出上圖的九種搭配模式。從溫特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得知從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三者之間存有一種集體身分層次高低上的區別；同樣地，三種內化程度也存有集體身分層次的遞增關係。然而，溫特並沒有明言：三種無政府文化彼此移轉的臨界點為何。

三種無政府文化，乍看之下並不帶有光譜的性質，因為每一種文化的達成條件都相對明確：對於彼此生存權的承認與否、合作的可能與否、動武的可能與否，三個判斷句均非黑即白，少有保持模稜兩可的空間。但國與國之間互為主體間認知與共享知識的改變，恐難如此斷然變更。

筆者在此做二假設，以便稍後對其進行推導與論證：

其一，霍布斯文化的內化程度上升到主動遵守的層級後，隨社會集體身分的持續強化，此無政府狀態之下一階段將會進入洛克文化的強迫遵守層級。



其二，洛克文化的內化程度上升到主動遵守的層級後，隨社會集體身分的持續強化，此無政府狀態之下一階段將會進入康德文化的強迫遵守層級。

欲驗證上二假設，則須從複數實例中去檢視。比較簡單的作法，是找出幾起處於強迫遵守層級的國際社會狀態實例，並回溯該社會在達到該層級以前是否處在前一文化的主動遵守層級。


壹、從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的臨界點

處在洛克文化強迫遵守層級，亦即兩國間基於社會結構所給予的壓力，不得不承認彼此生存權，因而獲得了雙方合作的可能性；但彼此仍不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符合上述條件的案例如：二戰結束後，面臨共產勢力威脅的日本與南韓、法國與西德；日俄戰爭結束後的日本與俄羅斯。

此類關係的特色，均是原先曾處於敵對甚至交戰狀態的雙方，因情勢改變而不得不暫時承認彼此生存權，尋求一定程度的合作以應對共同威脅。然而，無論日韓、德法、日俄，在進入洛克文化以前都處危及存亡的交惡狀態，內化程度較低的霍布斯狀態究竟是直接跳入洛克狀態，還是隨著內化程度的提升、最終進入內化程度較低的洛克狀態，是以下欲探究的重點。

一、日本與朝鮮半島國家

在二戰結束以前，南韓的前身朝鮮是被日本強迫併吞的主權國家（稍早為朝貢體系中受清國宰制較為嚴重的藩屬國），後更名為大韓帝國。在遭到日本併吞以前，日本用 15 年的時間將勢力逐步滲入大韓帝國的內政，操縱政局、解散軍隊，甚在 1905 年迫使大韓帝國成為日本保護國（Hadar, 1990），足見日本有意抹煞朝鮮有作為正常主權國家繼續存在的權利；意識到生存威脅的大韓帝國，也不可能將作為國家生存主要威脅的日本視為可合作對象，雙方社會關係自當



處於霍布斯狀態。對日本而言，併吞大韓帝國的意圖是基於國家利益考量，而非大韓帝國的存在威脅到日本生存，將貧弱的大韓帝國視為敵人也無法像「征韓論」方提出之時一樣足以激起國內同仇敵愾意識，故此種霍布斯文化的內化程度屬於因利遵守的層級。

二戰後，朝鮮半島方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對日本恨意興盛未艾。1948 年南北兩韓成立後，仇日情緒依然強烈，不可能存在與日本友好的意願；但此時日本已成為美軍占領地，兩韓對日本的敵視既無關乎存亡，亦無關乎利益，「抗日」對於兩韓而言都是用來強調政權合法性的手段，因此屬於主動遵守層級的霍布斯文化。韓戰爆發以後，日本對南韓政府而言從仇敵搖身變為同在聯合國大旗下協助南韓對抗北方共產勢力南下的盟友，可見日、韓關係確實是從內化程度最深的霍布斯文化邁入內化程度最淺的洛克文化。

二、法國與德意志政權

德國於二戰時期嚴重壓迫乃至於可能抹煞法國的生存。二戰初期，德國為國家生存考量，必須攻占對其宣戰的強大法國；相同地，法國生存也受到德國威脅，可見彼此關係處於被迫遵守的霍布斯文化。作為傀儡的維希法國政權建立後，又在北非戰事爆發時遭剝奪統治權，此時法國早已無力威脅德國生存，德國是以軍事利益考量而占領維希法國國土（Schreiber & Stegemann & Vogel, 1990:78），是故雙方處於因利遵守的霍布斯文化。二戰結束後，戴高樂的自由法國政權主掌法國政局，遭多國軍事占領的德國作為荷、法等國的報復對象，既不可能存在合作空間，又沒有與之衝突的實質意義，因此對德敵意只是鞏固自由法國政權正當性的一種號召，此點與南韓相同，均與對方處於主動遵守的霍布斯狀態。然而，隨冷戰迅速降臨，法國與西德必須同於美國領導下抵禦歐洲赤化浪潮，是故雙方關係提升到被迫遵守的洛克文化。



一、日本與俄羅斯

日俄戰爭雖然是由日方率先挑起，但日本實際上是基於對西伯利亞大鐵路開通後俄羅斯遠東國力上升的預期，而決定執行發制戰；倘若日軍海、陸戰事均敗，日本本土便有可能遭受俄軍登陸侵略，因此日俄戰爭時期的兩國關係處於被迫遵守的霍布斯狀態。戰事晚期，日本在旅順戰役、奉天會戰與日本海海戰紛紛取勝，俄國對日本而言已暫時不具生存威脅，因此雙方關係上升為因利遵守的霍布斯文化。日本戰勝後，並未於《樸茨茅斯條約》取得與戰果相稱的利益，但已暫不可能從俄國手中取得更多利益，此時又未與俄國發展出合作關係，故於此段短暫時間內，日本仍保持著敵俄的慣性（與日本同樣無力再戰的俄國亦如此），彼此暫處於主動遵守層級的霍布斯文化。在意識到衝突關係確定暫停後，尚未謀求關係正常化的雙方，自然須被迫邁入承認彼此權利與生存的低內化程度洛克文化。最終，日、俄態度均接受並滿足於當前各自保有的勢力範圍與利益，並認知到合作有助於維護雙方記得利益，催生 1907 至 1916 年間的四次日俄密約 (Elleman, 1999)，快速邁入為期較長的因利遵守層級洛克文化。

從霍布斯文化轉入洛克文化的關鍵，往往是雙方於經歷嚴重衝突後（低內化程度霍布斯文化），首先發現繼續衝突的非必要與不划算，但基於國內仇恨，必須維持敵對慣性（主動遵守層級霍布斯文化），最終彼此仇恨因時間推進或新興敵國等因素而被沖淡，因此被迫承認彼此的生存，合作的可能進而萌生（被迫遵守層級洛克文化）。此過程亦為可逆。

由此可見，霍布斯文化的內化程度發展至最深，確實會銜接到內化程度最淺的洛克文化。



表 2-4 從霍布斯文化進入洛克文化的內化程度演進時間表

(以日韓、法德、日俄為例)

	日本與 朝鮮半島國家	法國與 德意志政權	日本與俄羅斯
被迫遵守層級 霍布斯文化	無	1940 年 法國戰役爆發	1904 年 日俄戰爭爆發
因利遵守層級 霍布斯文化	1910 年 日韓合併以前	1942 年 德軍接管法國南部	1905 年 對馬海峽海戰後
主動遵守層級 霍布斯文化	1948 年 大韓民國建國	1945 年 盟軍軍事占領德國	1905 年 樸茨茅斯條約
被迫遵守層級 洛克文化	1950 年 韓戰爆發	1945 年以後 遵照波茨坦宣言承 諾不瓜分德國	1907 至 1916 年 4 次日俄密約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貳、從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臨界點

處在康德文化強迫遵守層級，亦即兩國間基於社會結構所給予的壓力，不得不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符合上述條件的案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後的法國與西德、二戰期間的美國與加拿大、義大利統一戰爭後的義大利與聖馬利諾。

一、法國與聯邦德國

首先釐清德、法之間放棄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時間點。承前所述，在二戰甫結束之際，德、法關係才剛進入勉強承認彼此生存的被動遵守層級洛克文化。二戰結束前夕，聯合國憲章雖然重申盟國應放棄以武力解決爭端，但從實踐上來看，法國遲至 1956 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仍與英國與以色列聯手入侵作為非北約國家但屬聯合國成員的埃及，可見真正使德、法放棄對彼此動武的未必是聯合國此一框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於 1949 年，與要求國際社會全面放棄戰



爭的聯合國章程相比，北約國家內部的和平對當時防堵歐洲赤化的情勢更為重要。殆至 1955 年西德加入北約以後，法國才終於失去以武力手段對付西德的一切可能。

一個具體的事證是薩爾保護領的成立。薩爾位於德、法、盧三國邊境，由於法國不承認該地為德國領土，所以於 1947 年從盟軍在德國的軍事占領區當中獨立出來，成為法國託管地 (Long, 2015:44-47)；法國過去已曾在一戰結束後對薩爾以國聯名義實施管轄，但薩爾居民在 1935 年仍透過公投選擇回歸威瑪德國。該事證可證明兩件事：其一，在美國指導的戰後西歐秩序下，法國無法直接從戰敗的德國手中剝奪已於 1935 年自國聯手中公投回歸德國的薩爾；其二，法國確實有意剝奪德國領土（即使法國之後致力的方向是鼓動薩爾獨立，而非加入法國）。由此可見，此時法國是在國家安全已然無虞並且必須承認德國生存權與戰前主權領土的情形下，進一步採取追求本國利益（或可稱對德相對利益）的行為。

實際上，在 1945 年至 1949 年期間，德國一無政府、二無軍隊，整個國家被割裂為美、蘇、英、法四國占領區，所謂德國的權利只存在於法理上。因此，法國與德國短短 4 年間的雙邊社會集體身分演變，只存在於法國單方面的心理變遷中。在此階段而言，礙於德國法理上與道德上所享有的國家權利（不能被瓜分或併吞的生存權），法國無法不顧原德國對薩爾享有的權利而採取行動，以至於無法直接併吞薩爾。但法國在承認德國權利的同時，卻也被盟國默許獲得了對薩爾礦產的使用權。或可說，截至 1947 年，德、法關係已進入因利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

筆者認為，北約的成立意味著西方盟國對冷戰存在的認知徹底奠定。西方盟國對冷戰認知的具體化，或可視為 1946 年 3 月 5 日邱吉爾於演說中提出「鐵幕」一詞為象徵性的濫觴。由此可推論，從 1946 年的鐵幕演說至 1949 年北約



成立，是西歐內部社會集體身分強化的一個過程。在敵友判別的過程中，德國對法國而言愈來愈不像是主要敵人。

1949年5月23日，北約成立後不久，美、英、法在德占領區合併為西德，可推論法國此時已同意德國的身分對當前法國而言已非敵人，而是可以運用的盟友。由此可見，法國是基於德、法互利以外的考量，以具體作為承認並恢復了德國的生存，而此種作為未必屬於必須：時間點上，西德成立早於東德，因此西方盟國在德占領區的合併並非被動於蘇聯，而是基於法理性而主動為之。是以致遲於1949年5月23日，德、法關係已進入主動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

然而，法國對於德國的防範心理依然存在，以致即使在英、美壓力下，仍遲遲不肯重新武裝西德，1954年拒絕簽署《歐洲防務集團條約》即為事證(Kanter, 1970)，可見法國仍然相信德國可能成為日後法國的敵人，雙方關係尚未上升至康德文化。遲至西德於1955年加入北約，法國才被迫進入與西德共享的被迫遵守層級康德文化。

二、美國與英屬加拿大殖民地

早在美國於1776年正式宣佈建國以前，北美十三州便於1774年北犯英屬魁北克殖民地，未能得手。1813年，美國於英美戰爭期間再次進犯加拿大，卻遭遇慘敗，白宮甚至遭到向南反攻的英軍占領焚燒。1814年聖誕節，英、美簽署和平協議，美國從此被迫承認加拿大殖民地的生存權(Zuehlke, 2007)，雙方進入被迫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

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北軍挾著統一國家的得意、手中持有的大量新型武器與對英國援助南軍的怨懟，加上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期望藉由攻占加拿大作為籌碼換取愛爾蘭獨立，內部再次興起「昭昭天命」的論調，鼓吹攻擊北方加拿大地區的英屬殖民地(Sexton, 2005:206)。此時，美、加間的社會集體



身分非但並未深化，反而因為美國內部考慮否認加拿大生存權利，雙方關係頗有跌回霍布斯文化的可能。1867 年，美、加之間發生奧勒岡邊境爭端（美方稱為北緯 54 度邊境爭端），雙方瀕近戰爭邊緣（Mackie, 1997）。

1867 年，已經具有聯合政府的英屬加拿大殖民地成立加拿大自治領，使美國入侵加拿大變得困難。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基於經濟利益，不斷有美國人民自願移居到拿大境內（Bukowczyk, 2005），可見和平能為雙邊帶來共同利益，雙方已邁入因利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1927 年，美方主動承認加拿大作為獨立國家存在（Bell, 1997:789–808），更顯示雙方邁入主動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但美、加在 1903 年一度發生阿拉斯加邊境爭端（Tucker, 2010），兩國更是遲至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仍在擬定軍事攻擊對方的計畫（The Washington Post, 2005），可見雙方仍未全然放棄動武可能，故尚未進入康德文化階段。

1940 年，基於加、美先後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不再置身歐洲戰事之外，而是與加拿大與英國本土共同面對德國威脅，美、加關係開始緊密（Perras, 1998）。1940 年 8 月，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紐約奧格登斯堡共同發表宣言，呼籲雙方緊密合作（Jensen, 2004: 6–10）。隨後，加拿大被允許加入阿拉斯加鐵路與原子彈的建設，1940 年至 1942 年，羅斯福更批准共計 4 萬 9 千名美國公民加入英國與加國空軍（Heide, 2004: 07–230）；在此同時，英屬紐芬蘭也提供美國建設大型軍事基地（McNeil Earle, 1998: 387–411）。至此可見，在外力共同威脅下，美、加已徹底喪失對彼此動武的需要性，進而邁入被迫遵守層級的康德文化。戰後，外力威脅消失，此種康德文化又獲得進一步深化。

值得注意的事，在 1982 年以前，加拿大都不是現代意義上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但不是主權獨立國家這一點，絲毫無礙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發展出頗具歷史淵源的無政府文化。



三、義大利半島政權與聖馬力諾

聖馬力諾在義大利統一後，得以始終獨立於義大利之外、自成國中之國，則是一個比較浪漫的案例。基於聖馬力諾脫身自聖徒所建修道院的神聖性，憑藉著羅馬帝國時期的契約，天主教廷與所有天主教國家即使有意併吞聖馬力諾，均因宗教法理上的欠缺而放棄（Duursma, 1996:211）。是以聖馬力諾與教宗國處於因合法性而主動遵守的洛克文化，而有意併吞聖馬力諾的周遭勢力與其處於被迫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聖馬力諾曾經效忠的烏爾比諾則與其處於因利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

拿破崙戰爭時期，由於聖馬力諾對法國代表的歡迎態度以及聖馬力諾的神聖性，法國亦明確承認了聖馬力諾的獨立（Queruel, 2012）。作為北義大利與日後全義大利的統治者，無懼忤逆天主教會權威的拿破崙也承認聖馬力諾的主權，可見聖馬力諾與周遭政權的關係已步入因利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

拿破崙戰敗後，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再度肯認了聖馬力諾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意即重新成為北義大利實質主宰者的奧地利主動同意透過條約確認聖馬力諾主權的不可侵犯。然而，遲至 19 世紀中葉，由於聖馬力諾對義大利民族主義者的庇護與資助，教宗國與奧地利仍頻頻以軍事威脅聖馬力諾，惟不敢實際抹煞其生存，可見其與各方仍處於主動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未步入康德文化（Grigory, 1991）。

由於聖馬力諾曾提供義大利統一領袖加里波第大力資助與庇護，因此加里波第許諾在義大利統一後永久保證聖馬力諾的主權獨立（Daily Herald, 1914）。義大利王國建立後，雙方於 1862 年建立友邦關係，1872 年成為義大利保護國。義大利往後的歷任統治者亦均無意願併吞聖馬力諾。在放棄動武的前提下，雙方首先邁入了被迫遵守層級的康德文化；隨後發展經濟上的共同利益，快速步

人因利遵守層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聖馬力諾雖然保持中立，但卻鼓勵公民自願參加協約國軍隊，以展現對義大利的熱愛（Grigory, 1991）；此種無利於自身的舉動已經展現出康德文化的主動遵守層級面貌。



最終，即使是高舉國族主義的法西斯執政時期，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也高度尊重聖馬力諾，甚至大力資助其內部建設（Grigory, 1991），雙方處於康德文化的最高階段，已殆無疑義。在此可映證前節所言，即使兩國發展到康德文化的最終階段，雙方公民、經貿、外交與情感均高度融為一體，但只要雙方共享知識當中不存在「雙方應當步入國內秩序」此一知識，就不會發生兩國合併。

表 2-5 從洛克文化進入康德文化的內化程度演進時間表

(以法德、美加、義大利與聖馬力諾為例)

	法國與 聯邦德國	美國與 英屬加拿大殖民地	義大利半島政權 與聖馬力諾
被迫遵守層級 洛克文化	1945 年 遵照波茨坦宣 言承諾，盟國 不瓜分德國	1814 年 英美戰爭結束，美 國進軍加拿大徹底 敗北	1862 年以前 多數周遭政權礙 於聖馬利諾宗教 意義而不敢侵犯
因利遵守層級 洛克文化	1947 年 法國實質控制 薩爾自治領	19 至 20 世紀 雙邊普遍跨界移民	1797 年 拿破崙進占北義 大利，基於聖馬 利諾歡迎態度而 承認其主權
主動遵守層級 洛克文化	1949 年 法國偕同美、 英將占領區合 併為聯邦德國	1927 年 美國承認加拿大為 獨立國家	1815 年 奧地利在維也納 會議中同意肯認 聖馬力諾神聖不 可侵犯性
被迫遵守層級 康德文化	1955 年 法國同意聯邦 德國加入北約	1940 年以後 美、加因二戰緊密 合作	1862 年 在加里波第對其 永久獨立的保證 之下，義大利王 國與其締結友邦 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根據以上三項歷史事例，可證洛克文化推展至內化程度最深的階段時，確實會銜接到康德文化的早期階段。兩國因利而保持合作關係，最終使友好因習尚而規範化（主動遵守層級洛克文化）。當友好規範化以後，只要雙方意識到保持動武權力的無意義與動武的不可能，雙方就會被迫接受放棄動武意念（被迫遵守層級康德文化），進而在此種穩固的關係下發展出更緊密的合作與身分。



參、緊密與破碎間的結構演變過程

經過以上歷史案例檢驗與辯證，本節最初筆者所做的兩項假設已可獲得證明。從內化程度最低的霍布斯文化發展到內化程度最高的康德文化，期間的九個層級時為彼此相連且具備層次與因果關係的一道光譜式量尺。一組國際社會關係在發展過程中，於各階段停留的時間未必一致，有時相當短暫、有時不甚明顯，但大抵上需要依此過程發展，難以跳躍毗鄰階段而直接跨入未相鄰階段。

檢視上述多項案例的發展過程，再搭配上第一節所言身分影響行為者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的特性，可證得社會集體身分發展的層級愈高，作為社會整體的複數行為者彼此之間凝聚力就愈高。

表 2-6 三種無政府文化轉換與內化程度演進彼此關係

社會集體身分建構階段		漸次發展情況
無政府文化類型	內化程度	
霍布斯文化	被迫遵守層級	彼此存在均對彼此生存構成威脅，被迫必須謀求消滅對方
	因利遵守層級	其中一方實力較強，對方存在不再構成威脅，只基於利益而持續衝突
	主動遵守層級	發現進行衝突已無利可圖，但基於國內仇恨，必須維持敵對慣性
洛克文化	被迫遵守層級	仇恨因時間推進或新興敵國等因素沖淡，被迫承認彼此生存，合作進而可能
	因利遵守層級	在允許彼此生存的前提下，發現合作可帶來彼此利益，進而展開合作
	主動遵守層級	合作關係下的友好，因習尚而規範化
康德文化	被迫遵守層級	友好規範化以後，雙方意識到動武已然失去意義與可行性，被迫接受放棄動武
	因利遵守層級	在對彼此完全不構成威脅的穩固關係中，發展出更為緊密且大膽互信的合作
	主動遵守層級	因為合作的全面化，使雙方深信彼此友好關係本身具有意義，乃至神聖性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綜上所得，可知社會集體身分及與其相對應的無政府文化，可依集體身分建構程度發展階段排序成一道量尺；同時，亦得知無政府狀態下國際社會可能轉入國內秩序的集體身分階段所在，瞭解社會集體身分建構與國內秩序產生二者關聯性。整理以上成果並兼納筆者所假定的「潛伏無政府狀態」概念，可得出表 2-7。

表 2-7 各善意等級與其內涵示意

無政府文化	內化程度	建構程度	社會凝聚力	進入國內秩序	脫離國內秩序	社會集體身分				
康德文化	主動遵守	9	↑ 最高	自願發生 可能	意願有限	↑ 緊密				
	因利遵守	8								
	被迫遵守	7								
洛克文化	主動遵守	6		↓ 最低	不會發生		↓	↓ 破碎		
	因利遵守	5								
	被迫遵守	4								
霍布斯文化	主動遵守	3			↓		被迫發生 可能		意願最高	↓
	因利遵守	2								
	被迫遵守	1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循此理解，無論主權國家之間、主權國家與次國家行為者之間（如美國與英屬加拿大）或次國家行為者彼此之間（如北美十三州與英國本土），行為者間的集體身分建構程度是可以藉由滿足特定條件的方式予以調節的。

本章主軸為探討集體身分的擴張與裂解，在表 2-7 提供的框架下，此種擴張與裂解便相對易於理解。承前所述，身分本身會影響行為者的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因此當複數行為者所共享的社會集體身分程度降低時，就意味彼此之間



利益排序與採取行為分歧愈大，原先所涵蓋人民、土地、治理團體（政府）、法理權利（主權）較廣的大型社會集體身分於是發生不同程度的裂解。反之，則社會集體身分也可能發生與凝聚與擴充。

此處就語意上，凝聚與擴充實相伴而生。筆者採用「擴充」一詞時，指涉到的是一個較具主觀性的概念，意指原先與本行為者不具較緊密社會集體身分的他者，逐漸享有了與本國一致的身分，進而使本國所服膺的社會集體身分擴及至更為廣泛的範疇。一個可以簡單理解的社會集體身分擴充實例，即歐盟與北約的東擴。在此非指歐盟與北約的東擴本身即為社會集體身分的擴充，筆者認為身分的擴充早在此前實已發生於東歐國家身上，而東歐選擇加入北約與歐盟，是基於其身分與西歐國家趨向一致、利益設定（以蘇聯／俄羅斯為假想敵；以市場經濟與民主價值為利益目標）近似的情況下，故而採取與西歐國家一致的行為（加入北約與歐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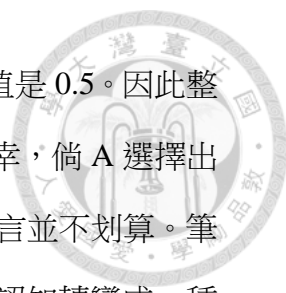
第四節、將外因機制納入考量的不對稱賽局模型

表 2-8 囚徒賽局示意

B \ A	A	合作	出賣
合作		(A:2, B:2)	(A:0, B:3)
出賣		(A:3, B:0)	(A:1, B:1)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此處所言的對稱賽局，意旨假定賽局兩造所持權力、地位、處境大致相仿，任一方的出賣行為可帶給彼方的相對損失大略相等。筆者將依據表 2-8 將典型的合作賽局表現描述如下：倘若四種情形發生機率相等，B 選擇合作的話，A 做任



一選擇的期望值是 2.5；B 選擇出賣的話，A 做任一選擇的期望值是 0.5。因此整體而言，促使 B 選擇合作對 A 較為有利。若考慮到賽局的重複幸，倘 A 選擇出賣 B，將導致 B 在下一輪賽局中選擇出賣 A 作為報復，對 A 而言並不划算。筆者假定 A 可藉反覆賽局驗證得知合作較出賣有利，進而將此種認知轉變成一種 A、B 共享的社會知識，不再考慮其它可能性，並形成出 A、B 間的集體身分。

在中心層級與邊陲層級之間，由於權力上的絕對差距，構成的是對邊陲層級極端不利的賽局模式，筆者以上述賽局將作為中心層級的一方利益均加 1，得出表 2-9。

表 2-9 實力不對等下的囚徒賽局

B 中心層級 A 邊陲層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 B:1)	(A:1,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筆者依據現實情形，預設此套賽局固定是由 A 先採取行動。整體而言，A 選擇隱忍對 B 比較有利。所以當 A 選擇隱忍時，為防止 A 於下一輪賽局選擇反抗，B 理應傾向選擇採取平和態度，以教導 A 保持隱忍。而當 A 選擇反抗時，無論 B 基於相對利得或絕對利得考量，亦或為嚇阻 A 再次反抗，B 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勢將選擇壓迫。預期到 B 的反應，A 隱忍的利得是 2，反抗的利得是 1，故 A 沒有選擇反抗的理由。

然而，當同一秩序底下的另一邊陲層級行為者 C 率先發起反抗，為合理解釋 C 的行為，A 會對 B 的能力重新衡量：

表 2-10 其它邊陲層級率先反抗後的囚徒賽局

A 或 C	B 中心層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x, B:1)	(A:1+x,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x 為 B 因權力下降而導致 A 從事反抗時的損失減少。只要 A 認為 x 在 1 之上，無論基於相對利得或絕對利得，A 進而判定 C 的行為合乎理性，並向 C 學習。但 A 很有可能對 x 產生誤判。當 x 等於 1 時，C 並沒有因為反抗行為獲得比隱忍更多的利得，但已足以向其它邊陲行為者昭示反抗的可行性。如果 C 有與外國 D 達成合作，A 也可能會學習 C 在與 D 之間的賽局中的抉擇。筆者認為，身之所以可以在賽局中產生意義，便是基於觀念因素影響了行為者對未知數 x 的估量。

筆者此種賽局構想，主要啟發自溫特所提出的策略實務機制。但類似的賽局運用以及假定賽局中存在未知數的概念，亦可兼用於系統過程機制，以解釋邊陲層級與它國的合作；抑或是解釋集體身分程度轉換時的行為者決策背景。

第三章、三種外因機制與 20 世紀初沙俄 所處戰略賽局



本章欲以溫特於〈集體身分形塑〉一文中提及的三種外因機制為框架，探討此三種機制如何引起集體身分的內化，而此種內化過程何以能夠進一步改變本研究所欲討論的核心：行為者的戰略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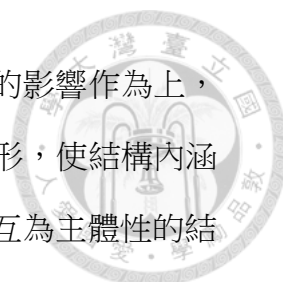
筆者將於此基礎上，對本研究所欲檢視案例：1904 至 1918 年間沙俄政權與其它行為者（包含國外的主要對手與國內的次要對手）共享的集體身分以及共處的戰略賽局。筆者將先於本章最末說明該時空範疇之所以獲選為受檢視案例的重要性所在，證明本研究所欲描繪「以三種外因機制影響賽局內行為者戰略能力分配」之框架於該時空限界內確存適用性與討論價值。

第一節、結構系絡機制

溫特所謂結構系絡機制，意即令嵌有共享認知、期望與社會知識的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與威脅複合體（threat complexes）組成互為主體性之系統性結構。互為主體性的結構有助於幫助我們瞭解特定動態系統中所存在的結構鬆弛至何種程度，並反映出集體身分的成形階段與形成難度（Wendt, 1994:388-391）。

其中，溫特認為「衝突（conflicts）」也可被視為一種互為主體性的現象。系統中的衝突狀況愈嚴重，國家就愈傾向維持較具自我主義（egoism）傾向之身分，並且偏好抱持著重相對利得的社會知識。反之，衝突狀況的減少則可能促使國家走向利他主義（altruism），並更加看重絕對利得（Wendt, 1994:388-391）。互為主體性的結構系絡，其具體呈方式現即溫特所提出的三種無政府文化。

在此機制中，第一變項為共享知識。在戰略賽局上的運用，行為者必須從



國際機制中改變嵌入其中的共享知識。在以拉攏、結盟為目的的影響作為上，行為者必須透過共享之事的改變，降低機構內部整體的衝突情形，使結構內涵出現調整，進而改變結構內其它行為者的身分認知。簡言之，互為主體性的結構系絡可以為國際政治中所存在的物質賦予意義；若缺少此種結構，則物質亦無意義。

引用溫特所舉的例子，冷戰時期，蘇聯與英國均擁有大量核武，但美國而言，蘇聯所擁有的核武與英國所擁有的核武義，所代表的意顯然不同（1994: 388-391）。由此可見，導致此種結構性差異產生的第一變項，並非核武本身的存在，亦非核武增加的行為，因為後二者同時在美、蘇與美、英的結構中存在，僅只是威脅複合體的構成部分。真正使此二威脅複合體在意義上發生變化的，實際上是共享知識的不同。

美、英先天意識形態的相近，以及自一戰、二戰延續至冷戰期間的互動實踐，使彼此共享了「友好」的社會知識；美、蘇間則不然，彼此意識型太差距過大，且在戰後的互動實踐中從合作轉為猜忌與對立，因此彼此共享的是「敵意」的社會知識。這種共享知識的不同，導致此二結構在類似的實力對比下，並未導引出大相逕庭的集體身分——亦即所為無政府文化。

戰略賽局的存在，意即我方與敵方已然處於霍布斯文化或洛克文化之中，因為在此二類文化底下，彼我行為者互為主體性的對立關係才有可能存在。此結構中可能存在四類典型的行為者：我方、敵方、我方潛在盟友、敵方潛在盟友。藉由結構系絡來改變戰略賽局底下的力量對比，其須將共享知識嵌入的結構有三種：

其一，為我方與敵方所共組的結構；

其二，為我方與次要敵人／潛在盟友所共組的結構；



其三，為敵方與敵方盟友所共組的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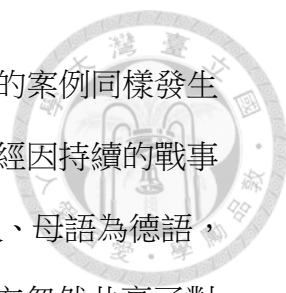
在此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協約國（Allied Powers）、同盟國（Central Powers）、羅馬尼亞、義大利等四方為講述範例。

假定我方為協約國，敵方為同盟國，我方潛在盟友為羅馬尼亞，敵方潛在盟友為義大利，則法國須試圖影響的結構假定有三，列舉如下各節。

壹、第一種賽局：我方與敵方

第一種，是由協約國與同盟國所共組的結構，在此以俄國與德國為例。在此結構中，俄國可能為優勢的一方，也可能為劣勢的一方。史實中，俄國自 1915 年以後始終處於劣勢，國內對戰爭的忍耐瀕近極限（Fitzpatrick, 2008），戰爭的推展不利於俄國維護自身既得利益，需要緩解結構中的衝突程度以維護既得利益，則俄國必須創造出「俄國與德國得以和睦共存、承認彼此生存權利的共享知識」，進而使雙方不再將結構內的各項要素視為隊彼此的威脅，以利塑造行為者出非敵對性的集體身分，使雙方著眼於絕對利益，而非相對利益。為倘若俄國已然是具備優勢的一方，便毋須試圖改變此種衝突結構，因為衝突的持續能為法國帶來利益。

由上可解釋俄國在戰爭後期與德國達成停戰的心理因素：俄國於無力再戰的情況下，改變了德、俄間的共享知識。筆者認為，俄國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對同盟國的巨幅讓步，足以顯示俄國在退出戰爭之際業已無力堅守泛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身分所指涉的理想，於是 1914 年的塞爾維亞問題遠不復為雙方利益矛盾所在，遭占領的西部領土（如已經成立傀儡政府的白俄羅斯與西烏克蘭）也成為俄國可以暫時放棄的利益——遑論南斯拉夫民族，連東斯拉夫民族居住區域亦已無力保全。雙方暫時不再互視為嚴重威脅，由是得以達成停戰，俄國進而停止了自身利益的持續喪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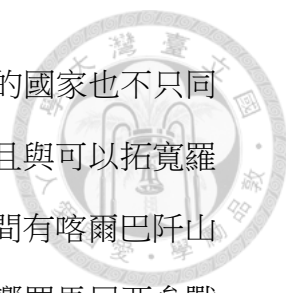


早在一戰發生以前逾 150 年，另一更彰顯身分問題重要性的案例同樣發生於德、俄之間。當七年戰爭進行到 1763 年時，普魯士的國力已經因持續的戰事而逼進耗竭；然此時繼位的俄國沙皇彼得三世，其身為德意志人、母語為德語，且極度崇尚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的軍事成就。由於德、俄雙方忽然共享了對德意志文化與英雄主義的知識，俄國竟在已然取得對普軍事優勢的情形下與普魯士停戰，甚至與普魯士結成軍事同盟，將已經攻占普魯士首都柏林的軍隊投入對昔日盟友奧地利的作戰，令普魯士起死回生，史稱「第二次勃蘭登堡王室的奇蹟 (Second Miracle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Fitzpatrick, 2000:38)。此種違反理性決策邏輯的行為，卻可能從結構系絡的角度來理解。

貳、第二種賽局：我方與我方潛在盟友

第二種，是由我方陣營協約國與協約國潛在盟友羅馬尼亞所組成的結構，在此以法國作為協約國代表。羅馬尼亞早在 1883 年就與德、奧簽署祕密同盟協定，但大戰爆發卻未加入同盟國一方，而是採取觀望政策，因而成為俄、法可能結盟的對象 (Hentea, 2007:102)。當時，未納入羅馬尼亞國土的羅馬尼亞人居住地，包含奧匈帝國的外西凡尼亞 (Transylvania) 與沙俄占有的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但這層因素卻沒有阻礙羅馬尼亞與三國同盟簽訂密約。

法國為塑造與羅馬尼亞之間的共享知識，合理的努力方向是促使彼此共享「同盟國是為彼此共同威脅」的知識，強化法國與羅馬尼亞互為朋友的身分，使羅馬尼亞發現到德國陣營所占領土屬於羅馬尼亞利益所在，進而使雙方的自利主義彼此聯結，產生共同參戰的集體行為。1916 年 8 月 17 日，羅馬尼亞與英、法簽訂祕密協定，協約國承諾給予大量資源挹注 (事後證明為空頭支票)，並同意戰爭結束後將外西凡尼亞等地區劃歸羅馬尼亞 (Keegan, 1998:306)，成功拉攏羅馬尼亞稍後對德、奧宣戰。實際上，比起國土未接壤的英、法，德、奧陣營




更可能提供羅馬尼亞更多資源；而領有羅馬尼亞民族居住地區的國家也不只同盟國方的奧地利，協約國方的沙俄占有的比薩拉比亞亦屬之，且與可以拓寬羅馬尼亞海岸線的比薩拉比亞相較，外西凡尼亞與羅馬尼亞王國間有喀爾巴阡山阻隔，外西凡尼亞未必較比薩拉比亞更有價值。由此可見，影響羅馬尼亞參戰的因素中，資源挹注與領土利益等物質誘因均非顯著關鍵。1883年與1916年羅馬尼亞外交政策的扭轉，足見觀念因素為羅馬尼亞的利益排序帶來的影響。

參、第三種賽局：敵方與敵方潛在盟友

其三，是由敵方陣營同盟國與同盟國潛在盟友義大利所組成的結構，在此以奧匈帝國作為同盟國代表。一戰初期，義大利與奧匈帝國結盟，站在協約國的立場，必須鬆動義大利與奧匈帝國所共組的互為主體性結構，因此需運用義大利與奧匈帝國間的歷史嫌隙與領土糾紛，令義、奧雙方產生不利於合作的共享知識，進而破壞雙方集體身分。在戰爭後期，同樣處於不利處境的義大利與德國二者，義大利選擇背棄奧匈帝國，但德國卻並未如此。義、奧間的歷史仇恨構築了新的共享知識，德、奧間卻仍維持牢固的共享知識：泛日耳曼主義（Pan-Germanism）。

對此三種結構，或可用斯德哥爾摩學派的安全化理論來輔以詮釋。簡單來說，一與二在手段尚表現出了去安全化的特性，使彼我之間不再將結構內的系絡視為關乎安全的問題；三則是反其道而為，使結構內的問題朝著攸關安全的方向去解釋，並使結構內行為者深化對此種安全問題的堅信。

上述二、三的情形，同樣也頻繁地發生在非國家行為者身上。遭俄國統治的波蘭在被同盟國占領後，建立起了與德國的合作關係，甚至投身同盟國軍隊（Lukowski & Zawadzki, 2001:218）；遭奧匈帝國統治的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則選擇為協約國作戰，並基於斯拉夫人身分投身俄國軍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軍



團 (Czechoslovak Legion)，由捷克人所組成的部隊甚至在俄國紅白內戰期間仍繼續然為白軍效命，最終於西伯利亞覆滅 (Bradley, 1990:14-16)。以互為主體性結構與共享知識作為觀察視角，有助於解釋此類現象，甚至說明行為者超出自利範疇的行為。

進入晚近，行為者為拉攏潛在盟友，提供了更多不同於民族主義的共享知識，以使自身戰略能力的獲取來源跨越疆域以外。西班牙內戰時期，左翼的西班牙共和軍 (Republican faction) 基於社會主義的共享知識，獲得了來自蘇聯組織的志願軍「國際縱隊 (International Brigades)」以及龐大物資支持，包含 806 架飛機、362 輛戰車和 1555 門大砲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1974:329-330)。越戰中的北越以反帝國主義為號召，獲取語言、風俗實際上略有別於北越的南越民眾對北越產生集體身分意識 (許如亨, 1999:325)。遭受蘇聯侵略的阿富汗，以對抗蘇聯無神論者的宗教聖戰為號召，使得外國穆斯林產生了與阿富汗人基於伊斯蘭信仰的集體身分，讓不直接受到代理戰爭支持的阿富汗游擊隊在獨立作戰的情形下，出現多國自願者所形成的阿富汗聖戰者伊斯蘭聯盟 (Islamic Unity of Afghanistan Mujahideen)，阿富汗並以此為平臺獲取遠多於國內資源的可運用權力；雖然阿富汗聖戰者接受美國、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與中國大陸的資金與人員訓練，但人員組成仍是以自發參與的各國穆斯林 (尤其與當地人民族、血緣相異的阿拉伯人，被統稱為 Afghan Arabs) 為主體 (Lumpkin, 2016)。這些現象都可以用共享知識對結構系絡的影響去解釋。

第二節、系統過程機制

溫特所謂的系統過程，亦即系統中的行為者藉由一系列的實踐來重造 (reproduce) 或重塑 (transform) 系統，進而產生出集體身分。

此種過程包含兩階段：首先，行為者須先提高彼此互賴 (interdependence)



程度。可能促使其發生的因素，譬如「共同他者（common other）」的出現，使系統內行為者感受到共同威脅，進而提高互賴的程度，並提升系統內部結構的緊密程度。透過互賴所產生的合作，不只是如現實主義者所言僅因對行為代價的計算而產生，更會帶來身分與利益上的變化。

第二階段則是使存在各國國內的價值發生跨國性的合流（transnational convergence），譬如：民主制度、福利國家、人權等。系統內的行為者將產生出此類價值「優於」其它價值的認知，進而學習與仿效，進一步凝聚出集體身分。然溫特指出，這種跨國性的價值也可能使個別行為者產生自主性遭剝奪的顧慮，進而出現抗拒（Wendt, 1994:388-391）。

簡言之，系統過程在戰略賽局當中的運用，就是透過互賴來產生合作，並藉由長時間的合作實踐，產生另存在於代價算計以外的集體身分、集體利益，乃至於共同價值的合流。

在此以薩丁尼亞王國參與克里米亞戰爭的算計為例。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是發生在沙俄與土、英、法之間的大規模戰事，土國基於領土考量、英國基於海權考量、法國基於宗教權利考量，三方均決定與俄國發生衝突。俄國與薩丁尼亞王國並無利害關係，但薩丁尼亞策略性地派兵協助法國對俄作戰，營造了法國與薩丁尼亞間的互賴與合作關係。薩丁尼亞於戰爭期間所派遣的兵力約 1 萬 8 千人（Società dei reduci della Crimea, 1884:39），與參戰法軍相比僅為後者總數之 6%，更僅占盟軍總兵力的 1.8%，對戰局影響相當有限，但卻是薩丁尼亞宰相加富爾（Camillo di Cavour）為拉近法國與薩丁尼亞彼此身分與利益之舉（Arnold, 2002:111-112）。薩丁尼亞的參戰與法國對義大利統一的默許具何種程度的關聯性，實難商榷，但加富爾的算計確實合乎系統過程機制，而法皇拿破崙三世戰後不久，亦確實支持了就權力分布與緩衝區考量而言不利於法國自身國家安全的援薩抗奧以及義大利統一。

第三節、策略實務機制



在實務策略的分析框架中，行為者的作為會創造或重塑結構以及結構中的中介成分，產生近似於賽局的算計變化。惟此處將身分與利益等因素放入策略進行的過程中。重複進行合作的行為，將為行為者的身分與利益帶來兩種影響：

其一，是行為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基於對互動過程所進行的學習，導致新身分的產生。

其二，在互動的過程中，行為者也將維持並投射其自我身分的「圖像」，教導其他行為者進行類似的互動，並且使其彼此間共享一種「我群(we)」的想像，使彼此被涵蓋在相同的規範之中 (Wendt, 1994:388-391)。

如果行為者間對合作關係的考量，不出於對前次合作利害的算計，那麼便無法證明溫特所說的策略實務機制確實超越傳統賽局理論的範疇。基此，筆者希望舉出確切的事例，證明行為者在多次的策略實踐中，確有忽視前次合作經驗而繼續選擇合作的情形。在此藉 19 世紀以來俄國與巴爾幹半島斯拉夫民族國家的策略互動，來瞭解基於策略實務影響戰略賽局的過程。

壹、集體身分並非首次促成合作的主要成因

歷史上，在俄羅斯崛起以前，巴爾幹半島斯拉夫人與俄羅斯民族所屬的東斯拉夫人，實際上並沒有太緊密的聯繫。早在匈人入侵歐洲導致歐洲民族大遷徙時，許多斯拉夫部落就遷移到了羅馬帝國東部的邊境，並在接下來幾個世紀與拜占庭帝國相互爭戰與交流；而此時，整個東斯拉夫民族散布在廣袤的歐俄平原上，先後受到瓦良格人（斯堪地那維亞維京人的一支）以及金帳汗國的統治與影響。雙方的歷史發展，空間上被居住在多瑙河流域的羅馬尼亞諸國所阻隔，除血統與拜占庭帝國傳播的東正教信仰外，彼此實際上並無太多關聯 (Mango,



1980; Mallory & Adams, 1997)。

然而，因共同面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威脅，雙方開始出現了基於策略性的合作關係。南斯拉夫民族遭到土耳其人的征服與壓榨，而東斯拉夫民族則面臨到鄂圖曼屬國克里米亞汗國的游牧侵擾與擄掠。俄羅斯沙皇國統一後，用數百年的時間將克里米亞汗國的勢力壓縮到了黑海附近，巴爾幹半島的局勢遂開始與俄國利益產生關聯。

由此可見，既存的集體身分並非促成俄國與南方東正教民族合作的主要成因。就民族意識上，泛斯拉夫主義遲至 1848 年才漸趨成熟 (Magocsi, 2002:373)；就宗教信仰上，對於正教的信仰雖有助於促成彼此合作，但並非合作得以產生的必要因素。拜占庭帝國滅亡後，希臘人主要是向作為天主教徒的拉丁世界求助 (Bisaha, 2004:114)；反抗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扎波羅熱哥薩克人，雖然信仰東正教，一開始求助的外援卻不是同樣信仰東正教的近鄰俄羅斯，而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克里米亞汗國 (Magocsi, 2007:200)。在與俄羅斯間的集體身分明確化以前，行為者仍然是以合作效益作為選擇合作對象的依據。

貳、賽局中的背叛是否阻礙下一次合作

俄國與巴爾幹半島民族的合作，同樣存在著利益與代價兼具的賽局關係。如果俄羅斯幫助巴爾幹半島民族（包括希臘在內）反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有助於削弱作為宿敵的土耳其，但同時也會造成俄、土關係的惡化，使俄國南方領土遭受戰火摧殘，並且分散掉可對中歐投射的國力。俄羅斯於 1812 年倉促結束與鄂圖曼土耳其的戰爭，以將主力調回北方防範拿破崙入侵，即為此種考量的表現 (Vucinich, 1982:72)。


另一方面，巴爾幹半島民族也必須在臣服鄂圖曼與勾結俄羅斯當中做出選擇。選擇與俄羅斯結盟，或許能為民族獨立爭取一絲曙光，但倘若失敗或遭到

俄羅斯出賣，必將遭到穆斯林軍隊的報復性屠戮、擄掠，希臘獨立戰爭中即有大量希臘人被埃及軍隊抓到埃及作為奴隸販售 (McGregor, 2006:102)；而若選擇與穆斯林統治者合作，風險雖然較低，卻須持續受到穆斯林統治者的壓榨以及剝削。

弔詭的是，雖然許多巴爾幹半島民族感念俄國在其民族解放過程中提供的幫助，但歷史上比較常出現的情形卻如下：俄國為顧全本國利益，對巴爾幹半島民族獨立運動或許不為所動，或許支持卻虎頭蛇尾。

在俄羅斯軍隊出現在黑海海岸與多瑙河畔以前，巴爾幹半島的基督徒民族並沒有想到可以與俄羅斯合作。巴爾幹半島最先接觸到俄羅斯勢力的地區，與最早開展與俄羅斯合作關係的地區也不相同：作為與俄南草原接壤的多瑙河羅馬尼亞人諸國之一，摩達維亞大公國（今日摩爾多瓦前身）並沒有太多與俄羅斯勾結的意願。摩達維亞與瓦拉幾亞這兩個被迫臣屬於土耳其的羅馬尼亞人國家，民族上不是斯拉夫人，且在土耳其帝國轄下享有比較高的自治權；滲透到多瑙河諸國統治階層的外來民族，也不是穆斯林，而是同樣作為正教徒的希臘人——法納爾人（Phanariote）(Drace–Francis, 2005:26)。第一個起義的民族，是與俄羅斯未接壤也缺少接觸的塞爾維亞人，意即俄國並非首次起義的誘發者。

塞爾維亞人在 1804 年發動歷史上第一次大起義，在卡拉喬治（Karadorde Petrović）所領導的攻勢下，未倚賴俄國力量的塞爾維亞人成功於 1806 年迫使鄂圖曼帝國與其談和；然而，由於第七次俄土戰爭在 1806 年底爆發，塞爾維亞人毀棄已經與土耳其人達成的談和條件，轉而與俄軍合作攻擊鄂圖曼軍隊，企圖進一步擴大戰果 (Morison, 1942:xviii)。塞爾維亞人並非主動尋求俄國協助，而是在俄國自己忽然成為塞爾維亞「敵人的敵人」以後，才把俄國視為潛在合作對象。




然而，俄國在 1807 年 8 月被迫與拿破崙法國簽署《提爾西特條約》，匆匆與鄂圖曼帝國停戰，形成塞爾維亞獨力面對土軍的局勢；1810 年，俄軍重新投入對土作戰，甚至派兵進入塞爾維亞境內，卻又在 1812 年為應付拿破崙入侵而與鄂圖曼帝國談和，並停止對塞爾維亞的支持。1813 年，土軍攻克首府貝爾格勒，對市民展開報復性的屠殺與擄掠，塞爾維亞的第一次起義遭到徹底鎮壓（Jelavich, 1977:35）。

塞爾維亞兩次與俄國的合作，都是以俄國自行退場做結。俄國第一次的背離，使塞爾維亞平白喪失了與鄂圖曼帝國和談的機會；俄國第二次的背離，使得塞爾維亞起義遭到撲滅，並遭致鄂圖曼帝國的殘酷報復。在兩次賽局中，塞爾維亞均未因與俄國合作而獲利。

第五次俄土戰爭期間，希臘人曾在 1770 年俄國海軍將領阿列克謝·奧洛夫（Alexey Orlov）的煽動與援助下，於波羅奔尼薩（Peloponnese）發起奧洛夫起義（Orlov Revolt），卻遭致失敗與嚴酷鎮壓，希臘全境被效忠鄂圖曼帝國的阿爾巴尼亞穆斯林報復性蹂躪（Jelavich, 1977:35; Roessel, 2011:79）。當 1821 年希臘人在多瑙河流域起義時，塞爾維亞人不久前才被盟友俄國兩度捨棄。觀此背景下，倚仗俄國來反抗鄂圖曼帝國對於希臘人而言，顯是缺乏保障且代價慘痛的。

然而，身為多瑙河法納爾希臘人、擔任俄軍將領與沙皇副官的亞歷山大·伊普斯蘭提斯（Alexander Ypsilantis）作為 1821 年多瑙河流域起事的領導者，卻仍對俄國援軍寄予厚望。該次起事地點屬於俄、土勢力範圍重疊處，非俄國同意則鄂圖曼軍隊無法進駐鎮壓。但俄國基於外交形勢考量，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非但沒有派兵支援，甚至與伊普斯蘭提斯撇清關係，多瑙河的起事最終遭到土軍徹底鎮壓（Brewer, 2011: 50–59）。

之後，希臘人孤軍奮戰了 6 年，俄國仍然無動於衷，直到 1827 年 10 月才



決定與英、法共同派出海軍干預希臘革命。其後，俄國於 1828 年發動第八次俄土戰爭，並在 1829 年迫使鄂圖曼土耳其簽署《亞得里亞堡和約》，俄國方於獲取北高加索等地領土的同時連帶要求土耳其保障希臘的自治權（Marx & Engels, 1855–1856:725）。希臘獨立的第一槍因對俄國的冀盼而打響，但從 1821 年到 1829 年間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俄國並沒有回應希臘人的期望。

前一場賽局的誤判，理應足以讓下一場賽局中的參與者瞭解到：把俄國的支持作為起義的理由並不理智，因為俄國只有在合乎自身利益時才會出手支持巴爾幹半島的民族起義，否則俄國很可能維持冷漠或中途脫身。但前一場賽局的教訓，卻不會阻礙巴爾幹半島民族在下一場賽局中發動以俄國支持作為成功前提的起義。或可如此描述：前次合作行為本身，便能為行為者提供除利益算計以外的誘因，使行為者對與相同對象的合作抱持了基於慣性的期盼，進而對當前賽局中的合作所能帶來損益有欠詳孰思慮，可見引導行為者繼續合作的並非利益、而是觀念與身分。

表 3-1 塞爾維亞起義與希臘起義與俄國歷次合作結果

	塞爾維亞起義	希臘起義
第一次 與俄國合作	1806 年 第一次大起義勝利 塞毀棄和約，支援俄軍作戰	1770 年 俄國海軍煽動起義 波羅奔尼薩爆發奧洛夫起義
	1807 年被俄國出賣 俄土停戰，塞獨力作戰	失敗 希臘全境遭報復性蹂躪
第二次 與俄國合作	1810 年 俄土復戰	1821 年 多瑙河畔起義
	1812 年被俄國出賣 1813 年貝爾格勒遭土屠殺	起義成功性建立在俄國援助上 俄國卻默許土軍進入邊境鎮壓
第三次 與俄國合作	1815 年 再次起義成功	1827 年 英、法率先干預革命
	1878 年在俄國幫助下 獲得高度自治	1828 年 俄國出兵 1829 年 希臘自治成為 俄土和談內容之一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由此來看，歷次賽局中選擇與俄國合作的期望值，往往很可能低於行為者預期。但是巴爾幹半島民族在與俄羅斯結盟互動的過程中，產生了學習的效果：原先與東斯拉夫人沒有太多關聯的南斯拉夫人乃至於西斯拉夫人，也開始向俄羅斯學習，進而產生「我群」概念。「我群」最明顯的展現，就在各族群國旗顏色的採用上：由俄羅斯國旗白、藍、紅三色為基底構成的「泛斯拉夫色彩」，日後紛紛被不少斯拉夫民族國家所採用，並延伸到非土耳其統治區的波希米亞（Bohemia，今日捷克）地區與上匈牙利（Upper Hungary，今日斯洛伐克）地區（Marx & Engels, 1855–1856）。由此可見，雖然雙方合作的收效不如預期，但身分與利益仍然在合作的過程中被形成，而且隨著時間增長而愈加深厚（Shelley, 2013: xvi）。

第四節、1904 年的沙俄：集體身分對戰略能力影響加劇



三種集體身分形塑機制在戰略賽局中運用的實例，可以顯現出操作集體身分對戰略賽局乃至於戰爭的重要性。與實體的軍事行為相較，集體身分的改變更能大幅度地改變敵對關係兩造的權力分佈狀況。惟基於溫特集體身分論述的目的在於為對國家間的合作以及世界國家產生的可能性作出解釋，論述方向著重集體身分如何被建構，鮮少論及集體身分如何被解構。然筆者以為，溫特關於集體身分形塑的論述，實際上是一劍兩刃的論述：集體身分既然可以循三種機制加以結合，理當也可以循三種機制加以瓦解。以改變系統內權力結構為目的之集體身分聚合，實際上就是在敘述跨國結盟得以產生的觀念層面機制。但以改變系統內權力結構為目的之集體身分拆解，並沒辦法直接參照溫特文本的論述進行瞭解，故對該部份進行推論與彙整，應有其論述價值存在。

國家身分的裂解，對實務經驗的直觀可粗分兩種成因：其一是基於整體身分而產生的隔閡，如國族、宗教等外因因素；其二是基於社會身分而產生的斷層，如社經地位高低雙方經互動而內因發現的差異。沙俄進入 20 世紀以後的歷史，兼能展現此兩種身分裂解型態：俄羅斯是一個內部身分聚合變動頻繁且持久的多民族國家，亦是現代第一個因社、經階級身分差異而爆發大規模內戰的國家。

在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各種關係到集體身分問題的國內騷動，才跨地區、跨人群、跨議題且高頻率地密集出現在 1905 年以後 (Ascher, 2004:6)。然而，沙俄並非遲至 1904 年才成為多民族國家，也並非遲至 1904 年才出現經濟、社會層面的階級問題。



壹、沙俄的國族身分困境

俄羅斯作為由俄羅斯民族主導的多民族國家，幅員涵蓋相對遼闊。觀察俄羅斯作為集體身分形塑的過程，在歐洲文明的發展進程中，歐俄平原上的東斯拉夫人是比較落後的一群，國家組織的形成也較晚。貫穿整個中世紀中歐與東歐交界處的，就是天主教德意志民族向東征服的過程。條頓騎士團作為「北方十字軍」，先征服了作為西斯拉夫人的古波美拉尼亞人與古普魯士人，再向東拓展勢力，與歐洲最後一個多神信仰國家立陶宛發生衝突，並將勢力拓展到利沃尼亞、庫爾蘭與愛沙尼亞，最後才在楚德湖戰役為俄羅斯人建立的諾夫哥羅德共和國所阻擋（Christiansen, 1997）。日耳曼人從部落演進到國家的時間相對於東斯拉夫人早上許多，散居各地的東斯拉夫人部落遲遲沒有凝聚出國家身分，只有準國家組織存在；直到斯堪地那維亞維京人征服時期，維京人的一支——瓦良格人沿涅瓦河深入歐俄平原腹地的盧西尼亞地區（今烏克蘭境內），征服當地斯拉夫部落並與之融合，才形成東斯拉夫民族第一個具早期國家形體的政權：基輔羅斯，並成為俄羅斯民族的母體（McCray, 2006:26）。

俄羅斯民族誕生後，出現了莫斯科、諾夫哥羅德、梁贊等各自為政的政權，彼此相互競逐，直到蒙古拔都西征以後，才被一致地納入金帳汗國的約制下。金帳汗國對羅斯諸國的政治安排，賦予了莫斯科公國較大的權力，產生出由莫斯科主導的羅斯諸國體系（Gorskij, 2000:187）。在莫斯科擺脫金帳汗國影響後，伴隨著莫斯科對羅斯諸國的逐步整合，俄羅斯民族的集體身分才得以凝聚。

在俄羅斯沙皇國建立以後，俄羅斯集體身分的擴張出現了限界：莫斯科公國與後繼者俄羅斯依序對四個韃靼汗國（喀山、阿斯特拉罕、諾蓋與克里米亞）完成了征服，但韃靼人至今仍保有不同程度有別於俄羅斯民族的自我身分意識。對西面的征服，將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



蘭、芬蘭納入其國內秩序，但促使此類民族「俄羅斯化」的過程並不順利，更遑論東南面與俄羅斯人差距更大的高加索各族（切爾克斯、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車臣、印古什、達吉斯坦、喬治亞、亞塞拜然）與各草原民族（卡爾梅克、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在俄羅斯沙皇國的原始版圖外，唯一被納入俄羅斯民族集體身分的，似乎只有俄羅斯南部的部分哥薩克人：哥薩克人在俄羅斯政府的族裔分類上，並未從俄羅斯族當中被獨立出來（Demoskop Weekly, 2013）。

由此可見，俄羅斯的多民族問題顯非 1904 年才出現的問題，而是早在莫斯科公國對外擴張時便已存在。

貳、源自農奴經濟的階級身分矛盾

15 世紀前後，農奴制度在西歐因黑死病影響而逐漸消退的同時，卻逐漸蔓延到東歐，農奴並於 17 世紀成為東歐農業生產人口的主要構成，即所謂「再農奴化」（德語 *Zweite Leibeigenschaft*），並維續到 19 世紀。數百次的農起義貫穿了整個俄羅斯 17、18 世紀的歷史，俄羅斯民族的邊陲層級更經常與少數族裔（尤其哥薩克人與韃靼人）勾結起義（Alexander, 1969:95-144）。

而俄國落後西歐將近 50 年的工業化，也使工業所造成貧富階級對立的陣痛延續到更為晚近的年代。此種工業化的陣痛，更與尚未徹底消失的農奴制遺緒互相結合：被土地與農奴主所束縛的農奴以及窮苦農民，運用農閒時期進入大城市的工廠，於惡劣的環境與社會關係中進行短期勞動，此種社會問題並隨俄國工業化的推進而持續惡化（Skocpol, 1979:91-93）。在此趨勢下，1905 年俄國人民對戰爭的可忍受程度確實可能較 1856 年為低，。

於此同時，西歐因應工業革命衝擊所產生的社會思想，無論左翼、右翼，均因俄羅斯當時的需要而被知識分子引進，並被用於對社會現象的解釋。原先



保守且未經歷大規模宗教改革的東正教社會，遂遭受新知識的衝擊，動搖了俄羅斯人原先對國家身分的想像（Harcave, 1970:25）。

由上可見，經濟所造成的階級身分問題，亦非於 1904 年才產生。但階級身分確實可能在沙俄進入 20 世紀之際逐漸複雜化與嚴重化。

參、戰爭負擔與身分問題的關聯性

筆者在此欲就一種可能性進行探討：沙俄國內動亂的頻發，是否與戰爭帶來的國內社會負擔呈現正相關。1853 年克里米亞戰爭與 1904 年日俄戰爭，均是邁入工業革命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大規模戰事，兩場戰爭都沒有過於綿長的戰線，戰事均未延燒到俄羅斯核心經濟地帶，且都是以俄國戰敗告終。然而，俄羅斯在日俄戰爭結束後發生了國內的大規模暴亂，克里米亞戰爭卻看似並未帶來此種影響。如果造成此種差異的成因，純粹是因為日俄戰爭為沙俄造成的國內物質性負擔比克里米亞戰爭沉重，那麼從身分面與觀念面的討論便無足輕重。

為檢驗此項假設，筆者擬參考指涉到權力的人力數據，來簡單比較 1853 年克里米亞戰爭與 1904 年日俄戰爭對俄羅斯影響的差異。

由於兩場戰爭中敵對雙方的軍事科技水準相距不遠，二者均是工業化國家之間的衝突，且俄國本土均未遭受太大直接傷害，故得以取單一變項：人口來討論戰爭負擔大小。在此依戰時俄羅斯人口數、雙方參戰兵員數對比與陣亡兵員數，試圖大致瞭解沙俄面臨社、經壓力的強弱以及沙俄國家權力喪失的多寡。

發生於 1853 至 1856 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土、法、英、薩聯軍動員的總兵力約 97 萬 5850 人，俄國與少量希臘人志願軍加總的兵力約 70 萬 7500 人（Voenizdat, 1999:315），俄方陣亡兵員數約 14 萬 3000 人，受傷兵員數約 8 萬人，



總計約 22 萬人 (Kozelsky, 2012: 903–917); 但也有傷亡總數高達 40 萬人的估計量 (Gouttman, 1995:479)。俄羅斯帝國於 1850 年總人口數估計為 6850 萬左右 (Tacitus.nu, 2017)。

發生於 1904 至 1905 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動員的總兵力約 120 萬人，俄國與其少量盟國軍隊加總兵力約 136 萬 5 千人 (Mitchell & Smith, 1931:6)，俄方當場陣亡、傷重不治、病歿、負傷兵員總數 (不含被俘人數)，綜合各方數據估計約落在 18 萬 9332 人至 22 萬 1096 人之間。俄羅斯帝國於 1900 年的總人口數估計為 1 億 3290 萬左右 (Tacitus.nu, 2017)。據此做成表 3-2，以衡量兩場戰事對俄羅斯國內造成負擔差距。

表 3-2 克里米亞戰爭與日俄戰爭對沙俄造成壓力比較

	克里米亞戰爭	日俄戰爭
敵我兵力比率 (敵方兵員/俄方兵員)	137.93%	60.00%
徵用人口比率 (兵員數/總人口)	1.03%	1.03%
人口損失比率 (死傷數/總人口)	0.32%~0.58%	0.14%~0.17%
兵員損失比率 (死傷數/兵員數)	31.10%~56.54	13.87%~16.20%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由此可發現，相較兩次戰爭之系統內部權力結構，沙俄於克里米亞戰爭中處於絕對的權力劣勢，對日作戰時反而處於權力優勢。單純對上述數據進行描述，克里米亞戰爭時，平居每位俄軍士兵要面對 1.38 名敵兵，日俄戰爭中卻只要面對 0.88 名敵兵，克里米亞戰爭為俄國造成的兵力壓力是日俄戰爭近 1.57 倍。



沙俄將總人口約 1.03% 投入克里米亞戰爭，將總人口的 1.03% 投入日俄戰爭，兩場戰爭徵用人口比例差異不大。

取死傷總數估計範疇的中位數，沙俄每 1000 名國民中就有約 4.5 人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死亡或因傷病退出戰場，在日俄戰爭中卻只有約 1.5 人。

如欲以出動兵員的死傷程度來衡量二者的失敗程度，則兩場戰爭的失敗程度並無太大差異，投入兵員的損失都落在 3 成至 5 成之間。可見 50 年間的軍事科技演進，也不足以造成戰場兵員死傷比率的大幅提升。

兩場戰爭中，作為俄羅斯經濟重心的歐俄平原本土均幾乎未遭受敵軍的直接摧殘，故人口的耗損是對生產力與消費力的主要打擊，筆者在此暫且用人口耗損比例來衡量俄羅斯在兩場戰爭中的物質消耗與負擔。單憑人口損耗觀之，克里米亞戰爭帶給俄羅斯人的負擔是日俄戰爭的 2 至 3 倍。若再將交戰雙方的軍事能力差益考慮進去，克里米亞戰爭中的英、法作為工業革命先驅國家，經濟體質與科技水準略優於俄羅斯；反觀之，日本作為全國人口、產業條件、工業化時間、有生兵力均遜於俄羅斯的後進工業化國家，物質條件上較俄羅斯更趨劣勢。日俄戰爭帶給俄羅斯的物質壓力，顯不足以與克里米亞戰爭相比。

但是，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乃至結束以後數年，俄羅斯國內並未發生任何大規模動亂（除卻高加索地區早已經存在的戰事以外）；而在日俄戰爭結束以前，莫斯科就發生了導致血腥星期日事件的大規模工人抗議示威，戰爭結束後更陷入超過一年的全國性革命。有鑒於此，戰爭不是帶來的國家權力削弱與國內負擔多寡，並不是引發此次騷亂的單一變因或主要變因。

戰爭本身以外經濟結構層面影響，或許與沙俄國內的動盪有較高的關聯性。俄國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於 1890 年代大力推動俄羅斯的工業化，所獲成果斐然（Skocpol, 1979:91-93），但俄羅斯國內的罷工頻率也隨之提高。根據表

3-3，俄羅斯國內的年均罷工次數在 1862 到 1894 年之間並沒有顯著的成長，在 1895 年以後卻開始激增。工業化促使原先居住在鄉村的農民進入都市謀生，產生數以百萬計的大量「農民工」，並使原先與公民社會脫節的農民出現了作為城市無產階級的社會意識，成為 1905 年與 1917 年革命得以產生的先決條件(Perrie, 1972:57, 124-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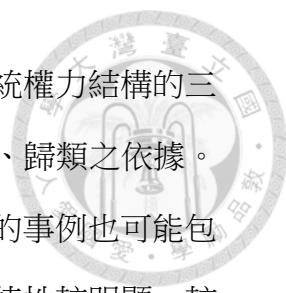
表 3-3 1863 至 1905 年間沙俄國內年均罷工次數

時期	國內年均罷工次數
1862-1869	6
1870-1884	20
1885-1894	33
1895-1905	176

引用出處：Ascher, Abraham, 2004. *The Revolution of 1905: A Short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

工業化的經濟性社會結構問題，確為俄國動亂的生成條件；但同樣的問題並非只存在於俄國，也存在於作為其交戰國、經濟基礎更薄弱的日本。惟在戰時，只有日本人煽動俄國的暴亂，日本國內的騷動卻都在日俄戰爭停戰後才發生。筆者據此假設，在集體身分的層面上，俄國基於民族、地域、社會共享知識等因素，集體身分的表現確實較日本為鬆散，使動亂的誘發更為可行。經濟性社會結構雖然扮演重要角色，但僅只是影響集體身分的因素之一，集體身分仍然是關鍵的中介變項。

本研究旨非在於探討促成革命的經濟社會條件，而是著重於戰時對集體身分的操作方法與成效。本研究欲就沙俄自 20 世紀以來的經驗，分按溫特所提出



的集體身分形塑三項機制，歸納出運用集體身分裂解來改變系統權力結構的三種途徑，並各舉出典型事例作為不同時空環境下其它案例援引、歸類之依據。單一案例的操作上可能同時存在對多種機制的運用，以下遴選的事例也可能包含不止一種機制的作用，然基於其在特定某種機制上所呈現的特性較明顯、較易於觀察，因此擇其用以描述特定機制。

接下來三章，筆者擬以 20 世紀初的沙俄為觀察對象，依據集體身分形塑的三種機制，審視沙俄在與戰略賽局競爭對手的抗衡中，如何因集體身分的鬆散與裂解，使內部群體反覆擺盪於國際體系與國內秩序的抉擇間，隨之衍生出一連串敵我結構內權力配置的改變。

第四章、加邦案例：以結構系絡重塑身分




依據前二章的論述，筆者推定作為結構系絡的無政府文化具兩項特性：第一，無政府文化以內化程度作為彼此轉移的條件；第二，無政府文化論述亦存在於國內秩序底下的中心層級與邊陲層級之間。依此二脈絡，本研究得以將結構系絡機制適用於對俄羅斯帝國於 20 世紀初面臨的集體身分解體現象的解釋。

溫特提出的結構系絡機制，是指藉由將共享知識嵌入國際機制與威脅複合體，以產生一套互為主體性的系統性結構；此種系統性結構可能是人人相互為敵的結構、可能是亦敵亦友的結構、也可能是視彼此為友伴的結構，進而改變行為者對「相對利益」亦或「絕對利益」的採用，一切差異均取決於植入何種共享知識。因此，共享知識是為影響結構系絡的關鍵因素，而溫特選擇用「無政府文化」來描述結構系絡。

筆者選擇 1905 年初俄羅斯東正教神父喬治·加邦 (Georgiy Apollonovich Gapon) 在當時俄羅斯帝國首都聖彼德堡所領導的大規模工人請願集會，做為觀察上的切入點。

第一節、共享知識作為賽局中的被操作物

筆者在此將 1905 年初發生在聖彼得堡的工人請願，視為對俄羅斯集體身分某種程度上的動搖，因為其成員組成與請願訴求都攸關階級利益問題，而依據溫特所述，利益是由身分所提供。此次事件之所以可以提高到國家層級來檢視，是因為該次集會發生於日俄戰爭期間，以停止戰爭作為次要訴求之一 (Sablinksy, 1976:3-25, 274)。筆者將該次事件視為俄羅斯此後近 20 年的對外戰略賽局能力大幅削弱的起點，並將其影響歸類於因身分問題所造成的國際權力結構變動。




然而，此次事件是否可以套用溫特的結構系絡機制來檢視，尚有一疑義：溫特認為結構系絡的改變肇因於共享知識的變化。導致此次騷亂的主要變因，是否屬於國內共享知識的改變；亦或實際上共享知識並未改變，事件純粹肇因於類物質生活條件的惡化——無論是基於國家層級的戰爭所致，還是生產方式的變遷所致。此項疑義，是本章討論首先需要釐清的項目。

共享知識轉變對此次事件所起的誘發作用，關鍵性不容忽視。聖彼得堡工人請願並不是由親身感受到生活環境惡化的工人階級本身發起，而是由非隸屬於工人階級的神職人員——東正教神父加邦所號召與組織。如果沒有加邦的組織與號召，在當時社會環境下，此種工人結社與集會不可能發生：加邦所組織的聖彼得堡俄羅斯工廠工人大會（*Assembly of Russian Factory and Mill Workers of St. Petersburg*）受到了聖彼得堡秘密警察組織——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俄文縮稱為 *Okhrana*，中文簡稱「保衛部」）的庇護，限定只有抱持東正教信仰者可加入，組織功能除改善工人生活環境以外，還包括增進工人的道德與信仰（*Busch, 1969:121*）。

以 1905 年俄羅斯的客觀環境條件來說，如果缺少了加邦所提供的知識條件：一種被中心層級允許存在卻有別於中心層級的一種知識，大規模的工人集會請願就會喪失得以發生在該時空環境的必要條件。如果這種能被執政當局允許的共享知識未能出現，共享知識的公開傳遞便會遭受侷限，可動員群眾的加速度亦將放緩。由此可證，共享知識改變對 1905 年俄羅斯集體身分動搖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本事件的發生合乎溫特所述的結構系絡機制。

這些觀念層面的知識與執政當局大致相容，只有對威脅輕重的判斷上相異：從訴求上可以推知，加邦的組織視國內的資本家為首要威脅，而非將外國人視為首要威脅。但加邦所提供的社會知識，以國家層級而言仍然有別於俄羅斯中心層級：加邦的組織主張對日本停戰，而沙皇尼古拉二世相信雖然俄國陸



軍遭受若干挫敗，但藉由海戰的勝利，戰爭最終應能取勝，故當繼續作戰（Connaughton, 1988:109, 342）。兩種不同的社會知識，足以使日、俄間的互為主體性結構呈現出有所區別的面貌。而正是這種相異的互為主體性結構，得以令系統內行為者對既有的權力結構改觀。

值得注意的另一點，是此次事件與國際戰略賽局之間的關係：加邦所策劃的首都大規模工人請願，獲得了日本駐瑞典武官（原駐俄武官）明石元二郎大佐的資金援助（Busch, 1969:121）。雖然無法確定日本作為國際行為者給予加邦資助一事對該事件起到多少催生效果，但以結果來看，「血腥星期日」事件以降帶給沙俄的騷亂確實成為了沙皇尼古拉二世願意停戰重要誘因（Busch, 1969:121）。單就日方資助行為的存在來反證，筆者認為日本對俄羅斯集體身分存有三項對行為產生而言必要的判斷：

第一，觀察到對手沙俄國內的集體身分存在裂縫；

第二，相信日本的介入可以助長沙俄集體身分的瓦解；

第三，相信沙俄集體身分的瓦解有助改變國際系統內的權力分布結構。

由此推論，日本作為國家層級行為者所採取的作為，是以割裂該邊陲層級與中心層級間的集體身分作為短期目標，以迫使中心層級改變行為或削弱中心層級可用於作戰的權力作為最終目標。

此處所說的邊陲身分塑造，係指催生出一個對國家層級而言有意義的身分，以及以此種身分為核心所構成的行為者。以布山的國家模型作為依據，除卻加邦以新的社會知識經結構系絡機制所創造出的邊陲層級身分以外，還需要有足夠的機構以及物質基礎，才能產生出一個具備國家層級行為者要素的群體，亦或稱之為足以被放上國家層級的「主體（subject）」：惟有作為屬於國家層級的主體，才可能產生與中心層級之間的互為主體性。



以此模型來看，便可瞭解日方行為與目的之間的工具理性所在：提供加邦資金用以發展組織，可以令其為邊陲層級創造出最基本且有效的機構，並憑此機構進行物質基礎的有效率獲取與運用。

加邦支持者擁有布山所設定的三項國家要素，但擁有的程度是否足以跨過國家層級的門檻，仍須回顧第二章所提到本研究對「國家」所採取的三項定義。借助此三項定義，得以檢視加邦的支持者於 1905 年能否被視為一個具備國家意義的行為者來看待：

其一，在社會集體身分方面，加邦支持者的國際利益排序，與沙俄的中心層級並不同：滿州與朝鮮的利益對俄羅斯底層工人而言無關痛癢。加邦支持群眾也確實採取了行動，在非核心的訴求中請求中心層級停止對外戰爭行為，可見渠等具有獨立於他者的群體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

其二，在互構能力方面，加邦支持者與外國（日本）發生了互動，並且與日本達成了合作關係，彼此形成了因利遵守的洛克式無政府文化結構，可見渠等能力足以與處於國內秩序以外的行為者進行互動。

其三，在權力方面，加邦支持者發動了規模龐大的集會：動員 3 萬民眾往冬宮行進，並且確實足以導致國際系統下的權力結構改變，可見所持權力與運用權力之行為，在國家層級觀察下具意義。

由此可見，單就日本與沙俄之間在 1905 年初所共處的國際體系來看，加邦的支持者是可以被放在國家的層級上被討論的，或可將其理解為「另一個俄羅斯」。這種定義方式與描述方式，同樣可以普遍適用在跨時空且為數眾多的眾多案例上：俄羅斯的紅白內戰，冷戰時期的分裂國家與代理人戰爭，實際上都是因為共享知識的分裂而使單一國家內部出現複數個兼具社會集體身分、互構能力與權力的獨立行為者，並且相當程度地被國際體系各自視為主權國家看待。



加邦的組織除卻沒有號稱組成新政府、沒有採取武裝以外，其影響國際政治的方式與這些被視為國家的行為者並無二致，都在原先的國內秩序底下創造出了一套複數行為者互為主體性的系統性結構。

不具備政府名義與不具備武裝，並不會導致上述功能無法被正常發揮：大英帝國轄下的印度人，借由甘地所領導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最終迫使英國撤出南亞；越戰時期美國參與反戰運動的龐大人群，最終和平迫使美國退出越戰。用上述的思維來理解這兩個群體，甘地領導下的印度群眾可以被視為有別於英屬印度的「另一個印度」；美國反對越戰的群眾可以被視為不以越共為敵的「另一個美國」，其與北越所共組的互為主體性結構展現出的是洛克式無政府文化的風貌，有別於美國的中心層級與越共所處的霍布斯文化。

第二節、集體身分衰退的典型

上節呈現的，是加邦所領導工人階級走出由沙皇主導國內秩序此一過程的啟動原因，於此則要觀察結構系絡改變的具體情形。在加邦所代表的案例上，尤應觀察工人階級作為具備自身集體身分的行為者，其與沙皇政府間的結構系絡其後又發生了何種演變，最終導致了 1917 年以工人身分為主體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在霍布斯文化底下徹底否定沙皇政府的生存權。雙方結構系絡發生改變的幅度與成因為何，尚有待對無政府文化間相互轉換的臨界點做出釐清。

早在加邦組成工人團體以前，工人階級便已存在於俄羅斯國內社會。加邦的出現所帶來的改變，是其提供了工人階級一個新的社會知識，讓工人深化對階級集體身分的認同，並意識到工人整體作為一個行為者，具備一定程度權力且足以採取若干行動以爭取自身利益。雖然加邦所提供的社會知識與俄羅斯整體的共享知識相距較小，乃至於可以被沙俄秘密警察機構所接受，該社會知識甚至倡議遵從國內秩序，工人與政府雙方至少處於被迫遵守層級的康德文化；



但即使是如此輕微的共享知識差異，已足以促使沙俄集體身分發生歧異。

在加邦所領導的工人群眾遭遇血腥鎮壓後，原先主張服從國內秩序的知識成分瞬即消失，沙皇政府以武力應對工人團體的可能已轉為事實，導致以加邦為首的工人團體不再與沙皇政府共享康德文化，雙方關係落入洛克文化的等級。

經由上述歸納可未本案例做出如下描述：1905 年「血腥星期日」事件的發生，正是導致加邦背後的俄羅斯工人階級與沙皇政府間結構系絡從緊密走向疏離的關鍵，進而導致工人團體與沙皇政府之間在 1905 年至 1906 年邁入趨近於無政府狀態的對抗情形。

透過表 2-6 可較細膩地觀察俄國工人與沙皇政府間的結構系絡從 1904 年到 1918 年的九種層級變化：

1904 年以前，聖彼得堡一帶的俄國工人，其集體身分方因加邦組建宗教性質工人團體而凝聚成形。在以傳統價值為號召的情況下，工人團體抱持順服沙皇政府的態度，相信沙皇願意增進工人權益，沙皇政府也允許此種工人團體的存在，彼此處於界在主動遵守層級與因利遵守層級之間的康德文化。

1905 年「血腥星期日」事件中，沙俄因偶然事件對工人團體展開武力鎮壓，康德文化存在的條件消失。惟在「血腥星期日」到首次俄羅斯族工人罷工之間，工人團體短暫趨於沉寂，在組織瓦解且領導乏力的情況下，工人與沙俄政權間尚未共享「武力衝突」此一互為主體性現象，因此尚處於被迫遵守層級的康德文化中。

1905 年初工人罷工事件後，工人出現藉由衝突手段對抗沙俄的情況，武力成為可能的互動手段。但初期的罷工僅基於工人對於惡劣生存環境的反抗，並未至於質疑沙俄存在的正當性，因此仍處於主動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



當社會革命黨人插手罷工事件後，工人階級的反抗行為開始帶有反對沙俄帝制的色彩 (Yedin, 1999,49)，但最終因為沙俄當局對工人鎮壓與讓步兼施的措施，使工人最終基於自身利益考量而趨於妥協，彼此關係降至因利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沙俄政治醜聞頻傳，使民間對沙皇政權信心再次流失。戰爭爆發後，工人階級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斯托雷平時期的改革成效已被戰爭所抵消。在 1917 年 3 月 8 日，工人罷工示威的參與者首次採用了「反對戰爭」與「結束專政」的口號 (Curtiss, 1957)，沙俄當局用以抵禦外國的功能性已不被認為合乎工人利益，雙方已步入被迫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

以工人為主要推動力量的二月革命爆發以後，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予胞弟米哈伊爾大公，但米哈伊爾拒絕登基踐祚，工人階級成功滅亡沙俄。在俄國臨時政府底下，擁戴布爾什維克的部分俄國工人與保皇勢力同時存在，雙方互不承認對方生存權，但對彼此生存均不構成威脅，雙方處於主動遵守層級的霍布斯文化。

以俄羅斯工人階級利益為旗幟的布爾什維克，為壓制保守派、擴大政治權力並結束對外戰爭，在列寧等人的領導下於 1917 年 11 月發動社會主義性質的十月革命，推翻俄羅斯臨時政府，布爾什維克政權與保皇勢力進入了因利遵守的霍布斯文化。

1918 年以後，俄國陷入紅白內戰，受工人支持的布爾什維克政權與保皇的白軍正式進入攸關存亡的被迫遵守層級霍布斯狀態。1918 年 7 月，布爾什維克警察組織「契卡」甚至基於保衛政權生存的理由，屠殺已遭囚禁於葉卡捷琳堡的遜帝尼古拉二世與其家族 (Rappaport, 2010)。

循以上脈絡可知，從 1904 年到 1918 年，俄羅斯工人與沙俄確實從相當緊



密的結構系絡關係落入極其險惡的層級，工人從高舉尼古拉二世的肖像一步步走向屠殺尼古拉二世及其子女的結局。而在這 14 年間，工人階級也與沙俄政權主客易位，自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布爾什維克獲得了代表國家的合法性，而沙皇政權淪為遊走邊陲的保皇勢力。


而這一連串結構系絡的改變，先後讓兩個國家得利。從 1904 年到 1905 年，作為沙俄主要國際競爭對手的日本，因沙俄內部結構系絡的鬆動而獲取了戰爭利益；1914 年至 1918 年，作為沙俄主要國際競爭對手的德國，有意識地主動將列寧送回俄國境內，並且成功迫使新成立的蘇俄政權割讓大片領土，更是直接獲益於沙俄結構系絡的劇變。

第三節、結構系絡轉變的影響

加邦支持者所採取的行動，依沙皇政府抉擇之差異，筆者粗略推論可能導致三種對國際體系影響不一的結果：第一種結果，是俄羅斯政府接受加邦支持者的要求，沙俄與日本提早展開和談；第二種結果，是沙俄政府並未接受關於停戰的要求，但是接受了其它要求，成功使事件安然落幕；第三種結果，是沙俄政府未能做出任何足以令加邦支持者滿意的承諾，導致俄羅斯內部中心層級與邊陲層級之間的結構系絡惡化。

第一種結果，可以最大程度使日本獲取利益：讓沙俄在已然不利的戰局上對日本和談，使日本獲得略賽局上的實質勝利，並減少日本進一步的戰爭損失。方法上，是改變沙俄中心層級與日本所共處的互為主體性系統結構，使其自主動遵守層級的霍布斯文化上升至被迫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這是一種基於集體身分所產生的結果，而非純然因物質條件與權力結構而發生。

第二種結果，能為日本帶來的利益最小，但也不至於有害。而加邦支持者所擁有的國家層級行為者地位亦旋即消失。




第三種結果，則會讓日本獲得相對利益：與日本交戰的俄羅斯中心層級，因為與俄羅斯邊陲層級之交惡，導致中心層級與邊陲層級共組的互為主體性結構惡化，集體身分更趨破裂：請願當天，工人高舉十字架與沙皇肖像，高唱宗教詩歌與愛國歌曲，加邦本人並在當天演說中撇清一切與左派反政府人士的關係，以沙皇作為可能合作的對象，抗議民眾與政府軍雙方均無法確定是否會爆發衝突 (Ascher, 2004:157-158)，可見雙方仍共享著主動遵守式的洛克文化，但最終卻步入 1905 年底第一次俄國革命暴發時的因利遵守式霍布斯文化。作為集體身分裂解的影響，中心層級一部分可用於戰爭的權力被邊陲層級奪去，並且必須把另一部分的權力用於與邊陲層級對抗。

事件最後的結局，是上述的第三種情形：原先在冬宮前靜觀其變的冬宮衛兵，因為偶然的擦槍走火而開始射殺請願工人，導致逾千人因軍隊的武力驅離與混亂中的相互踩踏而死亡 (Salisbury, 1981:125)。加邦在混亂中逃離現場並換裝躲避，其後更宣佈革除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教籍、號召工人採取行動反抗當局。在工人階級的想像中，沙皇自此無法再與軍警、官僚劃清界線，民間改以沙皇為代表的國家整體為目標，掀起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部分海軍與國內異民族接續進行的一連串起義與動亂 (Sablinksy, 1976:3-25, 274)，合稱為「第一次俄國革命」，最終迫使尼古拉二世答應民眾部分請求。

該次事件所象徵的身分戰略，就是藉由將新的知識投入既有的互為主體性的系統結構，破壞其集體身分，並促成行為者脫離既有集體身分，連帶從該集體身分中剝離一部分的權力；亦或迫使該集體身分遭同化進而改變行為。此即運用集體系絡機制削弱國家戰略能力的典型作法。

之後俄羅斯十月革命的發生，也涉及此種機制；與俄國交戰的德國將有能力將新共享知識傳播予俄羅斯大眾的列寧從瑞士以封閉式車廂送進俄國境內的芬蘭，並給予列寧資助，促使二月革命後的俄羅斯再一次發生內部分裂 (Fischer,



1964:109–110; Rice, 1990:139)。同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面對身兼哈里發身分的鄂圖曼蘇丹號召對協約國進行聖戰，在西亞陷入不利情勢的狀況下，英國阿拉伯局煽動並支持阿拉伯民族起義（Murphy, 2008），阿拉伯局聯絡官托馬斯·愛德華·羅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並因此聞名，此種戰略亦依循該項機制。冷戰期間，美、蘇之間對第三國的角逐，也可依同理解釋。對目標國家的敵對國而言，將不利於目標國家內部及其同盟集體身分建構的知識投入其間，使得原先較為緊密的互為主體性結構出現裂痕，是戰略工作的關鍵環節。

在戰略賽局中，國家除了對主權國家進行拉攏與挑撥外，經常也會對次國家行為者進行政策操作，這一類作為實際上已類似國際關係結盟、變盟與改變權力平衡等作法。而無論是對主權國家或次國家行為者的拉攏或挑撥，都涉及對國際社會集體身分的擴大或縮減。

值得注意的是，當處於同一結構內部的行為者彼此間發生對抗後，便會出現行為者間脫離國內秩序、回歸無政府狀態的現象，此種結果正符合國內秩序外部對手的戰略目的。

第四節、結構系絡變遷伴隨戰略賽局變換

從九種結構系絡層級的轉換中，可以發現行為者間戰略賽局的變化，在此根據前述 1904 年到 1918 年沙俄與俄國工人階級間的關係，來描述彼此在不同階段所呈現出的賽局情形。

表 4-1 1904 年到 1918 年沙俄與俄國工人階級間賽局

B 沙皇俄國 A 工人階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 B:1)	(A:1,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基於中心層級與邊陲層級間持有權力的不對稱，在初始條件下，沙俄當局在賽局中的任何情況均占據絕對利益。

在 1905 年「血腥星期日」事件發生以前，工人階級選擇隱忍態度，沙俄當局為維持工人階級不再下一論賽局反抗，亦選擇平和的應對政策，雙方選項長久未變，均未選擇衝突選項，故結構系絡得以維持在康德文化的水準。

然而，當工人階級從加邦手中獲得鼓勵衝突的特定社會知識以後，工人階級對過往賽局經驗的看法就改變了，認為抗爭成功能爭取到利益，且壓迫的情形不會發生：工人階級敬愛沙皇，則沙皇不可能鎮壓工人。

表 4-2 血腥星期日前夕俄國工人階級想像中的賽局

B 沙皇俄國 A 工人階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 B:1)	(A:1,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1905 年「血腥星期日」的發生，意味著沙俄當率先選擇了壓迫，導致工人階級的嚴重損失。沙俄當局的選擇，意同向工人階級展示了鎮壓選項可能出現，



而鎮壓選項的出現將導致工人階級利益的最低化。因此，基於這一輪賽局的結果，工人階級在記取教訓後，將於下一輪賽局主動把反抗作為可能選項，雙方由是落入主動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

工人抗爭之初，沙俄政府基於理性選擇，傾向採取壓迫以盡可能維持自身利益。然而，當沙俄當局發現到工人階級的反抗行為將使自身平均利益下降時，沙俄當局便有動機回歸原先互動模式，採取平和政策以換取工人階級放棄反抗，但放棄動武的共享知識已然蕩然無存。在此情況下，雙方進入因利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

然而，當國內環境惡化，工人階級選擇隱忍時的利益下降，賽局則將發生如下變化：

表 4-3 環境惡化後的沙俄與俄國工人階級間賽局

	B 沙皇俄國	平和	壓迫
A 工人階級			
隱忍		(A:2-x, B:3)	(A:0-x, B:4)
反抗		(A:3, B:1)	(A:1,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在上圖中的 x 數值不確定的情形下，工人階級與沙皇當局合作的利益未必比採取反抗並遭到鎮壓來的更低。選擇合作未必具有比較利益，但 x 小於 1 的情形可能存在，工人階級未必足以推翻沙皇當局，以致不敢貿然反抗，雙方仍處於被迫遵守層級的洛克文化。

隨著環境持續惡化， x 值在具體數值不明的情況下逐漸加大，工人基於理性選擇，將變得更具反抗意願，亦更能接受激進的社會革命理論，因此常態性地

採取反抗；而沙皇當局為維持政權生存，必然選擇壓迫政策。在此情境下，雙方結構系絡落入主動遵守層級的霍布斯文化，此即 1905 年革命發生時的情形。

當 x 大於 1 時，選擇反抗恆較選擇隱忍更具利益，衝突情形屬於常態，雙方進入因利遵守層級的霍布斯文化，此即 1917 年二月革命發生時的情形。

當雙方將衝突行進一步內化後，彼此便不再預測對方可能選擇平和選項，由是自身選項便只剩下了對抗一途，利益問題不再重要，雙方於是進入被迫遵守層級的霍布斯文化，此即十月革命到紅白內戰期間的演變。

透過以上描述，結構系絡機制與賽局間的關係漸趨清晰，共享知識在利得計算以外所占有的重要性亦得彰顯。在戰略賽局變化的過程中，除利得以及行為者對預測以外，共享知識也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而作為外國競爭對手，於結構系絡機制中可能的採取的策略，就是在條件滿足時投注特定社會知識，以促使敵人內部結構系絡惡化。故於此可將日本於日俄戰爭期間的煽動行為，描述為由日本在沙俄政府與工人階級之間提供了衝突性的社會知識，促使俄方內部結構系絡從康德文化落入導致內耗的洛克文化；同理，德國將列寧送返俄國境內的行為，也可視為將衝突性社會知識適時嵌入結構內部、進而導致結構惡化的作為。

第五章、芬蘭與波坦金案例：系統過程 與策略實務的賽局應用



系統過程機制與策略實務機制，分別對應到兩種不同類型的賽局互動：前者攸關邊陲層級是否與外國行為者合作反抗中心層級，後者有關邊陲層級的反抗如何影響其它邊陲階級對反抗結果期望值的估量，二者均著重在重複性賽局下的預期心理與未知數問題，因此合併於本章論述。

首先討論系統過程機制：依據溫特提出的兩階段系統過程機制，誘發此機制產生的變項是互賴關係的出現。互賴關係得以建立，行為者各自擁有的價值才可能發生合流，進而建立集體身分，並因集體身分而產生集體利益與集體行為。行為的出現，才可能改變既有的權力分布狀態。

互賴的產生，可能是基於共同利益，也可能是基於共同威脅。但具備安全同盟性質的互賴，勢必不能缺乏「共同他者」——假想敵的存在，因為沒有威脅就沒有安全問題，進而無法達成互賴關係的安全化。

在俄羅斯／蘇聯與外國進行戰略賽局的百年過程中，一直都有發生邊陲層級與敵國產生互賴關係的情形，而這種情形的發生。系統過程在戰略賽局當中的運用，就是透過互賴來產生針對彼此共同對手的合作，並藉由長時間的合作實踐，產生另存在於代價算計以外的集體身分、集體利益，乃至於共同價值的合流，以利反過頭來穩固雙方既有的合作關係。

有別於前章所論述中基於結構系絡機制的戰略運用，著重於描述促使對手陣營內部分裂的過程，而非產生合作關係；系統過程機制的戰略運用，則建立在「對手陣營內部已經存在身分分裂」的情況下，相對於對手國家的邊陲國家或邊陲層級已經有意圖對外尋求合作對象，與我方存在發生互賴關係的條件，

但互賴關係尚未建立。對俄羅斯／蘇聯而言，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於俄羅斯民族與其它被統治民族之間，彼此間潛在的無政府文化本已處於相對低落的水準。

第一節、先於戰略賽局而存在的集體身分 分裂

俄羅斯作為一個歐洲東正教國家，在與本土毗鄰的遼闊國土中，空前地創造出了一個「強幹弱枝」的多重民族具合體，且轄下各群體彼此間的差異都相當巨大。在 1863 年波蘭起義後，沙俄開始發現到國內集體身分建構鬆散所可能造成的威脅，著手進行俄羅斯化，並將俄羅斯化推展到所有非俄羅斯民族的社群（Aspaturian, 1968:143–198）。一如溫特對集體身分形塑過程中系統過程機制的敘述，國內知識的跨國合流雖然有助於集體身分的構建，但同時也會造成個體對自主性恐遭剝奪的恐懼與抗拒。

比較波蘭與芬蘭之間的差異：波蘭對俄羅斯的仇恨遠早於 1863 年，早在波蘭立陶宛聯邦還存在的年代，波蘭和俄羅斯就已經是世仇，波蘭立陶宛曾攻下莫斯科並有效維持一段時間的統治（Tucker, 2010），雙方本來就處於互為主體性的被迫遵守層級霍布斯式無政府文化。即使到波蘭大部分領土均併入俄羅斯以後，這種無政府文化依然潛伏在二者之間，並且指引著波蘭人的利益排序與行為產出。

但芬蘭並非如此。在 1809 年以前，芬蘭是瑞典王國的一部分，芬蘭人民族上雖然不屬於斯堪地那維亞人，但是安於瑞典統治之下、與瑞典人關係親密，可見芬蘭尚未產生強烈的民族身分。1809 年被沙俄併吞後，芬蘭仍與沙俄共享著具一定高度的集體身分，彼此之間至少處於洛克文化：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主動建立了芬蘭大親王國，並允許芬蘭議會的運作，甚至鼓勵芬蘭強化自身主體身分認同，以促使芬蘭人放棄對瑞典的認同（Jutikkala, 1962: 178–179）。芬蘭成

為擁有相當程度自治權的俄羅斯附屬國「芬蘭大親王國」，名義上與沙俄組成共主邦聯，語言、貨幣都維持舊俗，法律甚至也延用瑞典的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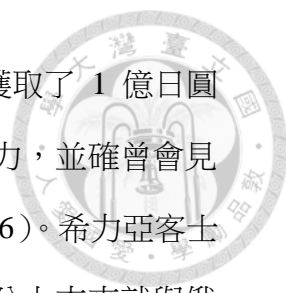
1899年起，俄羅斯化在芬蘭推展，芬蘭擁有自治權的特殊地位被逐步取消，俄語被定為芬蘭的行政管理語言，致使芬蘭人出現強烈的反抗心理（Jutikkala, 1962:183, 185）。沙俄有意抹煞芬蘭的附屬國地位以及身分認同，使得彼此間的洛克文化不復存在，並隨著去俄羅斯化的推展轉向內化程度較低的霍布斯文化。

第二節、共同他者的存在與互賴形成

由上節敘述可見，沙俄中心階層在對身分問題的觀察上出現了誤判，只見異民族在身分上與俄羅斯不同，卻沒見到個別民族與俄羅斯所構成的互為主體性結構不盡相同，一味地對芬蘭人強制傳輸俄羅斯民族內部的知識，卻未重視在系統結構上建立互賴，同時於結構系絡上又塑造出了彼此互為主體性的生存威脅關係。

本節意在瞭解國家運用身分來改變戰略賽局下權力分配的可能性，因此，只要確認國家確有採取行動，且集體身分的重塑確實可改變兩造權力結構，即足以驗證本命題。如欲觀察俄羅斯的邊陲層級是否與外國行為者存在互為主體性的行為互動，就必須瞭解作為俄羅斯國家對手的日本與這些邊陲層級的關係。於此，筆者將進一步探討日俄戰爭期間的俄羅斯的集體身分剝離造成何種影響。

芬蘭與沙俄互為主體性結構的惡化，才為距離遙遠的日本與芬蘭創造了「共同他者」，雙方受到相同行為者的威脅，進而建立起短暫的互賴關係。在日俄戰爭結束後，沙俄對日本威脅性降低，日本人與芬蘭的互賴也由是迅速結束，芬蘭人轉而在日後與德國建立起新的互賴。



在日俄戰爭發生前與進行期間，日本駐俄武官明石元二郎獲取了 1 億日圓的資金，用於推展在歐洲地區的諜報工作並資助反沙皇政權勢力，並確曾會見芬蘭革命黨的柯尼·希力亞客士 (Konni Zilliacus) (Kowner, 2006)。希力亞客士背後所代表的群體，與支持加邦的工人有所不同，芬蘭人是身分上本來就與俄國的中心層級極其疏遠的群體。由於日本對俄開戰的後發行為，使得原先互不相干的雙方產生了「共同他者」，構成可建立互賴關係出現的先決條件。


在系統過程的第二階段中，基於合作可以改變彼此既有身分與利益的特性，雙方的價值還有可能進一步發生合流。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對俄國的好感與學習，二戰時西烏克蘭人與克里米亞韃靼人對參與納粹的熱衷，都可循此邏輯解釋。日本與芬蘭的互賴尚不足以發展到此階段，因此於本案例中不提。

外國與本國邊陲層級基於互賴所建立的聯繫本身，雖然可能增進邊陲層級採取行動的信心，但憑此並無法對戰略賽局下的權力結構造成正面影響，因為忽視成功率切未能與外國協調而獨力採取的冒進行為，反而可能導致邊陲層級所持權力的過早消耗。從俄國數百年來邊陲層級屢次起義均告失敗的經驗可以知道，單靠邊陲層級的力量，難以與壟斷國內秩序中的正規武力與正規機構的中心層級進行抗衡。因此，在合作確立後，雙方還需要維持行為上的協調性，並且由外國將所持有的部分權力轉移給本國的邊陲層級，使本國邊陲層級所持權力的含量達到足以採取行為並獲得成功的地步。

第三節、攸關權力轉讓的戰略賽局

筆者認為，日俄戰爭中日方在歐俄地區採取的行動，與其視為煽動起芬蘭人的反抗意識，不如描述成替互賴條件已然成熟的複數行為者牽起合作關係，使得權力轉移的空間擴大，為日方既有的權力獲得更有戰略效益的配置區段。

日本對俄羅斯邊陲層級所進行最直接的權力挹注，當屬日俄戰爭期間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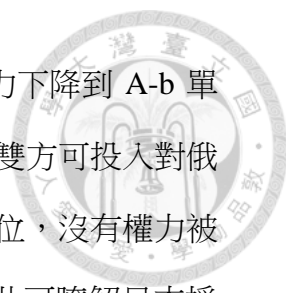


1905 年發生的約翰·葛拉夫頓號蒸氣船 (SS John Grafton) 事件。日方為資助希力亞客士的芬蘭民族主義事業，購買了葛拉夫頓號蒸汽船與 1 萬 5500 把瑞士維塔利步槍、250 萬發子彈、2500 把英軍用高即左輪手槍與多達 3 公噸的炸藥，計劃運往芬蘭反俄阻織的大本營凱米 (Kemi)，途中卻因船隻超載而觸礁，為避免武器落入俄國手中而選擇爆炸自沉 (Futrell, 1963)。

日本此項決策，很顯然是基於自利而與其它行為者進行的合作。日、芬集體行為的產生，就標誌著日、芬間一定程度集體身分與集體利益的存在。而日本資助大量武器的目的，就是為強化芬蘭作為邊陲層級所持有的物質基礎。以芬蘭在 1900 年代不滿 270 萬的人口 (Statistics Finland, 2017) 來說，日本的援助已足以讓芬蘭總人口的 0.5% 獲得良好武裝，構成沙俄在歐洲的一大困擾。對於在戰爭中人力大量耗損且戰線膠著的日本而言，如果葛拉夫頓號的任務達成，當然會為整體戰局帶來相當程度的助益。

然而，發起日俄戰爭的日本自身財力亦當吃緊，為何願意在歐洲耗費巨資購入大量武器與蒸汽船以資助芬蘭獨立組織，實相當耐人尋味。筆者推論，芬蘭遠離戰爭前線，且擁有可從事武裝的大量人口，並擁有配合日本作戰的意願，卻缺乏武器裝備、不能對俄國發起有效的攻擊。因此，芬蘭雖然有潛在兵源，卻不能對日俄戰爭的權力分佈結構造成影響，人口與地理位置優勢形同浪費。倘若可以給予足量的武裝，芬蘭所持有的權力對日本而言就不會形同虛設。

筆者藉助數字進行假設：假定日本擁有的權力是 A 單位，芬蘭所擁有的權力是 b 單位，但芬蘭至少需要擁有 $b+a$ 單位的權力才能對俄國採取有效的攻擊。在日本並未對芬蘭進行權力移轉的情形下，日、芬雙方能投入對俄作戰的權力，只有日本所擁有的 A 單位；芬蘭所持有的 B 單位非但會浪費掉，甚至可能在日後反為俄國所徵用，為日本帶來 -b 單位的權力抵銷。最後，日方能發揮的權力只剩下 $A-b$ 單位。A、B、b 均大於 0，而 B 大於 A，A 大於 b。



在日本對芬蘭進行 a 單位的權力讓渡以後，日本擁有的權力下降到 $A-b$ 單位，芬蘭擁有的權力則達到了足以有效投入作戰的 $b+a$ 單位，雙方可投入對俄作戰的權力總量，因此上升到了 $(A-a)+(b+a)$ 單位，亦即 $A+b$ 單位，沒有權力被浪費，芬蘭與日本所享有的權力加總可完整投入對抗俄國。藉此可瞭解日本援助芬蘭武器的理性決策依據。僅就日、芬雙方在對沙俄戰事中的所持相對利益差距，以賽局模型呈現如表 5-1。

表 5-1 日俄戰爭期間與日本援助芬蘭起義與否的賽局


日本 A \ 芬蘭 b	不資助	資助
不起義／起義失敗	日： $A-b$ ，芬：0	日： $(A-b)-a$ ，芬：0
起義	發生機率低	日： $A-b$ ，芬： $b+a$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系統過程機制在瓦解敵方權力的方法上，重點不在於製造集體身分的裂痕，而在於建立起本國與敵國邊陲層級／敵陣營邊陲國家的集體身分，使彼我所處系統比起彼與敵國中心層級／敵陣營中心國家更為緊密，藉以在互賴、互信且相互協調的系統中進行權力轉移。

日本與芬蘭的合作雖然因為技術上的問題而功敗垂成，卻豎立起了借助身分來改變戰略權力結構的典範：中心層級的錯誤作法，引發其與邊陲層級之間集體身分的破裂，並扮演了邊陲層級與敵國之「共同他者」，創造了雙方互賴的基礎。

在日俄戰爭結束後，日、俄為確保各自在滿州的利益，雙方關係轉入洛克式的無政府文化，共同他者角色的轉弱，使日本與芬蘭之間失去了互賴基礎，



芬蘭的獨立運動暫時沉寂了下來，希力亞客士也被迫逃離芬蘭。但在日後的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都依循系統過程的機制，試圖與占領區或俄控區的民族建立基於互賴的合作關係，如：德意志第二帝國對俄國 1917 年革命後烏克蘭國的扶持（Yekelchyk, 2007），第三帝國與占領區下烏克蘭人（Gregorovich, 1995）以及克里米亞韃靼人（Nekrich, 1979:26）的合作，甚至將傘兵投送到蘇軍戰線後方的高加索地區，欲與高加索的穆斯林民族合作（Dunlop, 1998）。

循此邏輯，筆者認為 DAESH（或稱 IS、伊斯蘭國）對全球穆斯林進行號召的做法，也涉及這種與外國邊陲層級建立合作關係的作法。對於絕大多數穆斯林而言，DAESH 與其並不存有互賴關係，單憑極其有限的共享知識並不足以建立雙方合作關係；雙方共享知識之所以有限，是因為 DAESH 的反人道行為對多數穆斯林而言違反了《可蘭經》的要求，但 DAESH 成員自認一切作為均合乎《可蘭經》，由此顯見雙方在共享知識上的貧弱。但在非穆斯林國家生活、在社經地位上處於弱勢的穆斯林群體，便與 DAESH 存有互賴關係，因為雙方均對非穆斯林國家存在較深的敵視。在雙方取得聯繫並建立合作關係後，DAESH 透過系統過程機制第二階段的價值合流，使非穆斯林國家與之建立合作關係的穆斯林接受 DAESH 的價值，此時雙方才出現共享知識。

第四節、中心層級權力耗弱與賽局變化

至於策略實務機制，筆者則欲以 1905 年俄國黑海艦隊波坦金號軍艦（Battleship Potemkin）帶有左派色彩的譁變作為檢視案例。相較於芬蘭與日本合作的案例，波坦金事件側重於邊陲與邊陲之間的行為學習，對手國是否直接與本國邊陲建立合作並不重要。第一個面臨是否對抗中心層級問題的邊陲行為者，必須面臨嚴峻的賽局考量，一如第三章第三節對巴爾幹半島國家的描述。在國家承平且富足的時期，由於中心層級在物質基礎與國家機構上所占據的絕



對優勢，邊陲層級的反抗無力且無用，冒然反抗反而會在失敗後遭到更嚴厲的報復。賽局中的數值呈現如表 5-2。

表 5-2 中心層級與邊陲層級間賽局

B 中心層級 A 邊陲層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 B:1)	(A:1,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如過去幾章的論述，筆者假定身分的分裂可以造成權力的剝離。該推論立基於身分的分裂可以使服膺於固有身分的人類減少，個別人類又將附加於其身的少許經濟、暴力、機構等戰略能力從國家整體行為當中抽離。但溫特曾說，集體身分可以因權力的強迫而維繫，因此當中心與邊陲雙方權力差距太懸殊時，集體身分的剝離就會減緩甚至推遲。

然而，在兩種條件任一點滿足的情況下，都可能讓邊陲層級變得敢於採取行動對抗中心層級：第一種情況，是當中心層級權力耗弱時；第二種情況，是其它邊陲行為者率先採取了對抗作為時。1915 年 6 月下旬波坦金號軍艦的叛變，便是在兩種條件都存在的情形下發生。而這兩種條件的產生，與人類歷史的推演有關係，將於以下各節做出論述。

從權力面來說，當國家中心層級對物質基礎與國家機構的控制力被削弱時，原先極端不利於邊陲層級採取反抗行為的賽局，就會發生變化，使得採取反抗所需付出的代價降低，反抗成功的可能性增加 x ，如表 5-3 所示。



表 5-3 中心層級實力被削弱後的賽局

B 中心層級 A 邊陲層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x, B:1)	(A:1+x,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在這種情況下，邊陲層級採取對抗的意願將提升；如果存在與邊陲層級存在互賴關係的外國行為者，彼此達成合作的意願也將提升。

波坦金號的叛變的背景之一，正於此有關。為支援日俄戰爭並營救受困旅順港內的太平洋艦隊，沙俄以波羅的海艦隊為主力拼湊出第二太平洋艦隊，並且將黑海艦隊當中最具經驗的官兵編入新組成的第二太平洋艦隊，奔赴遠東投入對日作戰。

在艦艇新舊不一且經歷跨越好望角的長途航程後，疲憊且協調性不良的第二太平洋艦隊在 1905 年 5 月 28 日的對馬海峽海戰中遭日本聯合艦隊幾乎全殲。與已經在旅順要塞被摧毀的太平洋艦隊相加，俄羅斯海軍艦隊已有三分之二力量遭日軍摧毀，俄國海軍僅存因條約限制無法駛出達達尼爾海峽的黑海艦隊。消息傳回俄國後，因第二太平洋艦隊覆滅而精銳盡失的黑海艦隊，士氣遭受嚴重打擊；加上逾一個月來伙食的惡化，各艦艦上情況極其不穩，任何小衝突都可能導致譁變。復受進行中的第一次俄國革命影響，參與海軍內部社會民主主義中央委員會「岑特拉爾卡 (Tsentralka)」、接觸過馬克斯主義的黑海艦隊波坦金號軍艦上的士官阿法納西·馬圖申科 (Afanasy N. Matushenko) 等人，遂在 6 月 21 日發起叛變並殺害波坦金號艦長 (Bascomb, 2007:)。

波坦金號想策動黑海艦隊的其它船艦加入叛亂，然在海面上幾經接洽後均



未如願。幾度來回於克里米亞半島與羅馬尼亞康士坦察以後，羅馬尼亞人終於譁變官兵交出軍艦的條件下接受波坦金號船員上岸。事後，波坦金號被俄國索回。這件事情在蘇聯成立後的 1925 年，被拍成宣傳革命的經典黑白電影《戰艦波坦金》。而在波坦金號叛變後的同年 11 月，黑海艦隊又發生了塞瓦斯托波爾起義，並糾集了多達 8200 名的官兵參與叛亂，最終遭到沙俄政府軍擊敗（Bascomb, 2007）。

雖然日本國內相信波坦金號叛亂的發生與日本的暗中策動有關，但除欠缺具體證據以外，在與對馬海峽海戰的噩耗和物資的匱乏相比下，日本是否參與策動的重要性並不顯著。海戰的結果與物質的匱乏，重創了海軍對國家中心層級的信心，造成中心層級隊海軍的約束能力嚴重下滑，使得發起叛變可能面臨的阻力與報復減少，讓叛變選項在賽局中的期望值上升，最終進入對行為者而言屬於理性行為的範疇內。換言之，日本在對馬海峽海戰此一與敵後工作無關的作為上，間接促成了俄國邊陲層級叛亂的發生。

俄國 1917 年革命時，各民族趁著俄羅斯中心層級混亂之際，紛紛宣佈脫離俄羅斯統治，並維持了時間長短不一的獨立。蘇聯於 1991 年發生由葉爾欽領導的政變時，也發生了大量加盟自治共和國的獨立。除俄羅斯與蘇聯以外，一戰時的德意志帝國也曾因瀕臨戰敗時的海軍譁變而垮臺（Habeck et al., 2008）。這些事件都可以依此策略進行解釋。

循以上邏輯，筆者認為在 1760 年代發生工業革命與 1770 年代浪漫主義思維興起以後（Drabble, 2009:1），邊陲層級在戰時獲戰略對峙中發起叛變的可能性也隨之提升。工業革命使武器殺傷力不斷提高，導致戰爭與備戰的成本大幅提高。而浪漫主義引發的個人意識抬頭與國族主義成形，讓戰爭的參與者在法國大革命以後從以雇傭軍為主逐漸轉變成以大量的常備軍為主；一來，常備軍加大了戰爭的破壞力，二來，常備軍的徵召會剝奪可用於經濟生產的人口，使

進行戰爭的成本大幅提高。

然而，邊陲層級難以去衡量中心層級權力耗弱的真實情形，需要仰賴他者提供參考與學習的依據，因此尚須進入到下節深入溫特策略實務機制的討論。



第五節、邊陲與邊陲間的學習與教導

溫特認為，在策略實務機制下，行為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將維持並投射其自我身分的「圖像」，教導其他行為者進行類似的互動，並且使其彼此間共享一種「我群（we）」的想像，令彼此被涵蓋在相同的規範之中。

據此推論，當第一個邊陲層級反叛時，同一個國內秩序底下的其他邊陲層級有可能接收到第一個反叛的身分圖像，並產生模仿其與中心層級互動行為（即反抗行為）的傾向，進而與第一個反叛者產生出我群想像。

當波坦金號起事時，俄羅斯已經發生多起叛亂事件。表 5-4 列出自「血腥星期日」至波坦金號叛變之間，俄國境內各項重大暴亂的發生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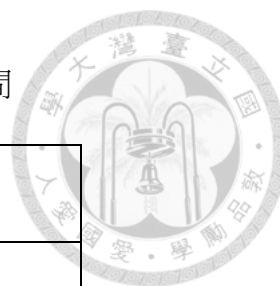


表 5-4 沙俄 1905 年上半葉國內騷亂事件發生時間

騷亂事件	時間
波蘭工人與學生革命	1905 年 1 月
芬蘭與波羅的海諸省工人罷工	1905 年 1 月
烏拉爾工人罷工	1905 年 2 月
高加索工人罷工	1905 年 3 月
俄羅斯農民起義	1905 年 6 月

資料來源：Blobsaum Robert, and Feliks Dzierzynski, the SDKPiL, 1984.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Polish Communism*,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23. & Voline, 2004. “Chapter 2: The Birth of the ‘Soviets’” *Unknown Revolution*, Portland: Black Rose Books.

以血腥星期日為時間劃界，1904 年比較有規模的暴動，僅只有 12 月份聖彼得堡普奇洛夫工廠（Putilov plant）的罷工事件；與 1905 年上半年相比，發生頻率與密度相差甚遠。此外，1905 年的歷次暴亂與起義，在成員與地域上缺乏時序上的連續性，性質上偏屬各自獨立的事件。在波坦金號叛變以前，並未出現軍人發起叛亂的先例，鄰近的克里米亞與赫爾松地區也沒有發生暴亂，更顯現此次事件之於前列事件的獨立性。由此可見，1905 年上半年歷次暴亂的發生，都仰賴各自獨立的邊陲層級做出獨立的判斷。

為應對各地革命情勢，尚處於日俄戰爭中的俄羅斯政府雖然反應迅速、進行一系列的調查，並在政治權力、宗教、語言、土地等問題上做出些許讓步與改革，但同時也採取血腥鎮壓，在 1905 年 1 月底時曾在波蘭與里加造成嚴重死



傷。惟整體來看，截至 1905 年 6 月以前，邊陲層級一連串的反抗行為帶來的損益差距並不是非常顯著。而從波坦金號的叛變成果來看，黑海艦隊各艦對參與叛變的意願相當低，以致最終只有波坦金號獨自叛逃，當下亦未達到任何政治成果，單對波坦金號而言顯然是一場失敗的賽局。但是繼波坦金號創下先例後，當年俄羅斯海軍卻接連發生了塞瓦斯托波爾起義、海參崴起義與克隆斯塔起義。

從以上觀察可發現，前一行為者所率先採取的叛亂行為，似乎可以讓後一行為者對在賽局中採取叛亂的結果變的樂觀。在此試以賽局解釋此種心理。

在作為中心層級的沙皇政權與作為邊陲層級俄羅斯各群體之間，由於權力上的絕對差距，構成的是對邊陲層級極端不利的賽局模式，筆者以表 5-2 為原形作成表 5-5。

表 5-5 沙皇政權與國內各群體間的賽局

B 沙皇政權 A 俄國邊陲層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 B:1)	(A:1,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如先前所述，當 A 選擇隱忍時，為防止 A 於下一輪賽局選擇反抗，B 理應傾向選擇採取平和態度，以教導 A 保持隱忍。而當 A 選擇反抗時，無論 B 基於相對利得或絕對利得考量，亦或為嚇阻 A 再次反抗，B 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勢將選擇壓迫。預期到 B 的反應，A 隱忍的利得是 2，反抗的利得是 1，故 A 沒有選擇反抗的理由。

血腥星期日作為官僚於執行層面導致的突發意外，使得作為 A 的請願工人認為自身在維持隱忍時，仍遭受到 B 的壓迫，進而使 A 形成「B 必然採取壓迫」



的認知。在隱忍與反抗間的比較下，A 於是選擇了反抗。此即所謂「官逼民反」。

然而，當同一秩序底下的另一邊陲層級行為者 C 率先發起反抗，為合理解釋 C 的行為，A 會對 B 的能力重新衡量：

表 5-6 俄國 1905 年革命爆發後囚徒賽局

B 沙皇政權 A 俄國邊陲層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x, B:1)	(A:1+x,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x 為 B 因權力下降而導致 A 從事反抗時的損失減少，進而導致的利得增加。只要 A 認為 x 在 1 之上，無論基於相對利得或絕對利得，A 進而判定 C 的行為合乎理性，並對 C 學習。但 A 很有可能對 x 產生誤判。當 x 等於 1 時，C 並沒有因為反抗行為獲得比隱忍更多的利得，但已足以向其它邊陲行為者昭示反抗的可行性。如果 C 有與外國 D 達成合作，A 也可能會學習 C 在賽局中與 D 合作的抉擇。

1905 年上半年的革命，即處此種情形下所發生的學習行為。筆者以為，波坦金號雖然在政治目標上失敗，叛變者卻沒遭到其它船艦的強力鎮壓，並且平安逃入羅馬尼亞，此舉便揭示了叛變的可行性。因此，波坦金號事件本身也對俄羅斯海軍的其它行為者起了示範效應，使得同年下半年又再發生塞瓦斯托波爾起義、海參崴起義與克隆斯塔起義。同樣地，在 1917 年為德國所間接促成的俄國十月革命，竟諷刺地反過頭對德國的十一月革命產生啟發性效果 (Volkogonov, 1994)，亦可循此機制解釋。

第六節、我群的瓦解



俄國 1917 年革命與蘇聯解體後，許多國內邊陲行為者在短時間內紛告叛離的現象，均可藉由上述機制來解釋。其它重要事例尚有：19 世紀上半葉接連發生的拉丁美洲各地獨立運動；1912 年的辛亥革命後，大清南方各漢人省分紛紛電告獨立；1916 年至 1918 年因英國誘發而接連產生的阿拉伯民族大起義，致使鄂圖曼帝國瓦解。此即所謂「骨牌效應」在策略實務機制上的原理，並導致「我群」的瓦解。

以賽局角度解釋策略實務機制用於集體身分解構，係藉由改變行為者對賽局中未知數的估量，促使行為者對「原先以為不可行的選項」進行重新考慮，進而產生出原先無以存在的身分認知，瓦解掉既有的集體認知。賽局上的策略考量，讓新的身分得產生，也讓既有的身分得以被嘗試實踐，而實踐的結果便導致權力結構的改變。

第六章、結語：身分作為戰略重心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瞭解到集體身分在戰略賽局中可能扮演著何種角色，為有關集體身分的想像增添幾分可能性。本研究是基於歷史經驗的討論，尤其是針對「身分對戰略而言開始變得重要」的時期進行時空條件上的還原與推演。此類經驗可展現出集體身分如何在國際衝突的過程中發揮賽局功能，以及集體身分何以能夠作為「戰略工具」乃至於「戰略能力指標」運用於實務上。

第一節、身分形塑與戰略賽局的關聯

三種機制在戰略賽局上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出不同的功能。

結構系絡機制著重在對重複性戰略賽局的觀察。共享知識的變化直接影響行為者對前一輪賽局的詮釋，並藉此對當前面臨的賽局改變策略，一方先發的策略連帶改變了對方的回應方式，新的互動模式由是產生，並經由內化而催生出新的無政府文化階段。

系統過程機制對戰略賽局的影響，主要是藉助「互賴」關係的內化，促使行為者高估冒進行為的成功機率，進而開啟邊陲層級與它國間的合作賽局。在此基礎上，系統過程機制亦得以解釋：成功率缺乏保證的冒險性利他行為，為何會被國家所選擇。系統過程機制的解釋力側重在「響應他者攻擊行為」上。

策略實務機制對戰略賽局的影響，主要是在參考其它行為者所進行的賽局後，改變行為者對各選項損益情形的預測，讓行為者下修原本可能過於高估的選項代價，進而鼓勵行為者選擇原先整體期望值較低、但成功後利得較高的選項。在行為者間類似行為的模仿與教導下，遂動搖原先穩固的集體身分。策略實務機制的解釋力側重在「下修對抗行為預計代價」上。

第二節、集體身分與戰略能力的掛鉤

三種集體身分塑機制對戰略賽局的影響，不外是藉由集體身分的改變來影響系統內部的權力分布、並唆使行為者改變使用權力的方式，簡言之即對「離間」、「結盟」與「變盟」做出建構主義式解釋。結盟、變盟會直接改變對弈兩造的權力平衡，這是現實主義傳統長久以來所肯認的，前述只是以社會建構理論來對其重新詮釋，並無太大疑義。有待探討的問題在於「行為者」身上：何以證明集體身分的心理層面剝離即足以同時使國家的權力剝離，甚至創造出可以運用權力的新行為者？其所控有的權力含量，又能為整體對弈局勢帶來多大影響？

筆者在此重提並借用布山的國家模型。決定國家存在與整合程度的三大要項，包含國家概念、國家機構與物質基礎。布山明言，三項要素之中只要有其中一項貧弱或欠缺，國家就不復存在；換言之，此三要素均明顯存在的群體，實際上就具有國家的特質（Buzan, 1991:65, 70, 82）。

依據布山的思考框架，身分確實會影響國家整體力量的強弱。而集體身分（布山所指的「國家概念」）與權力（布山所指的「物質基礎」，如人民、領土與資源等）間的關聯性為何，筆者基於布山國家模型的思考產生以下推論：在表示國家強弱的三角形當中，倘若代表集體身分的「國家概念」此一向量過於貧弱甚至消失，據布山所言，國家便會弱化或消失，亦即令「國家機構」與「物質基礎」層面雖有而無以發揮；換句話說，集體身分的減少或喪失，將連帶使國家權力無效化。循此邏輯，集體身分與行為者權力的正關聯性便得以浮現。

在此可以任舉數個刻板印象中普遍被認為內部集體身分極弱的國家為例，來驗證以上論述之正確性：南蘇丹、賽浦勒斯與南斯拉夫等三個國家，均於內部缺乏可為全體國民所普遍接受之國族身分：南蘇丹深陷於種族衝突；賽浦勒



斯境內民眾只對希臘裔與土耳其裔此二身分具較強認同，欠缺對整體國家之身分認同；南斯拉夫身分狀況更為繁複，內部各族裔基於語言、文化與經濟資源分配等項目上的異質性，形成各自獨立的集體身分，最終導致接受「南斯拉夫」此一身分的群體僅剩下塞爾維亞族。

從上述國家因民族問題而致使整合度低落的案例，可發現一事實：國家社會集體身分的瓦解，意即邊陲層級不再與中心層級共享集體身分；此種身分分裂的情況，將連帶使國家的中心層級喪失對邊陲層級的控制能力。首先會因集體身分裂解而失去控制的，就是擁有身分且行為受身分所影響的「人類」，而人類正是物質基之一，可見身分的裂解將連帶使國家既有的物質基礎發生裂解；而機構又是以人類為管理對象，為人類所操控與創造，因此人群的失去自然將導致機構的削弱與消失。至此，在布山三角形的國家模型當中，國家概念／集體身分的裂解與喪失，將直接導致物質基礎的流失，而物質基礎的流失又將使國家機構隨之流失，此一關聯性於邏輯上可證。

在瞭解國家所擁有之結構與物質會隨身分的分裂而分裂後，便可討論到結構與物質在脫離國家而分裂、脫離後將何去何從。分裂自國家的身分在兼取若干結構與物質以後，便成為兼具布山國家模型中作為「國家」的三種要素的一個群體，即使該群體未必被看待為國家。由此來看，在南斯拉夫內戰就是複數個兼具國家三要素的群體於系統內進行瓦解社會集體身分的抗爭。

欲構成此類非國家群體，群體持有武力此一條件並非必要，最明顯的案例即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甘地背後所象徵的印度身分，其所涵蓋人群並不具備顯著的武裝特質，也沒有運用武力的充分意圖，但該集體身分兼有為甘地所指揮的低程度機構，並掌握了經濟上的物質基礎。這群尚未脫離大英帝國的「大量印度人」——不是作為國家的印度，甚至連作為整體地區的印度都稱不上，因為印度身分並未遍及生活在各土邦、持有各種信仰的居民間——卻在三項國家要素

上都持有一定含量，其所持含量甚至不遜色於當時某些已經存在的個別國家。

至此，非但可清楚掌握操作集體身分對於改變國家權力的有效性，並能瞭解到自原國家分裂出的身分將同時兼帶多寡不一的制度機構與物質基礎，並可成為能動性大或小的行為者，參與到國家間的政治互動中。

第三節、身分作為戰略的核心考量

溫特（1994:389）將國家間的衝突也視為一種互為集體性的現象，意旨雙方在特定結構中共同獲得了互為敵人的身分。換句話說，若沒有取得此種身分，行為者就不會把自身目標利益設定在敵人的既得利益上，也不會運用自身擁有的權力去打擊對方、主動製造出衝突與戰爭行為。據此觀點，社會集體身分對於戰略而言便產生意義。

克勞賽維茲認為：戰爭的目的是以軍事力量迫使敵方屈服於我方意志，進而使我方獲取利益。以前述觀點來看待這句話的語意，克勞賽維茲此句的主詞「我方」與受詞「敵方」，就是無政府文化底下的兩個行為者；「軍事力量」是一種行為者所擁有的權力；「迫使敵人屈服」是行為者所採取的行為；「我方意志」實際上就是行為者所設定的利益。於此語境中，如果所謂「我方」目標如克勞賽維茲所述「迫使敵方屈服於我方意志」，則「敵方」阻止「我方」達成目標的辦法便易於理解：一是削減我方可用於採取行為（使敵方屈服於我方意志）的權力（軍事力量）；二是使我方改變自身「身分（是敵方為敵對者）」，進而連帶改變「利益（獲取敵方既得利益）」與「行為（使敵方屈服於我方意志）」。

筆者以為，如果國家是類似於「分子」的存在，那麼「敵方」所能採取阻止「我方」達成目標的兩種管道，就有可能交織在一起。如果「敵方」可以成功使「我方」底下的邊陲層級產生了與中心層級不同的集體身分，而此種集體身分的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並不支持戰爭行為，便有可能連帶使我方喪失可用



於進行戰爭的權力，甚至因系統內權力分配狀況的改變而使我方身分發生改變；或者，「敵方」爭取的對象是除彼我以外的第三行為者，「敵方」使第三行為者產生了與敵方共享的社會集體身分，使得挾帶一定權力的第三行為者改變了敵對系統中的權力分配，亦將致使我方身分因對戰爭代價的重新估量而發生改變，導致戰爭停止。

惟既然集體身分在戰略上能扮演重要角色，那麼單以克里米亞戰爭與日俄戰爭相比，為何集體身分於前者無足輕重、於後者卻能發揮不容輕忽作用？筆者在此重提出淺見：在 1770 年代浪漫主義與工業革命並肩興起以前 (Drabble, 2009:1)，國家中心層級所享有的社會知識，並未與國家疆域內處於邊陲層級的大部分人類所共享。借用馬斯洛的需求滿足理論，人類在生理與安全需求未獲保障的情形下，屬於愛與歸屬層級的國家身分並不重要，因此中低階層群眾的國家身分暨模糊且微弱，即使被壓迫，多數人感受到的也是對個人生理的壓迫，而非對集體身分的壓迫。於國家層次而言，筆者或可以「身分真空」一詞形容該現象。

生理的壓迫對壟斷資源的中心層級而言易於解決，集體身分的壓迫則無以根治。1770 年代以後，歐洲國家逐漸轉變為具有現代國族主義特徵的新型態國家，但居住在亞、非等地舊形態國家的人類亦仍處於此種不受國家集體身分所繫縻的狀態。故理論上，在浪漫主義興起以前，結構系絡機制得以發揮作用的空間十分有限，身分對戰略造成的影響也不比今日程度。沙俄在 1890 年代前後快速工業化，底層農民工感受到的只是個人生理遭受壓迫，如果沒有同一時期逐漸從西歐滲入俄羅斯的各種社會理論充當「觸媒」、為結構系絡提供新的共享知識，集體身分問題便不足以衍生為沙俄的巨大隱憂、甚至發生內憂勾結外患的情形。

總結本文，筆者相信集體身分的變化足以改變賽局中的戰略能力，並且在

系統內的「身分真空」獲得充分填補的情形下，得以成為功效良好的戰略利器。
若以此種觀點看待國際戰略環境，筆者相信集體身分或能被視為探討各項戰略
問題的核心命題之一。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 石之瑜，2000，〈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7 期，37-53。
- 石之瑜，2001，〈作為藝術的政治學——兼評建構主義的科學立場〉，社會建構學派專集，《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293-310。
- 封永平，2009，《大國崛起困境的超越：認同建構與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秦亞青，1999，《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秦亞青，2001。〈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社會建構學派專集，《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231-264。
- 袁易，2001，〈對於 Alexander Wendt 有關國家身分與利益分析之批判：以國際防擴散建制為例〉，社會建構學派專集，《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265-291。
- 康紹邦、宮力，2010，《國際戰略新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莫大華，2003，《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臺北：時英出版社。
- 許如亨，1999，《解構另類戰爭——心理戰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台北：大眾。
- 陳牧民，2008，〈當代國際安全理論中的主權意涵〉，《全球政治評論》，第 22 期，107-126。
- 黃旻華，2000，〈評『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71-94。
- 鄭瑞耀，2001，〈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評析〉，社會建構學派專集，《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199-229。

貳、西文部分



-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1974.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with the Spanish Republic, 1936–1939*, Moscow: Progress.
- Alexander, John T., 1969. *Autocratic Politics in a National Crisis; 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 and Pugachev's Revolt, 1773–1775*, Bloomington: Indiana.
- Arnold, Guy, 2002.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rimean War*,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 Ascher, Abraham, 2004. *The Revolution of 1905: A Short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spaturian, Vernon V., 1968. "The Non–Russian Peoples", in Allen Kassof ed., *Prospects for Soviet Society*,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y Pall Mall P.
- Bascomb, Neal, 2007. *Red Mutiny: Eleven Fateful Days on the Battleship Potemk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BBC News, 2011. "The people with the reddest hair in the world", November 11.
- Bell, Christopher M., 1997.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British and American Naval Strategies for an Anglo–American War, 1918–193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 (4): 789–808.
- Bideleux, Robert, and Ian Jeffries, 1998.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 Hove: Psychology Press.
- Bisaha, Nancy, 2004. *Creating East and West: 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the Ottoman Tu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lobaum Robert, and Feliks Dzierzynski, the SDKPiL, 1984. *A Study of the Origins*



- of Polish Communism*,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 Blum, Jerome, 1978. *The End of the Old Order in Rural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adley, John, 1990. *The Czechoslovak Legion in Russia 1914–1920*, Boulder: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 Brewer, David, 2001.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from Ottoman oppress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Greek nation*, Woodstock, NY: Overlook Press.
- Bukowczyk, John J. et al., 2005. *Permeable Border: The Great Lakes Region as Transnational Region, 1650–1990*,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Busch, Noel F., 1969. *The Emperor's Sword: Japan vs. Russia in the Battle of Tsushima*, New York: Funk & Wagnail.
- Buzan, Barry, 1991.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65, 70, 82.
- Buzan, Barry, and Ole Wæver, 2003. *Region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2000.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nnon, John A., 2002. "Serfdom." In John Cannon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British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sen, Eric, 1997. *The Northern Crusades*, London: Penguin Books.
- Connaughton, R. M., 1988. *The War of the Rising Sun and the Tumbling Bea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5*, London: Cassell.
- Corrin, Chris, and Terry Feihn, 2015. *AQA A–level History Tsarist and Communist Russia: 1855–1964*,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Curtiss, John Shelton, 1957. *Russian revolutions of 1917*,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Daily Herald, 1914. "A Garibaldi Letter: Italy's Debt to England", December 30.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Daily Herald (Adelaide, SA: 1910–1924) 30
December 1914. Retrieved June 5, 2017. In
<http://nla.gov.au/nla.news-article105477655>

Datosmacro.com, 2017. "PIB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Retrieved June 5,
2017. In <http://www.datosmacro.com/pib/espana-comunidades-autonom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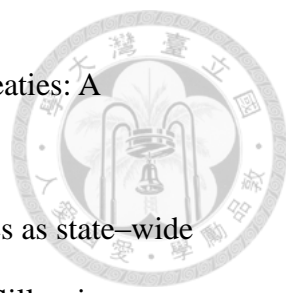
Drabble, Margaret, 2009.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race–Francis, Alex, 2005. *The Making of Modern Romanian Culture*, London: I.B.
Tauris.

Dunlop, John B., 1998. *Russia Confronts Chechnya: Roots of a Separatist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ursma, Jorri C., 1996. *Fragment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icro–states: Self–determination and Stateh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ybaś, Bogusław, 2006. "Livland und Polen-Litauen nach dem Frieden von Oliva
(1660)" ("Livonia and Poland-Lithuania after the peace of Oliva (1660)"). In
Willoweit, Dietmar; Lemberg, Hans. *Reiche und Territorien in Ostmitteleuropa.
Historische Beziehungen und politische Herrschaftslegitimation. Völker,
Staaten und Kulturen in Ostmitteleuropa (Rich and territories in eastern
Central Europe. Historic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sovereignty. Peoples, states
and culture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2., Munich: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 
- Elleman, Bruce A., 1999. The 1907–1916 Russo–Japanese Secret Treaties: A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 Field, Bonnie N., 2015. "The evolution of sub–state nationalist parties as state–wide parliamentary actors: CiU and the PNV in Spain." In Richard Gillespie, Caroline Gray. *Contesting Spain? The Dynamics of Nationalist Movements in Catalonia and the Basque Country*, London: Routledge.
- Fischer, Louis, 1964. *The Life of Leni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Fitzpatrick, Sheila, 2008.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aser, David, 2000. *Frederick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London: Allen Lane.
- Futrell, Michael, 1963. *Northern Underground: Episodes of Russian Revolutionary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through Scandinavia and Finland 1863–1917*,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Galtung, John, 1980. "The War System." *The True World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aspar, David B., and David P. Geggus, 1997. *A Turbulent tim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Greater Caribbea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orskij, A. A., Naučnoe izd. eds., 2000. *Москва и Орда (Moscow and the Horde)*, Moscow: Nauka, 187.
- Gouttman, A., 1995. *La Guerre de Crimée 1853–1856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aris: S. P. M.
- Gregorovich, Andrew, 1995. *The Ukrainian Experience in World War II With a Brief Survey of Ukraine's Population Loss of 10 Million*, New York: Forum.
- Grigory, Margrit N., 1991. "San Marino." In Richard F. Staar and Margrit N. Grigory eds.,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Guibernau, Montserrat, 2004. *Catalan Nationalism: Francoism, Transition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 Habeck, Robert, and Andrea Paluch, Frank Trende, 2008. *1918 – Revolution in Kiel Gebundene Ausgabe*, Heide, Germany: Boyens Buchverlag.
- Hadar, Oren, 1990. "The Choson Dynasty." In Andrea Matles Savada. *South Korea: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GPO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Harcave, Sidney, 1970.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Collier Books.
- Heide, Rachel Lea, 2004. "Allies in Complicity: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Clayton Knight Committee's Clandestine Recruiting of Americans for the Royal Canadian Air Force, 1940–1942."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Vol. 15.
- Hentea, Călin, 2007. *Brief Romanian Military History*,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 Hildermeier, M., 1978. *Die Sozialrevolutionäre Partei Russlands (The 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 of Russia)*, Cologne: Böhlau Verlag.
-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Jelavich, 1977,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lkan National States: 1804–192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Jensen, Richard, 2004. "Nationalism and Civic Duty in Wartime: Comparing World Wars in Canada and America." *Canadian Issues / Thèmes Canadiens*, 6–10.
- Jutikkala, Eino, and Kauko Pirinen, 1962. *A History of Finla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Washington: Praeger Publishers.
- Kanter, A., 1970.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in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 Roll Cal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s* 2.
- Kantowicz, Edward R., 1975. *Polish–American politics in Chicago, 1888–1940*,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J., 1996.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egan, John, 2000.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Vintage.
- Kim, Byung-Ryul, 2006. *Ilbon Gunbu'ui Dokdo Chim Talsa (The Plunder of Dokdo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Seoul: Dadamedia.
- Kowner, Rotem, 2006.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Lanham, MD: The Scarecrow Press.
- Kozelsky, Mara, 2012. "The Crimean War, 1853–56."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3.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apid, Yosef, and Friedrich V. Kratochwil, eds., 1996.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Long, Bronson, 2015. *No Easy Occupation: French Control of the German Saar, 1944–1957* (First ed.),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 Lukowski, Jerzy, and Hubert Zawadzki, 2001. *A Concise History of Po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mpkin, John J., 2006, November 11. "Maktab al-Khidamat", [Globalsecurity.org](http://www.globalsecurity.org). Retrieved April 11, 2017. In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security/profiles/maktab_al-khidamat.htm
- Mackie, Richard Somerset, 1997. *Trading Beyond the Mountains: The British Fur Trade on the Pacific 1793–1843*,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Magocsi, Paul R., and Ivan Ivanovich Pop, 2002. *Encyclopedia of Rusyn History and Cul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agocsi, Paul Robert, 2007. *A History of Ukrain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allory, J. P., and Douglas Q. Adams, 1997.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Mango, Cyril A., 1980. *Byzantium, the Empire of New Rom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Mar–Molinero, Clare, and Angel Smith, 1996.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 in the Iberian Peninsula: Competing and Conflicting Identitie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Marr, Andrew, 2013. *The Battle for Scotl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853–1854.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1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855–1856.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1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cCray, Thomas, 2006.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cations.

McGregor, Andrew James, 2006.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the Ottoman Conquest to the Ramadan War*.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McNeil Earle, Karl, 1998. "Cousins of a Kind: The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 28 (4): 387–411.

Mitchell, Thomas John, and G. M. Smith, 1931. *Casualties and Medical Statistics of the Great War.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Based on Official Documents by Direction of 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 London: HMSO. 6. Morison, W. A., 1942. *The Revolt of the Serbs Against the Turks: (1804–18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rphy, David, 2008. *The Arab Revolt 1916–18 Lawrence Sets Arabia Ablaze*, London: Osprey.
- Nekrich, Aleksandr, George Saunders trans., 1979. *The Punished Peoples: The Deportation and Fate of Soviet Minorities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W.W. Norton, 26.
- O'Connor, Kevin, 2003. *The History of the Baltic State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 Perras, Galen Roger, 1998. *Franklin Roosevel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anadian–American Security Alliance, 1933–1945*, Westport: Praeger.
- Perrie, Maureen, 1972. "The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of 1905–1907: Its Social Composition and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Past and Present*.
- Phillips, Walter Alison, 1911. "Alexander I." In Hugh Chisholm,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 (11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Queruel, Alain, 2012. *Les Francs-Maçons de l'Expédition d'Égypte (The Freemasons of the Egyptian Expedition)*, Lyon: Editions du Cosmogone.
- Rappaport, Helen, 2010. *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 Tragedy at Ekaterinburg*,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 Rembowski, Aleksander, 1896. "Konfederacja Generalna i pospolite ruszenie w roku 1812" ("The General Confederation and Levee en Masse in 1812"), vol. 1–2. Biblioteka Warszawska (The Warsaw Library).
- Rice, Christopher, 1990. *Lenin: Portrait of a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y*. London: Cassell.
- Roessel, David, 2001. *In Byron's Shadow: Modern Greece in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Imagin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iz, Teofilo F., 2007. *Spain's Centuries of Crisis: 1300–1474*,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Sablinsky, Walter, 1976. *The Road to Bloody Sunday: Father Gapon and the St.*

Petersburg Massacre of 190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lisbury, Harrison E., 1981. *Black Night White Snow*, Boston: Da Capo Press.

Schreiber, Gerhard, and Bernd Stegemann; Detlef Vogel, Dean S. McMurry, Ewald

Osers, Louise Willmot, P. S. Falla trans., 1990. *Der Mittelmeerraum und*

Südosteuropa 1940–1941: Von der "non Belligeranza" Italiens bis zum

Kriegseintrit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The Mediterranean, South–East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1939–1942).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II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xton, Jay, 2005. *Debtor Diplomacy: Finance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Civil War Era, 1837–187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w, Martin, 1994. *Globa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ologic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

Shelley, Fred M., 2013. *Nation Shapes: The Story behind the World's Borders*, Santa

Barbara: ABC–CLIO.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cietà dei Reduci della Crimea (Veterans Association of Crimea), 1884. *Ricordo*

Pittorico Militare della Spedizione Sarda in Oriente, 1855–56 (Military


Pictorial Reminder of Sardinian Expedition to the East, 1855–56), Torino:

Bona Vincenzo.

Svoronos, Nikos, 1992.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 Athens: Themelio.

Statistics Finland, 2017, May 15. "Population." Retrieved June 5, 2017. In

http://www.stat.fi/tup/suoluk/suoluk_vaesto_en.html

- 
- Tacitus.nu, 2017. "Population of Eastern Europe." Retrieved June 5, 2017. In <http://www.tacitus.nu/historical-atlas/population/russia.htm>
- Thompson, John M., 1996. *A Vision Unfulfilled: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xington, MA: D.C. Heath.
- Trotsky, Leon, Max Eastman trans., 1930.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 Tucker, Spencer C., 2005. *World War One*, Santa Barbara: ABC-CLIO.
- Tucker, Spencer C. ed., 2010. *A Global Chronology of Conflict*, Santa Barbara: ABC-CLIO.
- Tucker, Spencer C, 2011. *World War II at Sea: An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ABC-CLIO.
- Vacalopoulos, A. E., Peter Megann trans., 1973. *History of Macedonia 1354–1833*, Thessaloniki: 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
- Voenizdat, 1999. *Воен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Military Encyclopedia)*, Moscow: Voenizdat.
- Voline, 2004. "Chapter 2: The Birth of the 'Soviets.'" *Unknown Revolution*, Portland: Black Rose Books.
- Volkogonov, 1994. *Lenin: Life and Legacy*, New York: HaperCollins.
- Vucinich, W.S., 1982. *The First Serbian Uprising 1804–18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endt, Alexander E.,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424.
- Wendt, Alexander E., 1994.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 365, 388-391.

Wendt, Alexander E.,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atley, Christopher A., 2001. *Bought and Sold for English Gold? Explaining the*

Union of 1707 (Scottish History Matters), Edinburgh: Tuckwell Press.

Yedin, Tova, 1999. *Maxim Gorky: A Political Biography*,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Yekelchyk, Serhy, 2007.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uehlke, Mark, 2007. *For Honour's Sake: The War of 1812 and the Brokering of an*

Uneasy Peace, Toronto: Vintage Canada.

